

# 当代影响最大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

——法兰克福学派的起源和意义

● 菲尔·斯莱特 著

● 袁义江 雷念增 高湘泽 黄莉莉 译

● 兰州大学出版社

# 当代影响最大的西方 马克思主义流派

法兰克福学派的起源和意义

菲尔·斯莱特 著

袁义江 雷念增 译  
高湘泽 黄莉莉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0年·兰州

**当代影响最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  
——法兰克福学派的起源和意义**

菲尔·所莱特 著

袁义江 等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兰州大学校内)

---

甘肃省定西地区印刷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7.75

---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166千字

印数：1—1100册

---

ISBN7-311-00330-X/D 42

定价：2.98元

## 译者前言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多流派中，法兰克福学派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影响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流派。在流传的过程中，它自身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最初，创建者们研究了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理论，并作出了自己的新解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批判理论”。它的早期活动具有明显的反法西斯主义倾向。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这一流派经过辗转周折最后迁往美国，并对法西斯主义进一步进行研究和批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迁回联邦德国法兰克福原址，其研究重点转向探索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抨击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特别强调社会心理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主张进行“伦理的、美学的、文化—心理的革命”，并企求找到可行的对现实进行变革的途径。近年来，这一学派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重视，特别是在60年代末期，由于它的理论被一些西方国家的青年学生和青工工人当作造反的思想武器，它的影响已远远超出学术界的圈子。在被称为“五月风暴”的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中，“新左派”们在巴黎大学张贴的标语，多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人物马尔库塞的论点；此后在西德、美国继起的学生运动，也明显地表露出这一学派的影响。马尔库塞的著作不仅影响了美、意、法、英等许多西方国家，甚至于对一些东方国家也有所影响。马尔库塞赞扬当代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其理论



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中获得了一定的支持，尤其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左派”运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声誉，被认为是“国际新左派运动的发起人”。在“五月风暴”的高潮消散以后，这一学派内部对于如何将基本理论运用于现时代的问题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正经历着一个重新探索与反思的过程。

本书作者菲尔·斯莱特曾在伯明翰和弗赖堡大学研究过哲学，并在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从事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曾任伦敦市大学艺术及其相关学科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作者在书中首先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形成及其关键的时刻，继而集中研究这一学派的哲学家霍克海默尔、马尔库塞、心理学家弗洛姆和美学家阿多尔诺对创立“社会批判理论”所做出的独特贡献。书中追溯了法兰克福学派自称的它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关系，研究了这一关系的深度和界限。在分析革命实践活动的范围时，作者探讨了德国魏玛共和国沦为法西斯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史和政治史，以及柯尔施、赖希、本杰明和布莱希特所作的研究，这些研究多数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直接评论。作者在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根本局限的同时，也强调了他们的研究对60年代出现的青年学生反极权运动所起的作用，指出他们对精神控制和文化控制方面的分析是年青的叛逆者的主要理论武器。但是，由于缺乏对经济的阶级分析，严重地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批判的锐利性。作者最后得出结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唯一出路就在于重新研讨这一学派最基本的观点，并对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实践和理论的内容进行再阐述。

本书由袁义江、雷念增、高湘泽、黄莉莉翻译。各章分工为：第一章，袁义江译；第二章，袁义江、黄莉莉译；第三章，高湘泽译，袁义江校；第四章，雷念增译，袁义江校；第五章，雷念增译，袁义江校。袁义江对全书注释作了整理删节，并撰写了译者前言。由于译者水平有限，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1989年10月

# 目 录

## 译者前言

<b>第一章 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背景</b> .....	( 1 )
<b>第一节 在霍克海默尔以前研究所的传统</b> .....	( 1 )
一、研究所的创建.....	( 1 )
二、格律恩堡任所长的时期.....	( 2 )
三、研究所在本世纪20年代所做的工作.....	( 6 )
四、“格律恩堡文库”.....	( 9 )
五、霍克海默尔任研究所所长.....	( 13 )
六、在霍克海默尔主持下研究所的工作.....	( 19 )
<b>第二节 魏玛共和国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b> .....	( 22 )
一、垄断资本主义.....	( 24 )
二、魏玛共和国和德国工人阶级.....	( 25 )
三、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	( 28 )
四、第三帝国和德国工人阶级.....	( 31 )
五、控制问题.....	( 33 )
<b>第二章 “社会批判理论”：对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b> .....	( 38 )
一、1937年的《宣言》.....	( 39 )
二、通过前《宣言》形式提出的“社会批判理论”.....	( 44 )
三、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中的“批判理论”.....	( 46 )

四、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中的“传统理论”	(49)
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51)
六、辩证思想与非辩证思想的对立	(54)
七、哲学的扬弃在历史上的疑难	(59)
八、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是一个整体	(61)
九、意识形态的批判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	(64)
十、当代形而上学问题	(72)
十一、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	(76)
十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对自由主义的辩证的批判	(78)
<b>第三章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关系</b>	<b>(82)</b>
一、马克思、列宁和法兰克福学派论阶级意识和政党	(85)
二、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88)
三、法兰克福学派和斯大林主义	(90)
四、理论与实践关系中的断层	(96)
五、法兰克福学派和罗莎·卢森堡	(98)
六、法兰克福学派和德国共产党	(102)
七、法兰克福学派和托洛茨基	(105)
八、法兰克福学派和布兰德勒主义	(108)
九、法兰克福学派和“议会共产主义”	(111)
十、法兰克福学派和改良主义	(116)
十一、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民主党左派	(120)
十二、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对法兰克福学派	



	的元批判..... ( 126 )
	十三、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瑟尔.....(129)
	十四、霍克海默尔的“社会批判理论”的蜕化(136)
	十五、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彻底化(138)
	十六、“社会批判理论”和对控制的分析...(143)
<b>第四章</b>	<b>历史唯物主义的心理学：控制与反抗的心理</b>
	<b>方面.....(146)</b>
	一、弗洛姆和精神分析学的意义.....(148)
	二、弗洛伊德和荣格之争.....(151)
	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力量和弱点.....(153)
	四、死亡内驱力理论的隐患.....(155)
	五、超我与心理控制.....(159)
	六、法兰克福学派和威廉·赖希.....(162)
	七、社会研究所对权力的分析.....(165)
	八、社会研究所对家庭的分析以及家庭的辩证法.....(167)
	九、对“死亡内驱力”的驳斥.....(170)
	十、期望的心理学与实践的困惑.....(175)
	十一、心理学的绝对化.....(178)
	十二、在马尔库塞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中心理学的作用.....(180)
	十三、控制：从心理学到“文化生产”的过渡(183)
<b>第五章</b>	<b>历史唯物主义美学：作为“肯定”、“文化生产”和“否定”来看的艺术.....(185)</b>
	一、作为肯定的艺术.....(186)
	二、作为控制来看的艺术：“文化生产”...(189)

三、列宁和托洛茨基论革命的艺术·····	(194)
四、乔治·卢卡奇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197)
五、布莱希特的戏剧文学·····	(202)
六、作为否定来看的艺术·····	(207)
七、沃尔特·本杰明·····	(212)
八、布莱希特的广播作品·····	(214)
九、布莱希特的鼓动歌曲作品·····	(217)
十、美学的优越感与阶级实践的低落·····	(221)
十一、布莱希特对法兰克福学派“吸蜜鸟” 的抨击·····	(224)
十二、在马尔库塞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 中美学的作用·····	(226)
<b>附录：主要人物中外文译名对照表·····</b>	<b>(232)</b>

## 第一章 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背景

### 第一节 在霍克海默尔以前研究所的传统

#### 一、研究所的创建

从事社会研究的法兰克福研究所筹建于1923年，于1924年6月正式问世，此后它以“法兰克福学派”而闻名。当创建时，它是一个独特的研究所，当时的主要缔造者有费利克斯·威尔（生于1898年）、弗里德里希·波洛克（1894—1970）、以及马克斯·霍克海默尔，后者是研究所后来的所长。在19世纪20年代初，这些人在这一未明确界定的领域中表现出共同的兴趣，威尔和他的父亲——赫尔曼·威尔（一个大商人）为研究所的建立提供了相应的建筑物，并为支付其工作人员的报酬捐赠了必要的基金。

1922年9月，弗利克斯·威尔提出了《关于筹建从事社会研究的研究所的备忘录》，寄往法兰克福大学的负责人，在报告中首次表明了一种概念，即后来以“法兰克福学派”闻名的风格。威尔提出的研究所的目标可归结为：从经济基础到风俗习惯和观念的上层建筑这样一个“社会生活的整体中去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他列举的紧迫问题（如革命、政党组织、摆脱苦难处境等等）清楚地表明这些问题涉及到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威尔并未忘记指出：研究所进行工作时应“独立于政党—政治的考虑之外”。正如研究所实际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一信念得到了兑现：研究所的

体制从未在组织上与任何政党缠在一起，甚至当霍克海默尔在1930年被任命所长后也是如此。

当研究所筹建时，无论是威尔、霍克海默尔或是波洛克都未具有教授资格；由于规章制度上要求研究所的所长必须是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因此这三位年青的知识分子就没有机会实际地管理这一新的机构。不过，在实际地得到授予职称以前，威尔正处于可提升的合适的候补者的地位；可是，尽管威尔有所暗示，库尔特·艾伯特·格洛克却受到了这所大学的欢迎。然而格洛克却又意外地去世，于是又要物色新的候选人。威尔和古斯塔夫·迈耶的谈判没有任何结果，其原因大部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于是威尔就转向卡尔·格律恩堡。后者是奥地利的一个具有国际声誉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由于各方面都一致赞同，于是格律恩堡（1861—1940）就成为这一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并于1923年后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和社会科学教授的职业。

## 二、格律恩堡任所长的时期

在格律恩堡的就职演说中，明显地表明研究所对马克思主义的赞同。这位所长声称：他自己是现行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反对者，并直率地承认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他接着说，这一立场将支配研究的方法，并强调：这并不是单纯的个人事务，而是制度上的决策，“作为解决我们的问题的钥匙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sup>①</sup>格律恩堡还认为，不能容忍在他的同事中有方法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分歧。

<sup>①</sup>卡尔·格律恩堡：《1924年6月22日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法兰克福大学学报》，第20卷，第9页。



因为这不仅会导致折衷的空谈还将进而造成严重的混乱；相反，研究所必须运用统一的方法；格律恩堡用了“所长专政”这一措词来强调以上观点。

然而，这一强硬的路线并没有严格执行的必要。因为，威尔在看过格律恩堡就职演说的底稿后曾作过解释，他（威尔）添加了某些系统的说明，使得任何认为格律恩堡仅仅是一个受操纵的人的观念得以消除。假如人们把格律恩堡的兴趣和目标从两方面比较的话，就可以从表面价值上接受威尔的主张。一方面是：在格律恩堡指导下研究所的实际工作；另一方面是：那时研究所运用的方法，正如他曾经说过的那样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至于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解释，则常常是远远超出格律恩堡他自己所设想的一切。不过这一论点还需要详细地研究格律恩堡的就职演说才能证实。

格律恩堡的演说无疑是一个引起争论的左派观点，他解释他的马克思主义时不仅涉及著名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主题，而且加上对同样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一书中起首句子的释意：

“正如历史观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一样，一切社会现象乃是它的各自历史形态中的经济生活的反映，从而，就根本情况而言，‘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决定了社会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生活过程’；因此一切历史（除去远古的历史）自身乃是阶级斗争进程的展现。”<sup>①</sup>

然而，格律恩堡和威尔一样，并不否认要强调这一点。

---

<sup>①</sup>格律恩堡：《1924年6月22日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法兰克福大学季报》，第20卷，第10—11页。



即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应理解为“不是在政党—政治的意义上，而是在严格的科学意义上”。

但是，在格律恩堡的演说中，意义更大的是这一事实，即威尔的备忘录中有许多东西缺失了，或至少是强调得不够。鉴于威尔曾“从它的总体上”讲到过社会生活，格律恩堡就全神贯注于这一总体的更明确的方面：“首先是有关工人阶级运动的研究和描述”，以及“对基本的社会—政治问题的追踪”。上层建筑问题（意识形态以及阶级自觉性）并不是以同样的清晰性与所有问题列举在一起，相反，格律恩堡仅以一种含糊的方式作推断，以适应一种“社会理论的发生上的解释，既可以是社会主义的也可以是其它主义的”。至于意识形态批判，它曾经为威尔无保留地强调过的，而且也是霍克海默尔领导研究所工作的基石，但是，对于格律恩堡来说却没有重要的意义。

虽然格律恩堡说过生产过程是观念化的上层建筑的最终决定因素，然而他并没有对这一过程中复杂的中介提出任何进一步分析的要求。特别是在心理学方面缺乏考虑成为格律恩堡和霍克海默尔之间基本区别的标志，这一点下文将会谈到。另一个决定性的区别就是他们各自对哲学的态度：当格律恩堡明确地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哲学或形而上学时，他未能详细说明在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相反，他通过哲学把研究所工作的“丰硕成果”说得太抽象、太一般化，把这一学说的作用置于象历史和法理学那样模糊的“关系”之中。

格律恩堡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特征是未强调理论—实践的关系，诚然，他的文摘和编年史著作以及书评具

有确定的主题性，但是也不承认有必要与任何批判的社会实践建立积极的关系。格律恩堡重复这一信念，即他的同事应当与政党的政治活动保持距离；研究所应避免一切“日常的政治活动”。而且，研究所期望具有的一切效果“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除了作为一种纯粹的训练那样的科学作品以外再没有其它”。在格律恩堡唯理论任务的观念中，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武器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见解不起作用。

但是，从整体来看，在格律恩堡演说内容中的正统的、学院式的态度完全是逻辑上的；他所说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现时代，如同一件符合科学规律的、可证实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在这一前提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确实无需为解释并记录这些“事实”而努力，因为这种经济的机械论忽视社会的这一重要方面，即格律恩堡先前称之为历史的钥匙的阶级斗争。所以，格律恩堡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全然缺乏逻辑的一贯性，也不是他的总观点脱离了内在的矛盾。因此，威尔曾强调过这位第一任所长的“马克思主义”的成问题的方面，它只是研究所创始时的权宜之计，只是为了确保学院的承认。不言而喻，事实上研究所从来没有完成有意识的鼓动性的任务。在霍克海默尔指导下，理论—实践的联系这一概念以与前不同的水平举得很高，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实际作品（马尔库塞在60年代后期的著作是例外）远远低于他们自己的想法。批判的社会实践并不是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具体的组成要素。

### 三、研究所在本世纪20年代所做的工作

在格律恩堡指导下的研究所的工作表明（在20年代末，由于他健康欠佳，只是名义上的）：首先，格律恩堡的经验主义的兴趣曾起着重要作用；可是，其次，研究所有许多工作也超出了所长的理论视野，而是按照威尔早先的备忘录中的精神进行的。1929年，威尔制定了另一个备忘录，它为研究所的发展提出了一个长时期的纲要（由此，不言自明地概括了一个传统使任何新所长都得履行），列出了六个主要的研究范围：第一，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第二，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第三，计划经济问题；第四，无产阶级的地位；第五，社会学；第六，社会学说和政党的历史。在所有这一切中，意味最深长的乃是次序：首先第一位的问题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哲学的关系，它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研究所的第一本较重要的出版物是亨利克·格罗斯曼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与崩溃的法则》，这是研究所力所能及的具有高度理论水平的好的例证。格罗斯曼（1881—1950）争辩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能视为当然的，而不如说是一种高度混合的方法；如果它被采用并继续使用的话，那就还需要对它自身进行严格的思考。格罗斯曼强调这一点，即马克思曾求助于抽象的能力：

“分析的对象乃是具体地、以经验为根据地被给予的现象世界。但是这一世界对于直接地把握来说是太复杂了。我们只能分阶段地接近它。最后，我们作出了许多简化了的预先假定，从而我们能够在本质的属性的分析中清楚地认识



到这一对象。”<sup>①</sup>

然而，这些通过抽象和简化而得到的特征，并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确定成果，而不如说它们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辩证表现的一个阶段。作为这一表现的展开，每一种简化乃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性所进行的修正；曾经被忽视的东西现在又进入思考领域。格罗斯曼争辩说，在这一方式中，理论逐渐成为对现实的“充分”表现。

格罗斯曼对马克思方法的担忧与围绕着利润率下降的混乱状态有关。他认为这种混乱状态是马克思采用的表达方法的结果。这种方法缺乏严格的一步一步的划分。这样，格罗斯曼企图揭示的不只是这一法则自身而且有必要说明这一法则的力量：究竟最初是什么东西使这一法则成为“法则”、以及“法则”是如何起作用的？可以回想，马克思提出“这样一个法则”的纲要仿效“反作用的影响”，并且随之而来的就是揭示一切被卷入的因素之间的辩证的冲突，这就构成他的“这一法则的内部矛盾的显露”。马克思本人描述这一“法则”如下：

“……产生平均利润率下降倾向的同一影响，也引起反作用，它牵制、延缓这一倾向并部分地使其无能为力，后者并非脱离这一法则，而只是削弱它的效率……这样，这一法

---

①亨利克·格罗斯曼：《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和崩溃的法则》，《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文集》第1卷，格律恩堡编，莱比锡，鹿野出版社，1929年版。

则只是作为一种倾向而起作用。”<sup>①</sup>

这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马克思称它为“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黑格尔曾经运用过这一方法，然而却是唯心主义化的；而在马克思的眼中，剥去它的唯心主义歪曲，就组成“科学的正确方法”。这是对格罗斯曼的一种称赞，当马克思的许多明晰的方法论著作尚未出版时，他清楚地评价了这一步骤。

研究所的第二部较重要的理论著作是弗里德里希·波洛克的《1917—1927年苏联部署的经济试验》。这位作者将这项工作描述得象“报告”一样，后来又补充以对这些经验材料的评论式的解说。可惜的是，后一部分未能实现；然而即使在第一卷就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对于苏联的经济发展并非出于抽象的观察，而是结合无产阶级专政出现后的社会经济条件。同时，波洛克在这一具体的历史经验的指引下，重新考察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概念。这就使波洛克的著作成为与格律恩堡的明显的文摘式出版物不相同的另一种类型；正如第三章所揭示的，它也标志着脱离了此后研究所对苏联的观点。霍克海默尔的同事们，未能象波洛克在20年代末那样试图保持与社会主义实践的明确的联系。

在格律恩堡任所长期间完成的最后一项较重要的计划是卡尔·奥古斯特·威特福格尔所著的《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但直到1931年仍未出版。它主要是一份报告，是一项以经验为根据的研究；正如波洛克对苏联的研究一样，事实上从未

---

<sup>①</sup>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卷，恩格斯编，伦敦，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社，1972年版，第239页。



补充曾答允了的第二卷：它分析了上层建筑问题，其中包括意识形态和阶级自觉性问题。然而，恰恰在威特福格尔（生于1896年）接触到的上层建筑问题中，他作出了大量的、资料丰富的历史主义的观察。尽管他接受了经济基础是最终决定力量这一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仍然强调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辩证的复杂性。例如，一个社会的文化面貌不仅为生产过程的性质所决定，它也决定于这一特殊的生产模式起作用时间的长短：这对于解释上层建筑的落后和不均匀性问题是决定性的。

然而，威特福格尔并没有奢望阐述一种表达得清楚有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心理学，他满足于指出在经济及其科学之间的几个显然的类似之处。在这些观察中有许多是具有高度洞察力的。例如，在政府权力和天文学之间的关系。但是，概括地说，虽然格罗斯曼、波洛克和威特福格尔的著作，并不是在格律恩堡的文摘性的、纯粹经验主义的考虑之下所能简单包含的；但是，早期研究所的著作并没有扩展到精神分析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问题，这一问题只是在霍克海默尔时才成为关键性的。

#### 四、“格律恩堡文库”

格律恩堡在去法兰克福之前就已经为他自己考虑好一个名称，即《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即后来为大众所知晓的《格律恩堡文库》。当然，下述情况是不可避免的，至少在格律恩堡任所长时期：这一主要的期刊要在研究所的工作中起重要作用。同样，在就职演说中把对工人运动的研究和描述列为最优先考虑的事也是不足为奇的；而

且在20年代末，威尔的报告中就认为这种考虑确实在研究所的工作中占有主要地位。研究《格律恩堡文库》对于评价格律恩堡的历史研究传统来说是如此的必要，正如有必要对研究所在“法兰克福学派”时期所创办的杂志与它后来的杂志之间建立连续性或非连续性一样。

格律恩堡把他的杂志看成一种手段，以填满社会科学的严重空白：即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历史。这一杂志设有五个主要的研究部门：第一，理论问题；第二，原始的或不引人注目注目的材料；第三，把以往年代的事件和有关方案载入编年史；第四，书评；第五，一份完全的书目。格律恩堡强调这些材料的意义不仅是学院式的，而且还是“实践的一政治的”。然而，如同在就职演说中，以及在威尔的1922年的备忘录中那样，格律恩堡为了排除任何政党的倾向性，甚至走到对一切意识形态性的编辑上的管理主张都加以摒弃的地步（进一步证明威尔的主张的迹象就在于：正是他，而不是格律恩堡，曾在就职演说中写进了关于指导者的“专政”的谈话）。

至于格律恩堡自己的研究，对这种多元论考虑得很少，他所关切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运动的文献和编年史，至于理论上的以及意识形态的评价则不起什么作用。除去书评以外（在他名下的超过100篇），他的作品包括了收集、分类、核对、介绍与工人阶级组织有关的文献。在格律恩堡自己的笔下从来不以理论著作的特色而出现，甚至在他介绍苏联的基本法律文献时，他也没有对这些材料进行评论的倾向。既然这些文献的真实性仍然是个问题，这些极少量的语词就只能作为一种恰当的引言。格律恩堡强调在这些材料中

所涉及的东西应于特别注意：“当前，同样在德国，激烈争论的是这一问题，国民议会还是苏维埃制度。”但是，从格律恩堡方面来说，这既不暗示这一问题得由社会历史学家用来作为支持抉择的鼓动武器，也不意味着历史学家的作用在于“为争论提供材料”。

《文库》的理论著作，正如研究所所处的情况一样，从属于格律恩堡的观念的视域。事实上，当格律恩堡在法兰克福任职期间，作为他的杂志特色的最有决定性的著作之一也是讨论的这一问题；此后，在霍克海默尔指导之下，对研究所来说又成为一个议论纷纷的争端；这就是卡尔·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柯尔施的著作随后将较详细地讨论；就目前来说，更重要的是提出如下的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等等。在《文库》内从一开始就对其给予相当重要的地位。例如，埃米尔·哈马赫尔就讨论过科学社会主义与黑格尔辩证法（以及与康德、费希特）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并且在揭示黑格尔哲学内部的爆炸性的矛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还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在理论和实践中就扬弃（Aufhebung）的辩证形式废除了哲学。

然而，在杂志中有关这些问题所作出的大多数结论都是成问题的。哈马赫尔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通过展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赫斯和格伦）的面貌以赞许的见解作出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推断，批评他们是“非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唯心主义的评价之间的真实关系将在后续的一章中详细讨论；当前，已有充分的根据认为哈马赫尔未能正确地评价这复杂的扬弃之真实本性。幸运的是，除了柯尔施以外，《文库》的另一位出色的理论家乔治·卢卡



奇，以一项简短而尖锐的回答消除了哈马赫尔想“纠正”马克思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评价的一切企图。卢卡奇的论文《摩西·赫斯与唯心主义辩证法问题》，基本上是从阶级出发对赫斯的批评，指出赫斯未能将他的理想与他的阶级同情心在解放事业的实践的一批判的理论中结合起来。

至于说到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爆炸性矛盾，卢卡奇是完全同意的；虽然他对基本的二分法的处置和阐述极其简明，但事实上黑格尔的现象学“使历史的和超历史的概念论互相缠绕交叉在一起，而且又互相排斥”。在—项令人惊异的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之后（当时尚未出版），卢卡奇指出了黑格尔的最伟大的成就：

“……黑格尔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心理中、在它们的矛盾中把握了客观的形式：正如人（精神、在黑格尔的神话般的术语中）在过程的一瞬间通过客观化成为他自身；扼要地说，在他的存在中矛盾被推进到极端，提供了质变以及这些矛盾之扬弃的客观的可能性。”<sup>①</sup>

这就预示了法兰克福学派此后对黑格尔的评价，并且也是《文库》所能达到的顶点的标志，包括在格律恩堡任编辑时。但是，谈到研究所在本世纪20年代的工作时，《文库》在心理学方面完全是一片空白；而在霍克海默尔上任后的出版物中，心理学则被提到优异的地位。饶有趣味的是恩格斯晚年承认过的对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所存在的几项空白。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引证了恩格斯对此的

---

<sup>①</sup>卢卡奇：《摩西·赫斯与唯心主义辩证法问题》，见《格律恩堡文库》第12卷，1926年。

陈述：

“我们全都必然地把主要重点放在这一事实上，即政治的、法律的以及其它意识形态的概念是从基本的经济事实所派生的，而且上述事实通过这些概念也间接地适用于行为。我们强调这一内容而忽略其形式，即这些概念所从出的方式和手段。”<sup>①</sup>

在提供一种合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心理学方面，柯尔施并没有什么主张；他所关心的确实并不是法兰克福学派后期著作意义上的那种心理学。但是，他对意识形态的复杂现象之特异的研究，意味着绕开了一切唯心主义者的种种权宜之计；反之，象霍克海默尔那样较次要的理论家，就未能对“价值”的扬弃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滑到了心理学的唯心主义之中，为另一种样式的“有缺陷的”马克思主义添加了许多“人道主义的”范畴。不过，在结束时要指出，尽管有象柯尔施和卢卡奇这样出色的理论家，《文库》仍然象早期的研究所那样，认为无需考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意义。直到1930年霍克海默尔任职时，这种状况才有了改变。

### 五、霍克海默尔任研究所所长

从1927年起，格律恩堡对他的《文库》没有做什么贡献，而且把研究所看成是无所作为的。到了1929年，波洛克有成效地指导着研究所。但是，作为专职所长必须与这一大学的一个教授职位同时任命，这是一麻烦的问题。对威尔来说，格律恩堡曾经是可以接受的人选；因为尽管后者对马克

---

<sup>①</sup>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英译者，弗雷德·哈利戴，伦敦，国立盲人图书馆出版社，1970年版，第69页。



思主义的概念有某些偏见，但他乐意听凭威尔以及有类似想法的学者们去追求较难达到的理论任务；寻找一个具备同样水平的替换者是困难的，而且使事情更麻烦的还在于：格律恩堡的职位是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其中意识形态的传统确实是与威尔对研究所任务的想法根本无关的。在文化部长、系、大学评议会一方与威尔一方之间进行了热烈的、经常是不愉快的意见交换，当时威尔曾尖锐地恐吓说要切断拨款，除非他们的“权利”（即威尔的）得到承认。最后，在威尔的一个老同事和朋友——马克斯·霍克海默尔之间达成了协议。

霍克海默尔于1926年顺利地提交了教授论文，这样就能够满足有关担任研究所所长的规章制度。对于这个所的僵局通过把所长的职位换成是研究哲学的而得到了解决，霍克海默尔成为该所的第一任哲学和社会哲学教授。因此，必须记住，当人们试图对霍克海默尔后来的工作予以标志时，“社会哲学”这一术语对于研究所来说并不包含新的自我理解，而毋宁说是权宜之计，一个人为了得到所长的职位而同情威尔为他的研究所原先设立的计划。

霍克海默尔的就职演说有一个显著的标题：《当代社会哲学的地位与研究所的任务》。它概括了社会哲学的一般概念，即“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团体中成员的人们之命运的哲学解释”。这一学说的对象，除了“作为整体的人类之整个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以外再没有其它。可是，一个争论性的注释随即出现了，霍克海默尔抨击对这一哲学的“解释”的理想化作用，并以黑格尔的情况为例：在这一信念的外观中，人的“本质的存在——理念”在世界史中至高无上地

统治着，个人的命运（事实上也是物质文明的基本要素）表现为“哲学意义的缺乏”。当社会哲学宣称要分析社会的现实时，却为它的哲学的组成部分保留了一切“现实”。在人的假想的“本质”（即“自由”）和他的社会现实（异化、失业、征兵）之间的突出的矛盾的种种关系中，对社会存在从哲学上加以美化乃是阶级统治的帮凶。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霍克海默尔并不是实证主义的朋友，他依然非难社会哲学对待各种特殊科学的自我满足方式。它们“扬弃”（在一种纯粹唯心主义过程中）成一种概念的整体，通过这一整体哲学专横地统治着，并宣称自己对寻找探索过程的不同分支学科可作出“最终真理”的判断。这样，社会哲学这一术语并不意味着哲学停止它自封的霸权，相反地却卷入对这种霸权的加强和保卫，至于这一社会“现实”的物质方面，则没有任何改变。

霍克海默尔使哲学与特殊科学之间的辩证概念的图景对立起来：

“知识之无秩序的专门化并不能由专家的研究—探索的拙劣的综合所克服，也不是那种无偏见的经验主义通过根除理论成分的尝试就能达到的。说得更确当一些，经验研究与理论综合的问题，只能通过与一般，与‘本质’有关的哲学才能达到，它给各个研究领域提供刺激性的动力，而它自身仍然存留于充分开放的状态，以便通过具体研究的过程而被刻划、被修改。”<sup>①</sup>

---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当代社会哲学的地位与研究者的任务》，见《法兰克福大学学报》第37卷，法兰克福，恩格勒特和施洛塞尔出版社，1931年版，第11页。

简要地说，协作的工作必须“在最高的哲学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被组织起来。

对“哲学的”这一措词的用法，使许多历史唯物主义者极其关切，但是人们必须记起这一演讲的场合，正如霍克海默尔教授职位的称号一样。至于说到研究的具体纲要，这位新所长和大家定下了一个新的记要，研究所的第一个主要计划的中心是下列问题：

“在特殊的社会集团、特殊的时期、特殊的国家中，在这一集团的经济作用，在它的各个成员的精神结构的改变和作为这一社会的产物的思想和制度、以及在这一集团的考虑之下作为一个整体所形成的影响之间，能建立起什么联系呢？”<sup>①</sup>

恰如其份的分析方法既不是“庸俗黑格尔主义（世界和历史的基础是精神）、也不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人类的精神、个性正如法律艺术和哲学一样仅仅是经济的镜象），而是一种对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的掌握。“精神联系之环的复杂作用”并非无法解释的，而是明摆着的。

霍克海默尔强调，从事经济基础的研究是对社会现实的恰如其份地描述之绝对必要的条件。但是，他并不把这一研究看成是特殊疑难的问题，他似乎把大纲的这一部分看成是自明的。事实上，作为意识到的疑难的出发点而浮现的乃是对心理学和哲学的关心。至于说到前者，则着重强调在社会理论中需要一种恰如其份的心理学成分，并意识到与这一领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当代社会哲学的地位与研究所的任务》，见《法兰克福大学学报》第37卷，法兰克福，恩格勒特和施洛塞尔出版社，1931年版 第14页。



域相近的学科至今什么也没有做过，心理范畴的真实的连接方式成为研究所的下一步工作。但是，对哲学的关心，作为社会理论进化中并非神秘的成分曾为霍克海默尔详细地讨论过。这就展现了新所长的主要兴趣，但是也引起了大量的问题。

按照格律恩堡的主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哲学或形而上学，它只是一种虽然简明然而却是正确的断言，这一情况尤其是指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上的运用。当然，马克思主义是部分地（但仅仅是部分地！）起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是，从有组织地研究的20世纪来说，它们总是这样地起促进作用，而“在局部的哲学问题的基础上”，则是含糊的。甚至在考虑到霍克海默尔善于机变的策略时，人们也会发现这一事实，即他通过和哲学范畴有关的对话来发展他的观点。这远非一个权宜之计，它充分地透露了有关霍克海默尔此后的发展。虽然他为他的研究所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科研项目的纲要，虽然“社会哲学”这一措词为更具体的“社会科学”给定了方向，但哲学仍然成为这一社会理论内部的决定性的研究方向。

哲学的这种作用，与其说是研究的方法倒不如说是研究的对象；关于这一点，通过查看霍克海默尔在1930年出版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起源》就可以找到最好的阐述。作者描述这本书是“为自我阐明的目的而写的研究集”。霍克海默尔相信，通过查看历史哲学的某些主要的典型，从当前历史的表现中（这一表现乃是它自身的一种历史现象）可以学习到有“实践价值的”某些东西，在今天，哲学提供了把握社会的方法的许多有意义成分。霍克海默尔并不关心以哲学的身份使哲学“新生”，更确切地说，他相信哲学的沉思所



展现的不仅是这一哲学历史地被决定了的对现实的曲解，而且展现了有关这一现实的许多东西，特别是在它的精神表现之中。这些研究是霍克海默尔在本世纪30年代论文的范例。这一主题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优先考虑的：意识形态批判。尽管霍克海默尔对他的前任表示恭顺的尊敬，他却从根本上给研究所定下了新的计划。

在保罗·克卢克对研究所历史的描述中，这一转变被完全歪曲了。克卢克注意到新任所长宣布的对哲学的考虑，正如注意到霍克海默尔未能重复他的前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表白一样。但是，克卢克暗示霍克海默尔如此地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不仅表现出克卢克对马克思早期的争论性著作完全不熟悉，而且实际上他继续把历史唯物主义降低为粗糙的（因而明显地站不住脚）经济决定论：

“甚至在霍克海默尔……考虑作为整体的经济条件对社会发展的意义时，他并没有象他的前任所做的那样，作出先验地赞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宣布，而是为经济的和精神的结构之相互影响而争论。”<sup>①</sup>

作为一个“证据”，克卢克刻板地引证霍克海默尔所概括的“焦点”，即霍克海默尔含蓄地宣称：研究所的意图并非放弃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而是补充它并进一步把它和恩格斯的后期著作的见解结合起来。霍克海默尔对哲学和心理学的思考确实构成了对格律恩堡的著作以及格律恩堡的“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可是霍克海默尔却把他的新任务设想为

---

<sup>①</sup>克卢克：《1914—1932年联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捐赠物》，法兰克福，瓦尔德马尔·克拉默尔出版社，1972年版，第507页。

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的迫切需要。他和他的同事在他们的冒险活动中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只能从对他们此后的进展所作的一系列分析中估价；但是他们确信马克思主义是适合于从事分析社会这一目标的唯一方法则是无可怀疑的。

但是，在格律恩堡和霍克海默尔之间给人以一种类似的印象：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有不同的解释，两位所长都把研究所的工作设想为在传统意义上的学术工作。格律恩堡对这一重要宗旨的自信曾为威尔所记载，但这并不意味着与所长自己的主张不相容，这一点只要简略地看看他所编辑的《文库》的前言就可以明白。霍克海默尔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同，他关心于克服经验科学与社会哲学之间令人不满意的割裂，但是他并未暗示研究所的工作必须直接地系统阐述有关社会变革的实践的一批判的理论。当然，这也可能因为霍克海默尔那时还是一个相对不知名的人物，要对他的听众让步。但是，这一问题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是很认真地提出的，并且在估价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个重要时期的理性作品时必须系统地坚持到底。

## 六、在霍克海默尔主持下研究所的工作

在新所长主持下出版的第一本重要的著作是弗兰兹·博克诺的《从封建的世界观到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之转变》。博克诺（1900—1957年）是《文库》的一个次要的捐款人，曾在研究所的赞助下为此书工作了好几年。正因为如此，此书没有显示出新所长的兴趣。但是，在编者前言中霍克海默尔指出博克诺的著作与研究所新的关注有关，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涉及到“经济与理性的文化之间的关系

这一基本问题”。霍克海默尔说：“这是一个问题，如何对待它，对于研究所的独特的研究来说，也是特别感兴趣的。”<sup>①</sup>

在第二本重要的出版物《权威与家庭的研究》中，仍然很清楚地展现了新研究所的真实面貌。它是在霍克海默尔指导下构想、计划、产生的。这一著作明显地是他的就职演说中新提出的“焦点”的产物。霍克海默尔坚持说，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各个不同领域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在研究所的著作中承担着重要作用。并且“精神联系之环”以“权威的面具”这一形式而出现，这才是此书所真正关切的，而不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现实之间的不一致。

但是，新研究所最初的宣传工具是它的期刊《社会研究杂志》。对这一杂志的认真分析将在以后讨论（对《权威与家庭的研究》的讨论也是如此）；但是，现在就必须在这一杂志与《文库》之间建立起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关系。新杂志的内容简介中宣称它是《格律恩堡文库》的“继续”，但是加上了“与格律恩堡的文摘相比较，在题材上考虑得更广阔”。至于谈到连续性（大部是形式的），则印刷厂继续留在黑希费尔特，一直到纳粹统治下才结束了这一特许；并且杂志的版式在许多方面仍和它的前任时一样，只是将理论论文与书评分开，至于格律恩堡的文摘和编年史工作（总之，随着格律恩堡健康的恶化而逐渐忽略了）被停止了。但是，从更深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杂志有了新发展。事实上，这一特殊的标题：《社会研究杂志》所强调的广阔视野，较之格律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社会研究所文集》第4卷出版前言，第5页。



恩堡来说更接近于威尔的原初概念。

或许，意味更深长的是霍克海默尔选择这一标题优先于《社会哲学杂志》，在创刊号的编者前言中重申了就职演说中对中心问题的概述，即“在各个文化领域、它们的相互依存与支配它们变化的法则之间的关系”。而通常的更具体的名称则反映在霍克海默尔在其著作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新词，即新出现的术语“社会理论”。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来说这只是一个小的升级，它最清楚地表达了研究所的方法，并且它对社会所进行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这一阶段，霍克海默尔对理论—实践之间联系的概念还不太清楚。正象格律恩堡一样，他把研究所的工作看成出于“兴趣”，而不是作为一种实践的、政治的阶级武器。霍克海默尔确实说过：“不论作为连续过程的历史在什么程度上参与一切理论，然而，如果这些研究的发现其自身在社会中能被证实的话，那么这些研究必须能经受理论标准的考验。”但是，这一“证实它们自身”（Bewährung）仍然是尚未区分的，在霍克海默尔后来使用的术语“传统的”与“批判的”态度之间并没有区别（见第二章），而且与社会变化的活跃力量无关。相反，社会现实的再生与革命是被“控制”的，尽管霍克海默尔允诺要保持“对当代问题的关心”，并且要从事“探究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但在这一阶段，理论和实践的相互渗透仍然表现为单方面的过程。未来固然未必是一个给定的量，但是在确定当前矛盾的组成方式是如何被决定的这一过程中，理论并未看成一种鼓动的武器。

对于霍克海默尔的同事来说，理论作用的概念后来成为



根本的东西，而与阶级斗争的联系则成为研究所必须履行的方法论上的责任。这样，在探究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发展之前，有必要提供一幅德国社会—经济的和政治的发展之基本写照，这一理论就出现于其中，并且作为一种实践的一批判的武器渗透于其中。同时，对这一时期的概述，能够将法兰克福学派自己对以上状况所作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解释提供一种更具体的描述，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也正是在其中起作用。

## 第二节 魏玛共和国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从本质上说，霍克海默尔对于他的理论的社会作用的概念之激进化是理论—实践关系的唯物主义的联接方式。1935年，霍克海默尔声称（并且承认）理论的价值“依赖于它和实践的关系”。这种关系在社会—政治方面的重要性在于：一种恰当的社会理论必须与社会内部所存在的革命力量相联系；在1934年，霍克海默尔写道：“一种理论的价值是由它与其从事的任务的关系决定的，这一任务是在历史上给定的时刻为最进步的社会力量所采取的。”<sup>①</sup>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实践关系的丰富的辩证含意将在以下章节讨论。但是，即使现在来说，以下论点也是很清楚的，如果不熟悉这一时期的“任务”和“进步的社会力量”，那么就不可能理解研究所在19世纪30年代的工作，更谈不上进行元批判了。

---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当代哲学中理性主义的争论》，见《社会研究杂志》1934年第3卷，第26—27页。

这些问题又反过来以经济发展的知识为先决条件；在《杂志》的第一卷，霍克海默尔明确地说：“如果历史的划分依照人类社会生活过程进展的不同形式，那么基本的历史范畴就不是心理的，而是经济的。”①当时研究所的主要人物集中于对上层建筑的分析，至于德国经济发展的描述就听任波洛克进行了；但是，在这整个分析的背后乃是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对于德国将进入野蛮状态的充分的觉醒。在这一发人深省的时期，对这一进展最清楚的表达是由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提出的，此书出版于1941年，并题献给霍克海默尔和研究所；马尔库塞写道：

“法西斯主义的根源可归结为增长着的工业垄断主义和民主制之间的对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工业机构的高度合理化和急速的扩展遇到了日益增长的利用上的困难，特别是由于世界市场的瓦解以及为劳工运动所强烈地保卫的巨大的社会立法的网状系统，……现存的政治系统除了经常地压榨人们对需求的满足以外就不能发展生产力。这就需要对整个社会以及个人的关系实行极权主义的控制，取消社会和个人的自由，并依靠恐怖手段使群众一体化。”②

如果缺乏对德国垄断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导致法西斯主义的情境的简要概观并以之作为对照，人们就不能理解下述社会—政治的经验，即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是一种不间断

---

①霍克海默尔：《历史与心理学》，见《社会研究杂志》1932年第1卷，第133页。

②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1967年伦敦哥版，劳伦莱杰和基根·保罗出版社版，第410页。

的、经常是不言自明的抗议。

## 一、垄断资本主义

就垄断资本主义的意义来说，“垄断”标志着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在那儿甚至许多大企业都在同一个垄断经营的价格尽可能固定的（通过企业的联合）市场内活动，而且价格战是严格地被约束的，垄断是通过企业的联合实现的，并且价格表现出受操纵的、稳步上升的趋向。法兰克福学派对这一现实情况并无错觉，他们经常谈到“后竞争的资本主义”以及“当代经济排除市场与竞争动力的趋向”。不过，对这一现实的系统分析则是委托给波洛克的。

波洛克用生产过程来解释垄断的发生：经济的集中和资本有机构成的升高（亦即企业一般管理费的升高）使不间断的生产成为资本主义自身的需要。这就是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通过他们含义隐晦地提到的“生产的专政”一词所表示的意思，它并非作为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主题的重申，而是将目标集中于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性以及后者的极权主义力量。正如马尔库塞在一年后所写的：

“‘消费社会’是使用得极不确当的名称，因为很少有过一个社会如此系统地由利益控制生产而组织起来。消费社会只是一种形式，在其中垄断国家资本主义在其进展的最高阶段再生产其自身。”<sup>①</sup>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法兰克福学派从未提出一种系统

---

<sup>①</sup>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伦敦，艾伦·莱恩出版社，1972年，第23,24页。



的理论以详尽阐述生产中的控制（而这一空白对于他们的控制与解放的辩证法之上层建筑的分析具有严重的后果），这并非否认他们明确地反资本主义的动机，这一动机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对许多垄断资本主义的机械主义的理解。而且，在《理性与革命》一书中，马尔库塞概述了德国经济的发展，认为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绝对地处于垄断主义的巩固地位，用霍克海默尔的话来说，正是在魏玛共和国，“最进步的社会力量”担负起打碎资本主义的“任务”，而作为他们的失败之结果则是法西斯主义攫取了政权。

## 二、魏玛共和国和德国工人阶级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是它自身被革命地推翻之客观的钥匙。马克思写道：

“随着资本主义巨头人数的不断减少……苦难的、压抑的、被奴役的、堕落的、被剥削的群众在增长；但是工人阶级的反抗也随之增长，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自身的高度机械主义，这一阶级在数量上经常在增长并且受到训练、联合并组织起来。”<sup>①</sup>

霍克海默尔在1960年回顾了法兰克福学派形成的年代，明确地赞同马克思主义者对危机和苦难的解释：“在这一世纪的前50年，欧洲国家中无产阶级起义是一个似乎可能的期望，似乎他们能越过危机和通货膨胀。”<sup>②</sup>如果理论—实践

<sup>①</sup>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伦敦，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社，1970年，第763页。

<sup>②</sup>霍克海默尔：《新版序言》，见《批判的理论：文集》，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编，法兰克福，渔夫出版社，1968年，第1卷，第9页。



的联系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个时期作品的主题的话，上述估计就需要认真地思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经济混乱中，建立了魏玛共和国，同时帝国主义者凡尔赛条约的巨额资本也在德国积累起来。用不值钱的货币支付债务，大企业以荒谬的低价买下较小企业的全部产权，这些方式使垄断的增长飞跃前进。但是，作为共和国的资本主义基础之全部保证的真正营业上的资本却是缺乏的。用来稳定这个共和国的必要资本来自美国，它把战败的德国及其高度的生产能力看成一种有利的投资。1924年8月的道斯计划是伴随着大量的道斯贷款以及为数众多的私人贷款而来的。在垄断基础上的大量产品是以定金付清的。

德国在经济上恢复了，从而得以有能力支付款项，它的国民财富的更多部分以利息的形式付给了美国人，此外还有数量大得难以相信的赔款也给了美国。德国垄断资本主义所生殖的利润是如此地出色，正如同这一国家的工人阶级相应承担的负担一样，对这些负担的审核可以给魏玛德国的革命潜力提出一幅具体的图景，这正好表明霍克海默尔所说的：

“无产阶级起义”作为一种“似乎可能的期待”在多大程度上是有理由的。

德国劳动者的体验可以基本上归结到“合理化”这一现象，它意味着美国生产技术向德国工厂的转移，伴随而来的是劳动强度令人惊愕的提高。类似的状况有：挂起了考勤钟以发现意外的速度；致命的偶然事故的增加与雇佣劳动者的人数相关，而非致命的偶然事故则绝对地增加。同时，官方的健康统计表明比通常的健康标准明显恶化，这种状况部分地是由于劳动强度的增加，部分地还由于付给劳动

者的工资标准太低。

在1924年到1930年之间工资曾有名义上的增长，但这是骗人的：首先，增长的比率随即下降了；其次，这种增长从未充分达到对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的承认，而是听其自然。同时，还以税收和保险费的形式从工资中作了扣除，在1914—1927年之间，达到200%，到1932年高达300%。不用说，这一丁点儿工资只能诱使劳动强度增加。当社会民主党人保卫8小时工作制原则时，对每一个劳动者来说，延长工作时间或从事第二职业却成为必需的。但是，合理化意味着对于已减少了人数的工人要从事艰苦的工作，至于另一些人，则意味着被解雇；这种情况在1924年至1932年远比战前高。和高失业联系在一起的是缩短工时，在20世纪20年代的后5年，有十分之一的工人得到就业。当然，经济崩溃意味着超出任何“标准”之外的大量失业和缩短工时。正如波洛克在《杂志》中报告的，1930年是工资水平急剧地、绝对下降的开始。这样，在生产领域，魏玛共和国的工人阶级生活之悲苦就成为一个经常的、爆炸性的事实。

当然，这一类麻烦能由福利事业而减轻，但是在魏玛共和国却并非如此。一直到1927年，没有试行任何重要的措施向失业者提供利益；事实上，政府从未真正地确认失业的程度；不管怎么样，它即使决定缩短工时的程度也没有什么重要性，因为缩短工时对人民来说从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合宜的利益。基金不足以资助整个失业者的需求；它只能提供75万，而“应急”基金就需要40万以上。显然，对这种经济局面来说供应品是不足的，无可争议的失业数字已超过100万，而到20世纪20年代末已接近300万。前后相继的政府或

者对群众让步（对奢侈品项目征税），或者象布留林那样，竟然切断公共项目的支出（在普遍的社会困苦时期），听任工业不受触动，甚至用政府补助来灌注它，确信德国的问题只能用与劳工势力相反的方式才能得到解决。实际上，这种“解决”只能导致希特勒和纳粹的恐怖统治。

### 三、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

由于希特勒对魏玛德国经济崩溃的“解决”而出现的问题亦即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对此法兰克福学派毫不怀疑，霍克海默尔在1938年写道：“法西斯主义并非资产阶级社会的对立物，而是后者在某一历史条件下的适当的形式。”<sup>①</sup>因而，在一年后霍克海默尔断言：“如果一个人不想谈论资本主义，那他也就应当不谈法西斯主义。”<sup>②</sup>法西斯主义只能根据各个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而得到理解，“资产阶级与法西斯组织之间的联盟的产生是由于对无产阶级的惧怕。”<sup>③</sup>对于这一深刻信念在经济方面的明确表达又一次留给了波洛克。

波洛克认为法西斯主义这一特殊现象起源于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现象。在《杂志》的第一期中他写道：

“今天，大量的工业企业和银行康采恩如此迅猛地生长，

---

①、③霍克海默尔：《蒙太奇与怀疑论的作用》，见《社会研究杂志》第7卷，1938年，第38页，31页。

②霍克海默尔：《犹太人与欧州》，见《社会研究杂志》第8卷，1939年，第115页。



使得没有一个国家——不管它自封为不干涉主义，能够对其置之不顾或眼看着它们其中之一崩溃。除了资本集累的一定水平以外，各个企业和康采恩仍可继续单方面地要求利润，而且由于纳税的群众，它们能渡过危险。因为如此庞然大物之中的一个崩溃，将对整个经济并同样在政治方面产生最灾难性的后果。”<sup>①</sup>

这是在经济上不断增长的国家干涉背后的经济的基本原理，至于在这一国家中不断增加的垄断的干涉其原理也是如此。波洛克强调，没有法西斯主义的“脱离常规”，而只有资本主义现阶段的固有性。

但是，波洛克所关心的并不在于强调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基础，他希望分析法西斯主义，而不只是谴责它，从而他试图揭露法西斯主义经济所特有的性质。利润原理的作用是一个关键的方面，当波洛克充分意识到利润动机的持续意义时，他逐渐形成了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在其中经济控制的性质超过了单纯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波洛克的）：

“垄断组织不再作为从事扰乱的侵入者而起作用，而是作为政府的代理人接管了市场机能。以前那些或多或少志愿的超企业家的组织变成了强制的、综合的。每一个特殊集团不再以越来越多的、习以为常的中断生产为条件去为最大利润而战斗，它们集体地承担协调整个经济过程以及支持社会机构存在的责任。”

---

<sup>①</sup>波洛克：《当代资本主义状况与计划经济新秩序的前景》，见《社会研究杂志》第1卷，1932年，第12页。

<sup>②</sup>波洛克：《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秩序吗？》，见《哲学和社会科学杂志》第9卷，1941年，第451页。



波洛克没有区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民主的”和“极权的”形式，（至少从观念型式的角度来说），但是，他以纳粹德国为例，从对它的“极权的”形式的分析中建立了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这是因为波洛克认为除了“极权的”形式是可能的以外再不想考虑其它。

但是，波洛克对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在研究所内并非无异议地通行的，弗兰兹·诺伊曼的《庞然大物》就是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整个概念的攻击，它似乎是对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一种有倾向性的否定。诺伊曼（1900—1954）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对抗性的持续，并利用社会民主党人鲁道夫·希尔弗丁的经济理论攻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诺伊曼争辩道：如果国家拥有一切生产工具，那么就谈不到任何资本主义。当然，事实上波洛克从未暗示把国家垄断主义归结为任何一种对生产工具的国家垄断所有制。但是诺伊曼的看法是：波洛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乃是改良主义者否定第三帝国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例证。

研究所的主要人物倾向于支持波洛克，威尔在1942年8月16日写信给卡尔·柯尔施，批评诺伊曼的有倾向性的论点以及他的“无视新秩序的执拗的决心”。诺伊曼的竭力争论使他处于矛盾的境地：当他拒绝考虑法西斯的资本主义在那些方面是新的时，他所探索的只是说明波洛克的论题是正确的。威尔进一步抱怨诺伊曼的“自负”，这种自负“阻止他与他的研究所同事们磋商”。这一切使威尔作出结论：“我们（假定研究所是一个整体）乐于看到他的书没有作为研究所的出版物而问世。”

看来，马尔库塞也是含蓄地站在波洛克一边，他在为

《杂志》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写道：“第三帝国确实是‘专家统治’的一种形式；对帝国主义的效率和合理性的技术上的考虑，取代了利益和普遍福利的传统标准。”<sup>①</sup>这并非否认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基础的方式，它只是理解这一基础的特殊外观的尝试。确实，波洛克的理论中最使人惊恐的乃是这一事实，即用资本主义中普遍的趋势来解释法西斯主义：

“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极权主义形式下，国家成为新的统治集团的权力工具，这些集团是最强有力的既得利益的企业合并的结果，它包括工业和商业经营中地位最高的全体人员、国家官僚（包括军队中的）的较高阶层以及获得胜利的政党的官僚中的领导人物。不属于这一集团的其它人只是被支配的对象。”<sup>②</sup>

事实就是这样，人们可以设想希特勒的德国远远没有“解决”魏玛的经济问题，而只是增加了工人阶级的负担。这正是确实的情况。

#### 四、第三帝国和德国工人阶级

虽然失业人数以使人震惊的速度减少，新设立的工作却很少吸引力。它的强度和广度一样急剧地增加，在仅仅5年中事故率增加了200%，加上大量的工资扣除（大部分由于战争机构）的猛增，为了个人消费的生产则下降，对食品和

---

①马尔库塞：《当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影响》，见《哲学和社会科学杂志》第9卷，1941年，第414页。

②波洛克：《国家资本主义》，见《哲学和社会科学杂志》第9卷，1941年，第201页。

布匹逐渐定量配给而且质量下降了。这种糟糕的事态只能由纳粹意识形态的犬儒主义来搪塞；正如马尔库塞报道的：“今天，当手边有着满足丰裕生活的一切技术潜力时，国家社会主义者认为生活标准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并沉溺于对贫困的赞颂。”<sup>①</sup>当然，这种经济上的贫困预先假定了政治上的贫困：德国工人运动的瓦解。

当一切积极的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富于战斗性的工会会员已经集结起来的时候，镇压劳动者的法律已逐步颁布，其目的在于使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组织失去活动力以及适应战争机构的需要重新组织被恐吓的工人。农业劳动者不准迁移到市镇；接着，当局开始驱赶上一辈来到城市空地的许多白领工人和制造厂的工人。到了1935年，有计划的劳动征募开始了，由于在1936年取消了所有节假日，这一发展甚至造成更多的压制。

最后，纳粹的帝国主义者以及他们在重工业中的主办者的意图还意味着另一种使人穷困的形式：通过战争而死。军械工业不仅意味着奴隶劳动和浪费潜在的物力，它还意味着被恐吓的工人为他们自己的毁灭而生产武器。这样，纳粹对德国经济问题的“解决”给工人群众没有带来任何东西。正如霍克海默尔在1939年所写的：“劳动纵队派往军械工业，建筑越来越新的交通干线，建筑地下铁路和公共房屋，从这种动员中能够得益的极少，除了一个巨大的坟墓。”<sup>②</sup>纳粹

---

①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第415页。

②霍克海默尔：《犹太人和欧洲》，见《社会研究杂志》第8卷，1939年，第133页。



带来的痛苦的最后结局就是成百万的士兵和公民死亡。而霍克海默尔所说的“巨大的坟墓”由于犹太人民的大量灭绝成了讽刺性的譬喻，象马尔库塞、阿多尔诺，弗洛姆和霍克海默尔他们自己也都是犹太血统。

## 五、控制问题

纳粹德国的历史证明，甚至在痛苦达到极端的形式时也不能自动地激起革命高涨。流亡国外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此不能有所帮助，反而受到纳粹恐怖统治力量的压迫。诺伊曼反而把这种统治看成“庞然大物”，当波洛克承认关于是否有一个纳粹“国家”这一问题的正当性时，强调这一政体尽管有内部竞争却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利益把统治阶级捆在一起，期望纳粹德国会由于经济矛盾的后果而从内部崩溃则是错误的。

霍克海默尔支持波洛克否弃法西斯主义不可避免地经济上崩溃这一“如意算盘”，这位所长确信“这样的社会能持续一个很长的而且使人恐怖的时期。”<sup>①</sup>至于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前景，无产阶级起义可以是一种“似乎可能的期望”，但是霍克海默尔对于集中化的政治领导丝毫没有信仰。对于霍克海默尔来说，“局外人规劝德国工人起义完全是幼稚的事。”不得不承认，恐怖政体是效率极高的，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在政治上活动，就应当避开它”。<sup>②</sup>

---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前言》，见《哲学和社会科学杂志》第9卷，1941年，第198页。

<sup>②</sup>霍克海默尔：《犹太人和欧洲》，第135页。

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组织理论将在第三章讨论，目前有必要看一看，对于研究所来说，德国历史怎么会形成一个特殊的问题：控制。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整个趋向（至少可以算到20世纪60年代末马尔库塞的激进化）正如他们所写的：革命前景日益后退。这种感觉概括在霍克海默尔对《研究》所撰写的文章中，在其中我们可以读到革命时机是“罕见而短促的”，即：

“过时的社会秩序被迅速地修补了（从外观上更新了）；恢复时期持续得很久，而在它们之中过时的文化机构正如具体风俗的网络一样，在社会成员的精神状态的形式中得到了新的力量；现在需要的乃是对这些机构作精确而系统的分析。”<sup>①</sup>

按照以前的说法，这种分析大部分是属于上层建筑的。心理的和“美学的”组成部分将在下文讨论（分别见第四章和第五章）；但是，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控制理论有弱点，但对于理解以下看法却是必不可少的，对控制问题的关心并非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附加物而被构想出来，它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确定的社会—政治的前后关系中面临的最紧迫问题。

当然，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甚至在恐怖统治之前纳粹如何能得到如此众多的支持。霍克海默尔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含蓄地作了简要的回答，他将研究所的注意力集中于工人贵族和白领工人。按照这种看法，霍克海默尔的同事利用了两个突出人物的未完成的著作：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和威

---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总论》，见《权威和家庭的研究》，第15页。

廉·赖希。如果说后者对于科学范畴的演化更重要的话，那末前者无疑提供了对当代白领工人的第一本认真的研究著作：《职员》。

这本书倒不如说是有关通货膨胀对小额存款之影响的报道，它是对一种社会集团的研究，这一集团的“无产阶级化”已经在稳定和扩张的基础上发生。工业生产中的白领成分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末之间已超过两倍。德国目前有350万办公室工作者（包括100万以上妇女），其中三分之一以上在工业中任职。其原因是明显的：大规模的生产；分配机构的扩大；由于流通领域中不断增长的数量和速度而增加的帐目。然而，办公室工作的质变也同样地显著，其根源仍然是合理化：

“合理化意味着机器和‘传送带’方式渗透到大公司的办公室。谢谢这种改革（以美国为模型，远未结束的），今天白领群众的大部分在劳动过程中委派了职责，而劳动过程与以前相比已大量地缩减了……”

资本的国家管理官员已经变成一种国家的军队，其数量越来越和‘私营的’可以相调换。”<sup>①</sup>

无产阶级化了的办公室工作意味着半自动的脑力劳动具有可互换性，此外，对所有人来说劳动市场的变化是明摆着的。而且那些蓝领工人的工资确实是低下的。

但是，为什么这些职员不参加工人阶级的政党，德国社会党或德国共产党？为什么他们选举，而且大规模地选举，

---

①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职员》，1929年初版，1971年法兰克福再版，第12—13页。



并日益走向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克拉考尔的采访揭示出如下的事实，对于职员来说，他们之间的差别比起使他们区别于无产阶级（“感谢上帝！”）的鸿沟来说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克拉考尔试图用意识形态来解释这种情绪，这种意识形态虽然在经济实体中逐渐损害了，但仍然活在职员的心灵中，他们客观上是“精神上无家可归”，但是，他们从前的家活在他们的头脑中。

克拉考尔概述了办公室劳动者的等级结构，并解释了所有这些工人几乎都有某些能力和机会当“小雇主”，模仿企业家的“一家之主”的态度。有一个杜撰的极好的比喻可表示这种情况：“在与军队的训练相似的条件下，至少可以期待将发展出一种循环的心理。对某些军队士兵来说，‘骑自行车者’是一个普通的绰号——从他们的背来看他们是停止的，从他们的脚来看他们踩得很辛苦。”这一分析的心理成分在克拉考尔以下的谈论中很清楚，即等级制度提供给“他们以本能的满足”。在法兰克福随后的著作中，这一理论通常被用来解释独裁主义的心理学机制。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在此后的事业中也有一个先驱者：威廉·赖希。在回顾了魏玛德国和自由主义民主政体的崩溃以及他自己与斯大林主义者的极其辛酸的经验以后，他写道：

“当然，揭露社会民主党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客观作用是必要的。但是经验教育我们，这种揭露尽管重复一千次以上，并不能使群众相信，这就证明单靠社会经济的观点是不够

---

①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职员》，1929年初版，1971年法兰克福再版，第89页。

的。毫无疑问，群众将要干什么这一问题的出现，使他们不能或不愿认清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的作用。”<sup>①</sup>

赖希明显地过高估计了法西斯主义持有的对工人的吸引力，但是，从不断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心理学范畴所涉及的内容而言，他的著作毫无疑问地通向法兰克福学派。尚未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弄清楚是否霍克海默尔的同事也让他们的心理学理论混淆了魏玛共和国阶级斗争的现实，也还需要看一看这一控制理论在满足霍克海默尔关于理论—实践联系的最激进的概念的要求上是否成功。总之，有必要对魏玛共和国的阶级斗争以及现代生产过程的精确的控制特性提供一个更详细的描述，而且也有必要暴露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中的曲解，这些曲解都是由于他们对这些问题的不适当的关心而造成的。这些批判性的思考将在最后三章系统提出，特别是在第三章，但是在此以前，有必要恰当地详细介绍法兰克福学派综合的理论参考结构：“社会批判理论”。

---

<sup>①</sup>赖希：《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关于政治反应的性经济学和无产阶级的性政治学》，第二版，哥本哈根，性政治出版社，1934年，第36页。

## 第二章 “社会批判理论”：对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这个称号是一个不严格的名词，只是在事后才使用的。霍克海默尔的同伴们把这称号引伸为“社会批判理论”。霍克海默尔在1937年发表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一文中，最清楚地阐明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性质。同年，霍克海默尔和马尔库塞合著的《哲学和批判理论》，又对“社会批判理论”进行了补充。这种长期的讨论反映了“批判理论”意味深长的作用，它成为《社会研究杂志》随后刊载的论文和马尔库塞目前著作的显著特色。1938年，马尔库塞把“批判理论”解释为“刊载在《社会研究杂志》上的那些以辩证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阐述性论文中所提出的社会理论”。<sup>①</sup> 20世纪60年代，在重新出版霍克海默尔的论文时，这位研究所的前任所长将文章汇集于“批判理论”这一总标题下，并在前言中以“社会批判理论”的措词明确地解释了他的著作的意义。此后，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宣言》意味着什么的问题，霍克海默尔曾有所解释，这里的“批判”一词，“并不完全如同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批判那种意义上的理想主义的、纯理性的批判。”<sup>②</sup> 这

<sup>①</sup> 马尔库塞：《论享乐主义》，见《否定》，第282页。

<sup>②</sup> 霍克海默尔：《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见《社会研究杂志》第6卷，1937年，第261页。



一陈述是明确的：在康德哲学意义上的“批判”确曾起过一定作用，不过这个作用比之于马克思赋予该词的意义来说，只能是从属的。霍克海默尔接着在文章中叙述了两者之间的共同点：“社会批判理论”把人看作是他们的全部文化的创造者，因而也就是与他们的观念相应的客体的制造者：“企图将似乎不可改变的真理的素材……同人类生产联系起来，这是社会批判理论同德国唯心主义相一致的基点。”<sup>①</sup>正如所要说明的那样，法兰克福学派把“社会批判理论”中被保留的以及被唯物主义化的或被扬弃的德国唯心主义成份作系统阐述看成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

### 一、1937年的《宣言》

《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这篇文章，认为理论的作用是一种媒介，它把不同的科学分支的结论逐渐统一起来，归属于一个共同原则。一方面是“传统理论”中具有的特殊形式，另一方面是“社会批判理论”中具有的特殊形式；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它们之间的区别超出了理论自身的范围。根本之点在于陷入一种意识形态的冲突。然而霍克海默尔所期望的不是掩盖而是详尽地再现这种冲突。

霍克海默尔继续指出：在“传统理论”中基本要求是“所有组成部分都是以摆脱了矛盾的方式在完善的参考系中联系起来的”。<sup>②</sup>霍克海默尔强调通过单纯的脑力劳动达到和

---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哲学和批判理论》，见《社会研究杂志》，第6卷，1937年，第625页。

<sup>②</sup>霍克海默尔：《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第247页。

谐的企图，反映了对物质生产过程的非批判态度，由此引起了在这一观点的绝对性之中所潜伏的有害作用：

“任何理论概念……其构成是自律的（好象这种概念是根据有关知识的‘本质’或根据其他某个与历史进程无关的东西而形成的），概念总是转化为具体的意识形态范畴。”<sup>①</sup>

霍克海默尔概述了在认识和研究领域内的社会—历史的决定因素，从而推翻了这种与历史无关的见解：科学领域是由工业及政府管理并供给资金的；它们的指令多数是生产过程的指令；尤为重要的是，观念的客体是历史地被赋予的，而观念的主体（人）则是历史地和社会地由他的方法论的及范畴的工具所决定的。

在有关意识的社会作用和无意识的社会作用之间的两分法方面，《宣言》展现了这种历史决断的高度辩证法；霍克海默尔提出了“社会”和“个体”的整体概念问题：

“在这里，后者——‘个体’表现其自身为被动的、依附的，而前者——‘社会’毕竟还是由个体所组成，但却是主动的，尽管是不自觉的，因而也是非权威的主体。人和社会的生活方式的区别乃是迄今为止一切历史上的社会生活方式之深刻分裂的表现。社会生活方式要末依靠直接的压迫，要末就是由对抗势力所造成的盲目结果；总之，肯定地并非由于自由个体有意识的、一时冲动的行动的结果……。在资产阶级的条件下，社会活动虽是盲目的然而却是具体的，而个体的活动虽是抽象的然而却是有意识的。”<sup>②</sup>

---

①霍克海默尔：《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第250—251页。

②霍克海默尔：《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第256页。

因此，真正的自知和真正的自我完成并非纯粹智力活动，而是包含了与改造社会有实际关系的行动：“社会批判理论”是“在合理条件下伴随着某种利益而提出的”。<sup>①</sup>理论就这样在双重意义上被扬弃。

这种扬弃的第一方面是“知识”的历史的决定因素在其给定形式中的充分反映。虽然仅就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知识”是相对的。显然，这种扬弃不能解决问题：“社会批判理论”把不同研究领域出现的矛盾和片面性（当从属于这种总批判时）视为劳动分工的必然产物。就阶级对抗而言这一点特别如此，虽然这在理论上并未得到“解决”，但是却已从容地发展为充分的自我意识。“社会批判理论”谈到力量和反抗力量的同时，希望把这种力量提高到自我意识中以加强社会的压力：“理论……推动整个社会的改造，它的直接结果使得和它相联系的斗争尖锐化。”<sup>②</sup>因此，在科学中矛盾的最终扬弃是社会重建的实际行动：这一过程的间接联系就是与阶级斗争相联系的理论。这就是霍克海默尔把这一理论称之为“批判的和对抗的”理论的原因。

诚然，实际上，理论—实践的关系远比霍克海默尔在此文中所概述的要复杂得多。一切事情都视该理论是否真正与有关的“斗争”相“联系”而定，并且以两件事为先决条件：其一，“社会批判理论”承认基本的斗争之全部辩证特性，其二，这种理论是以实际方式卷入其中的东西的中介。仅仅指出矛盾的必然性和使人们意识到这些矛盾是不够的，真正的革命理论包括组织和政治行动的理论。需要的是政治

①、②霍克海默尔：《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第254页，272页。



的一批判的理论。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概念中，这一点恰恰是缺乏的。然而，对这种特性的元批判只能在从整体上对“社会批判理论”作详细剖析后才能充分地进行。在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缺点之前，必须对它的力量给以充分评价；而它正是具有许多力量的。

除了这一切以外，《宣言》标志了对理论作用的概念有所进步，正如霍克海默尔在就职演说和《社会研究杂志》编者序言中所表明的那样。文中把未来（至少是含蓄地）看作是未决定的东西，而不是认为通过革命理论和革命阶级之间的联盟就可决定的东西。相反，社会理论却担任了“预言”未来的学院式的任务。依照《宣言》，未来掌握在人的手中，更精确地说，即掌握在有前途的阶级的手中。与此同时，霍克海默尔谈到资本主义发展到野蛮状态及其革命的变化，这两方面都是来自经济矛盾的逻辑的必然结果。这并不是霍克海默尔思想混乱的证据。这表明他意识到这种向着野蛮状态发展的盲目倾向，只能被组织起来的政治斗争和对生产过程的革命改造所制止、所击败。

“社会批判理论”的另一个特征是它谨慎地、自觉地与实用主义保持一定距离。霍克海默尔强调：这种与实践的关系，如果它不是社会地变异着的，那就纯粹是“传统”的。确实，实用主义在作为整体的“传统理论”中是固有的。至于对实践的“批判”观点那是根本不同的；

“虽然，批判的立场来自社会结构，但是不论与它的自觉意图或它的客观意义都是无关的，以致这种结构中任何东西都起着更有效率的作用。当然，象有效性、实用性、适宜性这些范畴，‘多产的’和‘贵重的’这些价值，从它们目

前的意义来说，批判的理论家把它们看成可疑的、未定的；它们决不意味着可以想当然地作为超科学的前提。”<sup>①</sup>

显然，“社会批判理论”在此可以汲取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遗产，尤其是它的黑格尔的形式；霍克海默尔确实利用黑格尔的范畴对“真理”的辩证发展作了解释。但是这些范畴现在却是唯物主义的，并且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形成了“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石。霍克海默尔说，社会批判理论开始于“对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的描绘”。<sup>②</sup>

就理论对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关系而言，霍克海默尔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同一方法的蕤例”。<sup>③</sup>在马克思方法中保存了黑格尔方法的那种辩证的、批判的抨击：“与现代经济学专门科学的进程对比而言，社会批判理论，即使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式出现，它也仍然是哲学上的理论。”<sup>④</sup>这里使用的“哲学上的”一词，切不可误解，霍克海默尔的《宣言》也略述了消亡的契机，它就包含在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中：“社会批判理论”的目的就是“阶级社会的消亡”。也就是说，这是“唯心主义理论观念中的唯物主义内容”，在修改和引伸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研究的著名结束语时，霍克海默尔说，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批判理论”保留（并实现）的不只是德国唯心主义的

---

①、②、③霍克海默尔：《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第261页、277页、284页。

④霍克海默尔：《哲学和批判理论》，见《社会研究杂志》第6卷，1937年，第627页。

遗产，而是“所有哲学”的遗产。<sup>①</sup>理论本身的实体化已消除：理论成为社会革命斗争的一个要素。

从哲学到社会理论的转变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基石的关键：名之为意识形态批判：“现代辩证哲学认为个体的自由发展有赖于社会的合理体制。在分析当代条件的基础时，这种哲学就转向对经济的批判。”“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抹煞德国唯心主义的价值；相反，它使这种哲学的唯物主义方面激进化，并且阐明与之有关的评价在客观上被曲解的现象。

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概念转向其对立面：自由交换转向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自由经济转向垄断；生产劳动转向抑制生产的条件；社会生活的再生产转向全民族的苦难。人类确实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并且达到了理性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程度；但是迄今人类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异化的世界，类似于难以理解的超越人类本性的世界。“这种世界不是他们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因此唯物主义对理性的批判成为合乎情理的革命要求，即建立无阶级的社会。

## 二、通过前《宣言》形式提出的“社会批判理论”

《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这篇论文并不是一种新发展，也不象早期的《社会研究杂志》那样对各种不同成份进行加工提炼。“传统理论”从第一期开始就遭到攻击。1935

---

<sup>①</sup>、<sup>②</sup>霍克海默尔：《哲学和批判理论》，见《社会研究杂志》第6卷，1937年，第626页、626页。



年霍克海默尔驳斥了实用主义，他说：真理是促进生活和“有得益的”思想就是真的这种认识论理论，包含着“折衷的误解”；除非这种认识论是以下理论整体的一部分，在这理论整体中“向着更好的、确实是促进生活的生活趋向”能够得到表现。

黑格尔的范畴的作序也就相当于《社会研究杂志》早期的特征。1934年，研究所所长对“传统理论”提出如下评论：

“各个单独的学科只能提供历史进程的理论结构的组成部分，而这些部分一经纳入这种结构，就不再保留其在单独学科里的含义，而获得了先前没有提到过的新的含义。这样，所有真正的思想只能理解为从抽象的决断作出的评论之延续。这类思想包含了批判的、或如黑格尔说的不可知的因素。”

但是最广义的思想批判也能触及德国唯心主义本身。资产阶级社会的“原则”和这一“原则”的客观现实性之间的不调和性只能由一种理论来揭露，这就是“唯物主义”。后者的名称不象后来的《宣言》那样精确，即使如此，辩证哲学的扬弃仍被视为明白的主题：黑格尔（和康德）把理性看作是主观自由和客观自由的统一，这是正确的，但是“这一理论的实现就从哲学导致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唯心的怀疑论变成实践的怀疑论。“社会批判理论”根本不是最后的结论，更确切地说，这一理论是“正确行动的前提”。（辩证

①、③霍克海默尔：《关于真理问题》，见《社会研究杂志》第4卷，1935年，第343页、334页。

②霍克海默尔：《论理性主义》，见《社会研究杂志》，1934年，第22页。

的意识形态批判是理论作自我超越的一个阶段。而黑格尔—马克思的过渡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概念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 三、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中的“批判理论”

理性和革命，是法兰克福学派论及黑格尔—马克思的过渡时表达得最清楚有力的陈述，它指出了批判理论的两种形式：

“黑格尔……承认人们已获得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是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理性得到了实现。他的体系把哲学引入否定之门，并由此建立起批判理论的新旧形式之间以及哲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唯一联系。”<sup>①</sup>

法兰克福学派参照这一发生过程，花费很大精力引伸他们的理论和范畴，当他们最终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时，他们力图揭示黑格尔辩证哲学的丰富的批判的内容。

在加入霍克海默尔小组之前，马尔库塞出版的主要著作题为《黑格尔的本体论》。这一著作虽然主要是对黑格尔著作的内容的重新评价，但已朝着法兰克福学派的评论方向发展。阿多尔诺在《社会研究杂志》中回顾此书时，称赞马尔库塞离开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马尔库塞正从‘存在的意义’走向‘究竟是什么的分析’，从本体论走向历史哲学，从“历史性走向历史”。

最初，马尔库塞关心的是论证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力量在于它的辩证的历史特质：

---

<sup>①</sup>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1967年伦敦再版，劳伦斯杰和基根·保罗出版社，第252—253页。

“存在的基本含义以及决定存在概念的第一阶段的含义是‘主观’和‘客观’这两个对立面的原始统一（自为、自在、客观存在），黑格尔把这种统一表达为结合的统一和某个确指的行动，即被认为是存在的基本特性的运动。”<sup>①</sup>

对能动性是什么的研究就成为历史是什么的研究，这样：“人类历史就不仅仅是发生‘在’世界之中（如同在本质上不同的某些事物之中那样），而是与世界的演变同时发生，因而没有丧失其本质的特色。”<sup>②</sup>现象学被扬弃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中。

马尔库塞声称，黑格尔对客观化过程及其尖锐化的断言，作为构成生命存在的活动，是黑格尔的“最伟大的发现，它是历史过程新观点的源泉（在此以前完全被遮蔽了），也正是由于黑格尔才使这一观点成为可能<sup>③</sup>。”这样，黑格尔的成就正如他最终的失败一样恰恰在于他把存在作为一种发展过程这一概念中。在这种发展中客观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黑格尔来说，则是命中注定的作用。

对黑格尔来说，精神是实体、是本体，也是一切存在和历史的目的是。精神就其自身而言是存在的本质。通过存在的过程“为其自身”所生成，即作为其自身结果而构成，并为其自身所承认。根据黑格尔令人迷惑不解的叙述，精神取得的形式最初与其自身异化，表现为异己的形式，即成为客观的形式（gegenständlich）。但同时这种异化了的精神仍然是精神，一旦这种实体认识了自身的本来面目，那末

①、②马尔库塞：《黑格尔的本体论》，第5页，217页。

③马尔库塞：《黑格尔的本体论》，第280页。



精神就扬弃了它自己的异化，并通过整个过程成为“自在和自为的”。

去除了这些唯心主义的术语，这一过程包括了人类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的具体社会实践。这一唯心主义术语具有唯物主义的一面：这样，概念或见解当其成为“完全现实”时仅适用于其自身。并且理性不仅是精神劳动，而且也是“有目的的活动”。<sup>①</sup>这样，禁欲主义的“自由”决不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作为思想的自由仅仅是作为其自身的真理的纯粹思想，因而缺乏对生活之具体的履行。所以，这里仅有对自由的见解而非活生生的自由本身。”<sup>②</sup>“活生生的自由”只能在合乎理性的生产一过程的基础上建立。因此黑格尔把注意力转向了后者。

劳动产物是“产品”（Werk），在黑格尔看来即意识赋予自身的现实。唯心主义者的分析强调‘产品’是作为一个整体投入社会领域之中的，并且强调这一现实不仅是生产者一方的个人关系。黑格尔未作具体的详尽论述，就探索‘产品’向作为“真正的产品”这一结果而发生的最高度社会性发展的过程（das wahre werk, or die Sache selbst）。因而产品的主体——人本身就包含于、并实现于一般主体之中，即社会团体之中。诚然，黑格尔未能阐明这一通向无阶级社会过程的物质方面，而且他的唯心主义实际上破坏了这一潜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见50页），但它

---

①、②、③、④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英译者，贝利，伦敦，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31年，第55—56页、75页、83页、245页。

仍然对辩证唯心主义取得卓越的成就，即它将注意集中于生产过程，强调了作为人类社会的需要的社会化。

然而，对法兰克福学派来说，黑格尔现象学之批判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唯物主义成份，而且在于作为精神的最终产物的历史唯心主义概念完全是人类生产力的真实异化之批判的反映。霍克海默尔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未接受把人类的直接意识和意志作为迄今历史发展的基本推动力。“他们认为……黑格尔主义者确信超个体的动力结构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存在，但摒弃了历史中自主的精神力量在起作用的信念。”<sup>①</sup>因此，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分析的，‘精神’不是单纯的“人”的能力，而是活动于阶级社会中的异化了的人类的能力，至于说到当代社会，乃至资本主义社会，也同样如此。

#### 四、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中的“传统理论”

虽然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具有一种批判的意义，但这只有通过唯物主义者的全面批判后，才能成为适宜的。霍克海默尔的就职演说已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理想化的性质进行了抨击。在《关于真理问题》一文中对此有长篇大论的叙述：

“黑格尔相信他的思想掌握了一切存在的要素，他的体系把这些要素按照完善的、自给自足的等级制度统一了起来，这一体系不随个体的发展和消亡而受到影响，意味着……在基本的世俗条件下思想的永恒性。辩证法表现出一种理想

---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历史和心理》，见《社会研究杂志》，第1卷，1932年，第130页。

化作用。在黑格尔看来，社会秩序中的主人和奴隶，如同贫困和苦难一样，都是各得其所地被认可的。其程度正如在他们被同化于其中的概念结构一样，这一概念结构象征了更高的价值，即神圣和绝对。”

被实现了的黑格尔的理性，“在客观现实能够被肯定为合理的之前，已成为肯定的了。”<sup>①</sup>从这个意义上说，甚至辩证唯心主义也纳入“传统理论”之中。

法兰克福学派根据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看到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牵强附会之处。马尔库塞写道：“德国唯心主义把资产阶级社会作为其普遍概念之展现的一种模式；从这个意义来说，其理论为社会奴役作了新的辩护。”<sup>②</sup>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唯心主义概念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在意识形态上的逃避；劳动成为唯一的脑力劳动，因为任何具体劳动在矛盾中都将成为政治革命。

黑格尔的本体论自始至终强调唯心主义逻辑，是为了有利于“绝对知识”的永恒观念，它逐渐削弱了一切历史范畴，从而也削弱了批判范畴。既然一切事物是精神，既然黑格尔“承认了”这一点，从而异化就“不再存在”。这揭示了在唯心主义结构内部的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的不易觉察的有害作用；客观世界被扬弃这一特定阶段完全是专断的

---

①霍克海默尔：《关于真理问题》，见《社会研究杂志》第4卷，1935年，第332页。

②霍克海默尔：《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第259页。

③马尔库塞：《对权威的研究》，见《批判哲学研究》，英译者：乔里斯·德·布雷斯，伦敦，国立盲人图书馆出版社，1972年，第88页。



（不是达到更高的生产方式，而是完全背离了它）。黑格尔没有以实际的措词来解释主人—奴隶关系是怎样得到的，也没有用社会主义化的唯物主义来表达它，他把“绝对知识”强加于其上，这种绝对知识完全是由观念构成的思维产物。这就是黑格尔本人所承认的“理想化”。对黑格尔来说，遗憾的是这种理想化并不意味着时间的“废除”。唯心主义的世界历史可能是完满的；但是真正的历史在继续，正如阶级社会的矛盾在继续一样。

### 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对法兰克福学派来说，理论超越这一目标而前进的唯一可能路线就是超越哲学而前进。在法兰克福学派著作的第一个重大时期结束时，马尔库塞对此是这样总结的：

“当哲学形成了理性已在其中实现的世界观时，这一哲学就达到其终点。如果从这一论点出发，现实实际上包含了理性物质化所必要的条件，思想会停止其自身对最终目的关心……，批判思想则并不停止，而采取一种新的形式。理性的努力就转向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sup>①</sup>

因此，“社会批判理论”这一术语就标志了一种根本的发展，而不局限于霍克海默尔所长就职演说的范围以及他所谈到的“社会哲学”；这一新术语反映了唯物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更密切的联系。

马尔库塞对“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阐述，就是他的《哲学和批判理论》这篇论文（此文虽和霍克海默尔合著，

---

<sup>①</sup>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第28页。

但大部分是由马尔库塞写的)，在对马克思的释义中，马尔库塞写道：

“当这一理论开始时，即在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哲学是意识的最先进的形式，相形之下，德国的现实条件却是落后的。在德国，对现存制度的批判是作为对那种意识的批判而开始的；因为不然的话，它将会使它的对象面临比德国以外的其它国家已达到的现实更原始和更落后的历史阶段。”

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以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开始的；而法兰克福学派则竭尽全力强调和阐述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一创新的方面。

在1932年出版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证实了卢卡奇和柯尔施着重强调的以及为法兰克福学派采纳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哲学起源的论点是正确的。马尔库塞对黑格尔本体论的评价与马克思早期著作有直接相似之处，在这一评价中，黑格尔的“卓越成就”被认为是对那种已异化的、而且被超越的、具有客观性的人类自我认识的辩证的阐述。这一辩证范畴的阐释同它所包含的价值一起为马克思所引用，不过，马克思只是通过唯物主义的全面批判后才引用的；马克思评论黑格尔时谈到：

“事实并不在于人类背弃自己而肆无人性地使自身客观化，但是人类以不同于抽象思想以及与抽象思想相反的方式使自己客观化，这却是事实。这就构成了被扬弃的异化之确定的本质……因此，以异化的形式产生的人的客观本质的再

---

①马尔库塞：《哲学和批判理论》，见《否定》，第134页。

现，〔被认为〕不仅是异化的废除，而且同样也是客观性的废除，从而人类被视为不真实的精神的存在物。”<sup>①</sup>

当然，对马克思来说，生产过程（客观化）不是本身的异化；生产是人类实现其潜力的活动。但是马克思认为客观化和异化的平衡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客观事实：工资劳动。黑格尔的范畴揭示了有关现代商品生产的一些基本真理，也包含了对这种制度的抗议。正如马尔库塞所写的，“与人类潜力和理性潜力有关的问题现在能够从经济学观点提出。”但是，只能是由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范畴为依据的经济学！

但是，正如《理性和革命》一书着重指出的，辩证唯心主义的批判核心不仅被扬弃为一种新的理论，而且成为革命的社会实践。马克思比较了他和黑格尔对辩证法的运用，把他自己的方法的“理性”形式说成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没有“扬弃”异化，而只是对这种现象从理论上作了不充分的表述。异化在继续，它所达到的理论上的明晰性正如它的社会形式一样，也正如物质的先决条件对异化的超越一样。只有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和一切阶级社会的实践才能废弃异化。马克思在他最早期的批判黑格尔的文章中已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

“正如德国政治意识的流行模式的坚决反对者一样，对正义的思辨哲学的批判并未停留于其自身之内，而是在如此的艰苦工作中继续进行，因为它的解决办法只有一条——实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克、斯特罗伊克编，伦敦，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社，1973年，第175页。

②马尔库塞：《哲学和批判理论》，第134页。



践。”<sup>①</sup>

正是为了这一点。马尔库塞在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的”成分时，补充了马克思理论的宗旨是“实践和革命”，即“由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社会”。<sup>②</sup>

然而，要充分掌握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必须了解这一点，即使对掌握马克思的学说来说也同样重要，即懂得哲学的扬弃之双重方面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19世纪40年代，面临革命即将到来之际，马克思写道：“你不能在没有实现哲学之前就超越哲学”。<sup>③</sup>这一箴言比其它一切箴言都更确当地成为法兰克福学派解释马克思的基石。霍克海默尔引证马克思的话很简略（至少可以这么说！），他特别提出的就是这一段。

## 六、辩证思想与非辩证思想的对立

如果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过渡是法兰克福学派解释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的话，那么，他们竭力要陈述的当代理论争论，正是通过这种解释而说成是由卡尔·柯尔施与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理论家相互猛烈论战之中所引起的争论。这种猛烈的论战（尽管法兰克福学派很少这样称呼），对于20世纪30年代时他们的早期阶段来说是决定性的关键；这种论战只有通过黑格尔到马克思过渡的全面理解才能充

---

<sup>①</sup>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约瑟夫·奥马利编，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37页。

<sup>②</sup>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见《批判哲学研究》，第4页，1932年版。

<sup>③</sup>同<sup>①</sup>，第136页。

分解决。

第三国际以题为《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文对列宁于1909年写的主要著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提出了论证。（虽然在与柯尔施的辩论逐步展开时，列宁已无能为力，生命危在旦夕）。列宁在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行的广泛研究中，论证了至今为自然科学所共同具有的唯物主义观点，根据这一观点，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列宁也强调了自然科学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必要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常常论证的），同时把这一点补充到认识理论中：“我们必须辩证地思考”。遗憾的是列宁未着手进行对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在反对马赫及其追随者的激烈的长篇演说中，他自己只满足于谈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

“唯物主义承认‘自在客体’或心外客体，认为观念和感觉是这些客体的复写或反映。与此相反的学说（唯心主义）认为：客体不存在于‘心外’；客体是‘感觉的组合’。”<sup>①</sup>

在这一点上，列宁完全忽视了辩证法，并且提到“马克思的哲学，那就是，唯物主义”。

正如以前所提到的那样，霍克海默尔偶然也使用“唯物主义”这一措词，这只是单纯地为了指明他的方法。但是，霍克海默尔总是强调，这意味着各种唯物主义曾经“在黑格

---

<sup>①</sup>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北京，外语出版社，1972年，第14页。

<sup>②</sup>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北京，外语出版社，第64页。

尔的逻辑学中受到训练”。而且在这方面霍克海默尔做的要比他说的更多。霍克海默尔和他的同事作为一个整体，费了很大功夫去揭示这种训练。列宁却没有这样，当列宁在提到“唯心主义体系的有价值的成果，黑格尔的辩证法”<sup>①</sup>时，从来未详细说明这种“成果”与朴素唯物主义相比的批判意义。当时这一空白对于1909年的著作还没有多大的重要性，（毕竟这篇著作是对新唯心主义的抨击），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唯物主义与经济批判主义》成为“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权威性的陈述，这时它就具有了灾难性的影响。这本“神圣的教材”发现了柯尔施这个公开的对手，同样地也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发现了许多隐晦的对手。

1923年，柯尔施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还没有必要面对“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法规；因此，它是作为对那时还面貌不明的集团——“时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而提出的，这些人误将“马克思对哲学的消亡解释成用一系列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实证科学来取代这种哲学”。<sup>②</sup>然而，柯尔施对列宁1909年著作的评价却是不容怀疑的：“完全是从资产阶级普通常识出发的天真的形而上学观点，认为思想独立于存在之外，而且将真理解释为思想与外在于思想的物体之间的一致，并且是外部物体的‘镜像’。”<sup>③</sup>这一论断使柯尔施成了第三国际中的一位显

<sup>①</sup>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北京，外语出版社，第289页

<sup>②③</sup>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英译者：弗雷德·哈利戴，伦敦，国立盲人图书馆出版社，1970年，第62页，83页。



赫人土。

1930年, (霍克海默尔上任之年,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书中谈到了季诺维也夫将其著作痛斥为“修正主义的异端邪说”。<sup>①</sup>接着,柯尔施反唇相讥,认为这种反击是基于对马克思认识论的一种拙劣的解释。既然他的对手是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那种说法是非批判地建立在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基础上,于是柯尔施对后者进行了直接而彻底的驳斥。

柯尔施指出:当代资产阶级科学中的主要倾向不是唯心主义,而是被渲染成“带有自然科学色彩的唯物主义观点”。<sup>②</sup>列宁未能就包含在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中的真正扬弃作出评价:

“列宁认为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过渡只不过是一种‘调换’:建立在黑格尔辩证法基础上的唯心主义观点为一个不再是‘唯心主义’、而是‘唯物主义’的新哲学观点所取代。他似乎未意识到这种唯心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转换’至多涉及的是一个术语的变化,借此“绝对”不再称之为‘精神’而称之为‘物质’。”<sup>③</sup>

因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这一任务是不胜任的,即对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及其推理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同样,“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胜任这一任务,即对被霍克海默尔称为的“传统理论”进行否定,从

---

<sup>①②③</sup>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评》,见《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30年版,第90页、114页、115页。

某种意义上说，“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就是“传统性的”。

对列宁—柯尔施之间的争论，法兰克福学派显然同情柯尔施。早在1931年，马尔库塞在加入霍克海默尔行列之前，就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建有重大价值的阐述。马尔库塞还积极地引证柯尔施的著作，包括其中的谴责，即现在宣传的拙劣的唯物主义知识理论（马尔库塞没有重复柯尔施对列宁所作的明确的引证）“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整个辩论拉回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已经超越了的历史阶段”。<sup>①</sup>

几年以后，在《苏维埃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马尔库塞明确地提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是以“原始的自然主义的实在论取代了真理的辩证概念，从而成为苏维埃马克思主义的典范”。<sup>②</sup>这至少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与第三国际有距离，这一问题将于第三章中详细讨论；与“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保持距离，也应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选择“社会批判理论”这一称号的主要因素之一。

阿多尔诺在60年代所著的《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写道：“马克思已在历史唯物主义和那种唯物主义的通俗形而上学的变种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从此以后，唯物主义不

<sup>①</sup>马尔库塞：《历史真实问题》，见《社会：社会主义与政治国际评论》，第8卷，1931年，第350页。

<sup>②</sup>马尔库塞：《苏联马克思主义：一项批判的分析》，1958年初版；1971年哈门兹沃斯企鹅出版社再版，第123—124页。

再是武断的反对论，而是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和被唯心主义歪曲了的现实的批判这二者的方法论的精髓。霍克海默尔的公式‘批判理论’所追求的并不是使唯物主义有更高评价，而是利用它使人从理论上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使唯物主义自身区别于非专业哲学的东西正是它不同于科学的‘传统理论’之处。”①

整个问题因此可以归结为对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非辩证的唯物主义的双重扬弃。这就说明了法兰克福学派对黑格尔—马克思过渡的关注。

### 七、哲学的扬弃在历史上的疑难

“哲学没有现实化以前你就不能超越它”，这一马克思的论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概念中理论与实践的牢固的辩证统一；不仅把“社会批判理论”（作为理论的较高级形式）坚决地推向实践，并且超越了理论本身的界限，而且实践地实现了哲学批判的内容。只有在这一阶段哲学才最终地被超越。在这种现实化以前，理论内部不稳定的平衡，马克思并未详细说明，对于法兰克福学派——魏玛共和国的知识分子批判家来说，这种平衡成为紧要的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的同辈人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瑟尔最近对“社会批判理论”这一现象作了解释，正如霍克海默尔的同道所阐述的那样，是按照与革命的社会实践的距离远近来解释的，索恩—雷瑟尔（1899年生）声称：

---

①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英译者：艾什顿，伦敦，劳特莱杰和基根·保罗出版社，1973年版，第197页。



“今天听起来可能感到陌生，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德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例如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于那个时期（1918—23）的推动而产生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从失败的德国革命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中产生的。”

魏玛德国，正如第一章中所述，不仅是一个削弱“自由交换”的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垄断时期，而且还是一个向法西斯过渡的时期；这时，自由社会的价值不仅遭否定，而且实际上已被完全消灭，这样，整个的扬弃观念或现实化观念以及哲学就被激进的、新的群体所彻底改造了。

《社会研究杂志》的文章展现出支配这一群体的自觉企图。马尔库塞写道，从60年代的观点来回顾自己的贡献，这些文章似乎印有时代错误的标志：“在30年代，这些文章已经表达了与哲学的关系，它是与过去的关系；对那些在某些时刻已经失去其现实性而现在又要使它重新复活的东西的追忆。”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里表达这一点时，间接地引证了马克思的一段话，这些话对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是很重要的：“一度看来过时的哲学继续存在着，是因为其现实化的时刻未被觉察。”<sup>①</sup>这些话反映了法兰克福学派对理论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它的初期：关心于保卫、批判，以及最终使哲学的批判的遗产具体化。

---

①索恩—雷瑟尔：《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关于社会综合体的理论》，法兰克福，祖尔坎普出版社，1970年，第8页。

②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第3页。

## 八、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是一个整体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关于哲学的扬弃之斗争，甚至从理论高度来说，都变成了持久而自觉的努力，特别是，斗争不得不卷入那种德国唯心主义非辩证的“转变”的一切理论潮流之中。自然，由于根据资本主义的矛盾来解释法西斯主义，因此敌人不只是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还有“传统理论”，一般来说，这就是指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堡垒。这一理论在《宣言》中已被指出，它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继续攻击的对象。

“传统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是“实证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用这一术语不仅指那些继续赞同这一称号的人，而且也泛指包括在“传统理论”范畴之内的理论家）。当然，实证主义在资本主义革命的上升时期起过进步作用：正如马尔库塞所强调的，实证主义“事实上就是对于作为旧制度的意识形态支柱的宗教和形而上学概念的直接攻击”。<sup>①</sup>但是，直到上一世纪下半叶，正如霍克海默尔概括的，这一科学定义表明把科学活动局限于“对现象的记录、分类和概括，而不考虑任何本质与非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分并非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需要：“科学和技术只是现存社会整体之中的要素，尽管有其一切成就，然而其它因素甚至整体本身都会倒退，这是完全可能的……”<sup>②</sup>在理论高度上，需要全面批判的观点，而实证主义做不到

<sup>①</sup>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第341页。

<sup>②</sup>霍克海默尔：《哲学的社会功能》，见《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第8卷，1939年，第327页。

这一点。

可是，实际发生的是实证主义被绝对化了；技术进步已成为一切理性活动的模式，马尔库塞坚持主张，这就阻碍了“以特定的它自身的综合批判来解释这些‘作为论据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落后于抽象观念所具有的辩证力量，甚至以其唯心主义形式表示出来。当然，黑格尔的“真理是一个整体”的名言最终导致了唯心主义的歪曲，而马克思的社会批判通过对它的物质化挽救了整体观点。这是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即包括历史及其进程的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恩格斯对自然科学所作的上述论断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研究吸收过去二千五百年间哲学发展的成果，才能使自己一方面摆脱任何在其以外的孤立的自然科学；而另一方面摆脱自己从英国经验主义继承的有限的思维方法。”<sup>①</sup>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章中）谈到“哲学”：

“哲学就这样出现在唯物主义理论的经济概念之内，每个概念不只是为经济学学术训练所用的这种经济概念。而且还是以人的社会存在来解释人类整体及其世界的理论主张。”<sup>②</sup>

---

<sup>①</sup>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主义丛书，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著作，第18卷，C.P.达特编，纽约，国际出版社，1939年，第10页。

<sup>②</sup>马尔库塞：《哲学和批判理论》，见《否定》，第134—135页。



但是，最后，即使这种“真理”不仅是社会的理论反映，这种“真理”也只有通过社会的革命改造才能实现其完整的含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资本的盲目的经济宿命论，正如恩格斯强调的，这种宿命论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清除。“真理是一个整体”从唯心主义的理想化转向提倡批判的社会实践。

阿多尔诺的名言：“整体是虚假的”<sup>①</sup>，似乎要否定方法论的教诲，但是现象经常是靠不住的。阿多尔诺含义隐晦的话不是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真理是一个整体”，而是针对唯心主义的推论“整体是真理”；这里的“整体”成为辩证过程中自给自足的与观念相应的客体之表达方式。正如马尔库塞稍后时写道：“‘整体是真理’，那末‘整体是虚假的’。”“社会批判理论”只有靠充分表露这种虚假才能成为真理，这种虚假自身只有靠革命才能根除。正如霍克海默尔在《社会研究杂志》中所说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真理”悬挂在阶级斗争的天平上。

“在当代社会里，存在着现实的社会历史形态。其不合理性已为思维所把握。辩证法并没有停息。在思维和社会现实之间不存在和谐，甚至在今天，矛盾仍被证明是一种推动力，因此，对这种势态的超越将在现实的历史斗争中达到……”<sup>②</sup>

---

<sup>①</sup>阿多尔诺：《极度低落的道德：被破坏了的生活的反映》，伦敦，1974年版，第50页。

<sup>②</sup>霍克海默尔：《蒙太奇与怀疑论的作用》，见《社会研究杂志》第7卷，1938年，第50页。

## 九、意识形态的批判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

这种“现实的历史的斗争”的一个方面是意识形态斗争，法兰克福学派从事的意识形态批判可用“真理是一个整体”这一辩证观念来明确说明。而且其自身是与任何作为‘纯谎言’的意识形态评价格格不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阿多尔诺含蓄地总结了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的方向，他说：

“在文化批判的主题中，一个最持久的中心主题就是这一谎言：即认为文化创造了与人相称的社会的错觉，而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社会……这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概念……但是彻底按照这种概念行动，那末一切真实的东西、一切虽然虚弱然而力图摆脱一般实践禁锢的东西将随同谎言一起被消灭掉；每一个更崇高境界的幻想亦将被消灭掉，由此直接导致那种野蛮状态，文化随之间接地进一步遭到灾难。”

法兰克福学派区分他们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努力其成功程度将在本章后几页中叙述。意识形态批判的最终失败将在下章适当分析；现在暂且不作分析，先来考虑“社会批判理论”概念的精确含义。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形成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明确的关系，这一理论目的在于对“传统理论”及其引伸的各种观念进行元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它选用的一种方法。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和分析的对象也被发展了，但基本原则是肯定的。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自认他们

---

①阿多尔诺：《极度低落的道德》；第44页。

是马克思主义者。

理解“社会批判理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之间的精确关系的尝试由于以下事实而被混淆了，即迄今为止唯一认真讨论过这一问题的阿尔布雷希特·韦尔默尔的《社会批判理论》曲解了马克思、曲解了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的看法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本身。韦尔默尔的论点有三层意思：第一，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有严重的形而上学偏差和隐蔽的实证主义偏差；第二，霍克海默尔领导下的法兰克福学派在30年代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第三，那个时期他们的科工作就是有意地努力纠正被马克思所歪曲的历史唯物主义学！事实上，这些断言全都是谬误。

韦尔默尔的第一个主张就是回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这一批判并不是很彻底的，马克思未能把他希望指出的有问题的东西完全哲学化。其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提出具有优先的“逻辑的”特征。这种形而上学的偏离必须由隐蔽的实证主义来补充，后者将阶级觉悟的出现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从而使积极的意识形态斗争成为多余的东西。韦尔默尔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批判马克思的基本前提：

“一方面，他们把批判理论的革命作用看成是一种后于意识形态的、如同‘实证’科学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去掩盖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转变和实际上必需的转变这二者之间的区别……”<sup>①</sup>

---

<sup>①</sup> 韦尔默尔：《社会批判理论》，约翰·卡明英译本，纽约，赫德出版社，1971年版，第74页。



韦尔默尔声称，这就是霍克海默尔在《社会研究杂志》时期对马克思的批判性的评价。遗憾的是韦尔默尔的说法是不正确的，那只是他自己对马克思的评价。

马克思的毕生事业就是对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批判，其中包括对后者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代表的批判，马克思断言古典政治经济学“已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现实的生产关系作了调查研究”。但是“从未达到对它自己分析结果的自觉”。马克思的批判是自始至终的意识形态批判。对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权威性论述——《资本论》一书中有关意识形态批判的进展在此不可能作充分的阐述。至于韦尔默尔的论点只要参看《根本分歧》中的一节就可以驳倒，此文是对马克思形象进行歪曲的主要材料之一。由于此论点涉及对原文的精确分析，不可避免地需要引证大量韦尔默尔和马克思二者的原话。

韦尔默尔谴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意识形态批判作了阉割，其具体论证如下：

“以后，在《根本分歧》一文中……他说到‘那些社会主义者，尤其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错误总是将社会主义理解为市民社会理想的实现，而这在法国大革命中并未出现，可是带来的却是历史进程中的循环。’接着他明确地解释道：

‘这些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辩护者的区别，一方面在于他们对这一制度的矛盾的感受，另一方面在于乌托邦主义，这种主义不是去掌握市民社会的现实形式和理想形式间的必要差别，而是去从事不必要的工作，试图再次全面实现那表现

---

①、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81页、538页。

理想的東西，即已由現實本身所摒棄的美化的偶像。’”<sup>①</sup>

遺憾的是，儘管韋爾默爾欣然地詳細引證馬克思的原話，但他對馬克思談到的東西未作出清楚的陳述。在韋爾默爾所引用的兩節中，有馬克思的精確的經濟學論點，這些論點沒有摒棄意識形態批判，實際上是努力使之合乎理性，從而排除了任何唯心主義的或實證主義的曲解。為了明確起見，對此關鍵的一節將馬克思的論點在這裡詳細敘述如下：

“因此那些社會主義者，尤其是法國社會主義者的錯誤總是將社會主義解釋為市民社會理想的實現，而這在法國大革命中並未出現，可是帶來的卻是歷史進程中的循環。那些社會主義者煞費苦心地說明交換價值最先（在時間上）或本質上（在其適當形式上）是對一切人自由平等的制度，這種制度已被金錢、資本等歪曲。否則，先前的歷史在與其真正的本質相一致的形式實現這些價值的嘗試中早已失敗了。這些社會主義者，正如普魯東之流，當時相信他們已發現了靈丹妙藥可以剝去這些關係的真實歷史的偽裝形式。這種交換制度，特別是金錢制度，確實是自由平等的制度，但是，下列論述才是真理：在更深入發展的水平上出現的矛盾是由這自身同一的財富、自由和平等所產生出來的內在的矛盾，它們有時轉化成它們的對立面。象這種願望，例如交換價值不應從商品和金錢形式發展成資本形式，或生產交換價值的勞動不應發展成工資勞動，簡直是虔誠到愚蠢的地步。區別這些的……”

<sup>①</sup>韋爾默爾：《社會批判理論》，第99頁。

<sup>②</sup>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法蘭克福，歐洲出版社，1972年，第916頁。

这一详尽的引证（韦尔默尔关于这一论点所继续引证的内容省略了整个经济学的论据）表明，马克思抨击的不是对迄今仅具有不充分形式的价值的批判性辩论，而是反对把不充分形式自身（在商品生产情况下）不加批判地提高到革命的荣誉地位上。当韦尔默尔被窘困于意识形态批判的区别时，他不加批判地再现了那种意识形态。

霍克海默尔是否真正在20世纪30年代赞同韦尔默尔对马克思形象的歪曲，现在还有待了解。霍克海默尔是否将马克思视为一个倾向于形而上学的理论家，一个研究历史的逻辑学家，一个将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经济学的机械研究的人，从而是一个逃避意识形态斗争根源问题的隐蔽的实证主义者呢？不！霍克海默尔对历史辩证法作了清楚的叙述：

“因此……这一辩证的联结方式在黑格尔那里来自绝对精神的逻辑，来自他的形而上学；对比之下，马克思提出的论点排斥了一切逻辑地超历史观点的概念，从而提供了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诚然，正确的理论产生于生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借助特定工具生存的现实的人们研究。历史上可能出现的法律既不是先验的结构，也不是由假设为独立的观察者对事实的纪录，而是由自身卷入历史实践的思维所产生的一种历史的动态结构的反映。”<sup>①</sup>

1932年研究所所长就是这样说的。至于法兰克福学派关于阶级意识和群众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概念问题在下章予以回答，这一问题要在批判的社会实践的特定关系中进行观察。

---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历史与心理学》，见《社会研究杂志》第1卷1932年，第130—131页。



但是，韦尔默尔对马克思倾向于提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谴责，很快就被抛弃了。确实，这是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永久的贡献，他们清除了围绕马克思的“法则”出现后的混乱，例如：《理性和革命》一书中解释道：

“从支配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改变的必然性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同样的必然性的争论将是对马克思理论整个意义的歪曲……革命确实依靠全部客观条件：它需要物质和文化达到一定的水平，它需要在国际范围内有一个自觉地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它需要有尖锐的阶级斗争。然而，这些条件只有通过心中有社会主义目标的自觉活动来把握和引导才能成为革命的条件。”<sup>①</sup>

当马尔库塞将这本书献给霍克海默尔和研究所时受到了很好的引导：霍克海默尔的同事们在《理性和革命》一书结尾，对马克思的理论的评价作出了完善的总结。

最后，问题在于霍克海默尔和他的同事们是否赞同这一观点，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失去了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力量。问题的答案再一次是否定的：霍克海默尔在对《资本论》的分析中，阐述了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批判：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根据其准确的含义，忠实地介绍了古典英国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交换价值、价格、劳动时间等。当时最先进的定义都是在科学经验的基础上的，都是完全一体化的。然而，在提出的过程中，这些范畴又获得新

---

<sup>①</sup>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第317—318页。

的功用；它们在理论整体中所起的作用摒弃了形成这些范畴的静态的观点，特别是摒弃了对它们的非批判的、孤立的运用。”<sup>①</sup>

霍克海默尔效法马克思的方法，因此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中，成功地把范畴和价值批判地据为己用。不象韦尔默尔那样，霍克海默尔懂得，“资产阶级的正义概念的普遍履行这一要求必然导致交换社会的批判和废除，它最先赋予这一观念以它的本义”。<sup>②</sup>因而这种正义观就可能转化成鼓动人心的武器，而交换价值却不能这样，它是随使用价值转换成商品而上下浮动的。霍克海默尔看到这一点并在早期就接受了这一点，这不应当怨恨而应当感谢马克思。正如韦尔默尔所提出的，如果霍克海默尔当时实际上“只是装成”一个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话，岂非对他更不利，因为他对马克思“伪装地”赞同的评价却是一个正确的评价。

然而，在抛开韦尔默尔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不正确的叙述后，应当肯定他的错误确实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中有一定的基础，因为他是当今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韦尔默尔（生于1933年）从师阿多尔诺研究哲学和社会学，此后在阿多尔诺的研究室里任哲学助教，韦尔默尔的论据无疑地必定要反映事物某种真实情况吗？毫不奇怪，答案要看经济分析在“社会批判理论”中所起的作用而定。

①霍克海默尔：《论真理问题》，第358页。

②霍克海默尔：《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见《社会研究杂志》第2卷，1933年，第12页。

霍克海默尔于1938年写道：“如果对意识形态的抨击不是基于各自的经济分析，那末这种抨击将是无力的批判，甚至至于根本就不是批判。”<sup>①</sup>然而，这种方法论的要求正是法兰克福学派自身最终未能达到的要求之一。尽管对经济学作了大量的洞察，尽管波洛克对这一领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然而法兰克福学派自己的分析多半是上层建筑的，主要缺乏经济方面的具体材料。霍克海默尔所著《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起源》一书，被描述为他的“自我阐述”，但缺乏任何系统的经济基础，然而这些收集起来的论文是作为以后的《社会研究杂志》的原型；而马克思、恩格斯的“自我阐述”（《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后来被两个持冷淡的批判态度的同事们认为是“我们的经济历史知识在当时是何等不完善”的证据。马克思继续进行全面的经济基础分析，作为抨击后者的意识形态的唯一适当的框架。霍克海默尔并未深入到这一步。

当然，法兰克福学派可以吸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批判，但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决不会令人满意地继续的。的确，尽管有波洛克的研究，在《社会研究杂志》中整个来说都盲目地相信，垄断资本主义毕竟不是那么全都成问题的。马尔库塞在1964年谈到他30年代的论文时写道：

“在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的理论已经追溯了把自由主义的过去时代与其极权主义的结束相关联的倾向的根源。我所努力的是发现和查出在文化领域中、特别是在社会的有代表

---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蒙太奇与怀疑论的作用》，第36页。



性的哲学中的这些倾向。”<sup>①</sup>

遗憾的是这有些夸张：马克思不仅说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也说明了对工资劳动剥削的日益增加，但是，在这一世纪的转变过程中，马克思并不可能知道资本家采取什么措施来抵消这种趋势。波洛克象霍克海默尔的全休同事一样，接触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许多方面。但是一般来说，有关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基本的经济控制范围仍然未确定。正是这一缺陷导致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意识形态批判带有无视历史的倾向。这一倾向将在以后章节中讨论，这也是战后原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背道而驰地发展的原因。目前必须承认，甚至在《宣言》时期：“社会批判理论”就存在着根本的缺陷。正是由于这一缺陷，在其它方面助长了诸如韦尔默尔论述中的许多误解。

## 十、当代形而上学问题

尽管缺少系统的经济分析，“社会批判理论”仍然有不少必须论述的出色优点，其中之一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扩展了对形而上学所进行的辩证思考。它超出了黑格尔—马克思群体所谈到的当代形而上学倾向问题。这一新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倡导者是恩斯特·布洛赫，他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知识分子中有深厚的影响。布洛赫与霍克海默尔的同事是同代人，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的气质。在1935年出版的题为《当代遗产》的重要著作中，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资产阶级世界衰落时不会以各种局部的形式丢弃辩证法的有用遗产，而这些

<sup>①</sup>马尔库塞：《否定》，第Ⅷ页。

部分当其自身解体时倾向于无拘无束。布洛赫作了肯定的回答，他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隐秘成分：

“直接从法西斯主义自身来看，它那种欺骗的炫耀物和例证是服务于大资本家的，后者用它迷惑或搅混那些面临悲惨境地的社会阶层的观点。但是，这种迷惑间接地在那些至今仍牢固地密封着的外表上暴露出表面的裂痕，而且这种荒谬的例证从底层显露出的能力并非只能为资本主义利用；和邪恶以及难以置信的残忍行为一起，和愚蠢以及无限的欺骗倾向一起，在恐怖主义的德国每小时每句话都展现了这种欺骗；但也包含着一种较古老的和不切实际的反资本主义成分，它伴随着对当代空虚生活的觉醒以及对另一些东西（尽管还不清楚）的渴望。”<sup>①</sup>

显然，这种“渴望”之辩证的运用意味着使后者清晰分明。

法兰克福学派也有类似的见解，例如，霍克海默尔就强调，通过印象主义艺术之转向反理性主义，以及通过尼采和柏格森的哲学，不仅显露了资产阶级在其人道主义传统中的不稳定性，而且，它也是一种“抗议以反对在不断增长的资本集中之下对个人生活的束缚。”<sup>②</sup>这种抗议也十分正确地显露了人们已觉醒到个人反抗之徒劳无益，这种洞察也必须辩证地通过“社会批判理论”来提出。从而使它成为一种革命的洞察：

---

①布洛赫：《1935年版前言》，见《时代的遗产》，1973年，法兰克福，祖尔坎普出版社，第16页。

②霍克海默尔：《论理性主义》，见《社会研究杂志》第3卷，第5页。

“在醒悟了的中产阶级的个人的怀疑主义思想见解中，人的模式改变了意义；而在这种人的模式中对社会的现代形式之清楚的理解真正地把其自身宣称为需要认真对待的力量。现在，在这一新的、首尾一贯的批判的模式中，这种见解成为进步的力量，向前挺进。”<sup>①</sup>

意识形态批判以这一方式直接导致意识形态斗争。

霍克海默尔确信这种新形而上学，例如马克斯·舍勒的人类学是反“传统的”，因为他重新考虑了与对象有关的整个系列，而这些对象曾被认为是“非科学的”。霍克海默尔认为，形而上学这种形式对于自然科学及其“传统理论”来说，要比自然科学的“中立性”还“更少一些弊病”。正是由于、也只是由于这一原因，霍克海默尔的极重要的论文《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抨击》走向对后者的辩护。这种辩护的动机之形成在于这一抨击并非来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是来自实证主义阵营。与马克思主义者从扬弃的意义上对黑格尔的批判大不相同，实证主义者的抨击构成了对形而上学中所讨论的真实问题的否弃。霍克海默尔和实证主义者说，当面临对黑格尔的不学无术的抨击时，他正如马克思曾公开声称的那样，他自己“是那一伟大思想家的学生”。

然而，在霍克海默尔为形而上学辩护反对实证主义的同时，也是对形而上学的辩证的批判。在就职演说中，这位所长表明，作为对“传统理论”的“阶级基础狭隘性”之超越，形而上学在自身的合理性方面与传统理论是一致的，从而导致整个地否弃分析的思想，将自身沉溺于“专断的研究对象”。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论理性主义》，见《社会研究杂志》，第3卷，第5页。



以及与所有科学相脱节的方法”。霍克海默尔对莫蒂默·艾德勒特别苛刻，后者相信“单靠形而上学就能使人类掌握他失去了的东西”，相信“形而上学使真实的社会成为可能”。霍克海默尔争辩说，这种对形而上学的非批判的见解“曲解了当代历史的状况”。霍克海默尔对于承认“科学多半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这一论点毫不后悔。其唯一保留的是认为对“传统理论”的批判本身乃是形而上学的一种扬弃形式，这种形而上学名为黑格尔的逻辑学；对于转变抽象的要素来说，“辩证方法是理性工具的关键，它以分析的理性而取胜，并成为描述活生生的对象的富有成效的因素。”<sup>①</sup>从霍克海默尔的观点看来，他和恩格斯一样（见第62页），认为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都是真实的分析方法和描述方法的要素。在“社会批判理论”中，这些要素得到调和和扬弃。

但是，有关形而上学的建设性的讨论其意义并不仅仅是学院式的。这种“不明确的渴望”在它仍然是“不明确”的时候，会变成而且也确实变成法西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当霍克海默尔讨论柏格森的生机主义时，上述考虑在他思想中成为最主要之点：

“这一同样的历史动力……它驱使资产阶级（在战时和战前）的独创的、进步的成分成为经济上有决定性的集团的阵营，同时也改变了富有活力的生命哲学的意义，而且和它的创造者的意向相反，从一种进步的社会力量转变为当代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因素。”<sup>②</sup>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论理性主义》，第20页。

<sup>②</sup>霍克海默尔：《论柏格森的时间形而上学》，见《社会研究杂志》，第3卷，1934年，第328页。

1937年，布洛赫写过类似的但观点更明确的话，即理性、纳粹党人能够垄断（并且篡改）反机械论者的反叛以反对当代生活，而“真正的革命者”在这个领域中“并不是他们的捍卫者”。马克思主义者无需“先验地否认”整个非理性主义的现象，在伏尔泰时期，这种否认是进步的；但是，在今天，这种否认已成为对反革命有利的事。<sup>①</sup>简要地说，对形而上学（包括现代形而上学）的辩证的运用，不仅是学院式的争论，而且是严肃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组成部分。

### 十一、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

当“社会批判理论”在形而上学中觉察到积极的内容时，实证主义却认为形而上学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即使在理论水平上，哲学的搏斗也在富有生气地进行着。20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决心要保持马克思主义丰富的批判的辩证力量的活力，这就使他们对形而上学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但是，这也促使他们对实证主义进行了根本性的批判，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杰出贡献之一就是它扩展了对实证主义的最新形式的批判。尽管后继者断言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实证主义的性质未能正确地评价，而实际情况却是：霍克海默尔的《对形而上学的最后一击》除了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一种分析以外再没有其它。

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热心于德国唯心主义的遗产，部分地是由于后者强调知识的主观构成要素，它正与一切拙劣的

<sup>①</sup>布洛赫：《第三帝国的真正历史》，见《时代的遗产》，第148页。

唯物主义者对“外在客体”的绝对化形成对照。尽管康德对形式与范畴的描述倾向于非历史的观点，尽管黑格尔的历史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循着柯尔施的路线，仍然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唯心主义的借鉴：

“象黑格尔的逻辑学一样，唯物主义试图掌握个人的范畴在构造过程中的从属性以超越抽象思维的缺陷；但是，在唯物主义那里，这一过程不再是纯粹地精神上的，而且其结果也不是自我反省的无限的理念。更确切地说，唯物主义把个人和他的范畴看成是从属于社会发展的。”<sup>①</sup>

显然，这种思想之发生学上的关系正是马克思的理论区别于中产阶级唯物主义之所在。

对实证主义的主要批评就在于它暗中损害了这一关系；马尔库塞指出，实证主义“把确定性的根源从思维的主体转移到感觉的主体”，借此“降低了思维的自动作用，而它的接受的和被动的作用取得了优势”。<sup>②</sup>霍克海默尔在他的论形而上学的论文中，追溯这一变化直到它在现代实证主义中的逻辑结论：“主体”完全消失了，而理论的“反省”被归结为固定的评价顺序。<sup>③</sup>就形而上学指责现代分析方法将其对象分裂这一点而言是正确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目标“更多地是在于抽象的效果而不是对整体之理论上的重建”。<sup>④</sup>这样，它对于那种整体抱有纯粹的“传统的”态度。

自然，霍克海默尔接受这种陈述的结构只是作为一种人

①霍克海默尔：《论理性主义》，第30页。

②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第351页。

③④霍克海默尔：《对形而上学的新抨击》，见《社会研究杂志》第6卷，1937年，第13页、23页。



类学的解说，这种陈述大体上被认为是不成问题的。相反，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这一主题，虽然对于刻划资本主义是一个决定性的主题，却不能如此轻率地采用：

“在这一情况下，‘给与’并非某种普通的不依赖理论而存在的东西。更确切地说，它被用来作为这种陈述在其中起作用的概念之整体的媒介。然而，这并非否认理论所针对的现实完全是真实的，而在于现实是独立于理论家的意识而存在的。”

与列宁对休谟和贝克莱的驳斥相比较，霍克海默尔力图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地吸取了朴素唯物主义在哲学上的重要反驳。在知识的起源这一主题上，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是不可调和的。法兰克福学派一劳永逸地确立了这一事实。

## 十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对自由主义的辩证的批判

如同上文所述，哲学的扬弃不止是德国唯心主义方法论的理性化；它也是那种哲学所提出的评价之唯物主义化，这种评价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将以新的形式被“现实化”。法兰克福学派对于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的意向之全神贯注不止是一种重新陈述，它是当自由主义不是被扬弃而是被逐渐损坏、被侵蚀时重新复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丰富的、辩证意向之尝试。这一新的杰作早就反映在马尔库塞所著的《为反对国家极权主义观点中的自由主义而斗争》一文中，它是马尔库塞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上的作为一个整体的许多论文

---

①霍克海默尔：《对形而上学的新抨击》，第13页。

的主题。几年后，马尔库塞写道：

“如果说这些论文的作者和他的朋友们有一个问题不是不确知的，那就是知道法西斯国家是法西斯社会，并知道极权主义的暴行和极权主义的原因来自现存社会的结构，后者是在压倒其自由部分之行动中以及使其历史的否定具体化之行动中形成的。”<sup>①</sup>

这就是为什么马尔库塞把为“社会批判理论”所接受的、对意识形态的辩证的批判描述为“有关至今从未知晓的领域——精确地说，它涉及的是未来的领域”。<sup>②</sup>

在20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中以及在这同一时期的马尔库塞的理论中，按照波洛克关于法西斯的理论，自由主义的湮灭被看成作为整体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问题：“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总动员是与以个性概念为中心的文化的进步方面不相容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的”自由已经被外在化了，但是并非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自由的意义上，而实际上乃是在资本家统治的利益之中：“私人的”领域已经被广告和工艺的理性所侵入。在马尔库塞晚期的术语中，自由主义已经被“压抑地衰退了”。

哲学的扬弃现在必须抵制那些从革命实践中出现的价值在理论上的湮灭；霍克海默尔在1933年对此表达得很清楚，他写道：

“今天，我们听到人民强调说，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正义的概念已经暴露出它们的贫困。但是，这些资产阶级

---

①马尔库塞：《否定》，第Ⅷ—Ⅺ页。

②马尔库塞：《哲学和批判理论》，见《否定》，第158页。

的概念并非已证明为站不住脚的，而是社会条件不再适合于它们……对世界的辩证批判落后于这些概念而退缩，清楚地表明这些概念仍保留着它们的意义，尽管社会在发展。”<sup>①</sup>

真正需要的乃是实现这些概念。

令人遗憾的是，当《社会研究杂志》提出“社会批判理论”后，在讨论这些价值时表现出缺少具体性，从而出现了一种非历史的、为霍克海默尔晚期著作（见第3章）的成果作辩护的倾向。《社会研究杂志》完成了非常宝贵的、要求严格定义的方法论上的贡献，例如，对“自由”的严格定义。在这一意义上，法兰克福学派指出了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之主要弱点。例如，德国社会党的理论上的同盟者西格弗里德·马尔克为他的抽象的人道主义而激动；霍克海默尔写道：

“认为古典的自由主义至少有正确的思想，以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去实施它，这种主张是不够的。今天任何人要谈论‘自由’，必须清楚地指出他所意指的是什么。抽象的自由和法国警官的布告以及我们奥地利兄弟的拯救手拉手地走得太顺利了。”<sup>②</sup>

马尔库塞早就强调过，当“自由”成为社会现实时，这种真正的自由将多多少少与它先前的形式相同，“正如自由人协会与竞争的、商品生产社会一样。”

这种扬弃有两个阶段，首先，自由这一概念用无阶级社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唯物主义和道德》，见《社会研究杂志》，第2卷，1933年，第184—185页。

<sup>②</sup>霍克海默尔：《专制集中的哲学》，见《社会研究杂志》第7卷，1938年，第378页。



会的名词重新给以解释；其次，这一新概念不再在“纯粹理论”的使其实体化的领域中存在。哲学并不是对异化的反抗，相反它自身是异化的产物；不仅它所采用的分析是神秘化的唯心主义，而且它的整个存在就是一种更高的评价用以从意识形态上加强对社会的辩护，而这一社会却是背离这些评价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哲学的“现实化”也意味着“先前哲学的否定，这是哲学作为哲学的否定”。<sup>①</sup>真正需要的是对社会的现实矛盾作出理性的表达，以及对这些矛盾的实践上的超越。后者是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中实现的，对此，霍克海默尔说：“这一斗争保留了资产阶级道德的积极成分——对自由和正义的要求——而扬弃了那些成分中的意识形态的实体化。”<sup>②</sup>回忆起马克思的话，对于黑格尔哲学的辩证的借用是理论斗争的一部分，对这一“任务其解决的办法只有一种——实践”。这就是告诉后继者这种分析现在必须改变。

---

①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136页。

②霍克海默尔：《自我主义和自由运动：关于资产阶级时代的人类学》，见《社会研究杂志》，第5卷，1936年，第220页。

## 第三章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 ——实践关系

如同霍克海默尔及其同伴在《社会研究杂志》时期所阐述的那样，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完备的辩证本性所做的正本清源、更新活力以及继承工作方面，“社会批判理论”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关于各种意识形态批判、知识的起源、整体性观点以及哲学中的扬弃等等问题，全都按它们各自与“实践”这一范畴的关系对其做了清楚的说明。“实践”范畴在“社会批判理论”中大量出现，这标志着一种积极的进步，超出了霍克海默尔的就职演说中有关理论的作用的看法。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他们的理论工作在于：必须清楚地勾画出社会内部各种对立的力量并推进它们达到自我意识的水平；由此把社会张力作为革命的阶级斗争提高到它的极端的表现形式；成功的社会实践可以解决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客观矛盾，但只有通过推翻这个社会才能做到。“社会批判理论”的作用实质上在于：它将成为对注定要由其来完成这一重大使命的那些社会力量的一种意识形态启蒙。这是理论—实践关系中关键的一环。

但是，理论—实践关系还有别的意义，即：理论不仅必须对进步的社会力量进行教导，而且必须从它们的斗争中学习，正如同从被它们的斗争所抛弃的那些理论中学习一样。霍克海默尔下面这段话，似乎表明他承认这一点。他说：

“在历史斗争的过程中，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图景……将变得具体、完善和适当。因此，行动就不应当被视为只是处在思想的‘彼岸’的附属物，它时时处处都对理论有穿透力。实践是不可分割地和理论融合在一起的。”

在1930年到1942年间的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全部理论—实践关系应当包含如下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理论和革命组织理论；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德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德国工人阶级的失败；当然还有应当吸取的教训。不言而喻，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践关系来说，“教训”具有实践的性质，其中包含适合阶级斗争新局面的革命理论的演化。问题在于，“社会批判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些要求呢？

紧接着应当说的是，“社会批判理论”并不能满足这种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理论—实践关系。无论在《社会研究杂志》还是在其他地方，它都没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过明确的讨论；从来没有人对俄国革命及随后的经济建设做过认真的分析，甚至在1929年波洛克的范围有限的研究中，也没有这样做过；尽管对这些知识分子来说经常有厄运临头，但也从来没有人对反法西斯斗争的失败做过恰当的论述。虽然法兰克福学派集中论述了“实践”问题，但它的活动终究还是学院式的：“实践”不过是一个理论范畴，而不是某一具体的革命斗争的构成部分。

1937年，霍克海默尔揭示出一种彻底的异化状况，这种异化不仅源于法西斯主义的肆虐，而且出现在蜕化了的工人

---

①霍克海默尔：《论真理问题》，第335—336页。



阶级组织中；在这种新情况下，他对理论的作用阐述如下：

“而且，值此欧洲自由力量感到迷茫并试图重新组合起来的时候，值此对具体情况的冷淡态度（一种由失败、绝望和腐化的官僚政治引起的冷淡）将要消灭一切自发性，灭绝一切经验和一切代表群众的看法而不顾个人的英勇气概的时候，超政党的从而是抽象的关于知识分子作用的观点只不过比以往更加使真正的问题模糊不清罢了。”<sup>①</sup>

遗憾的是，这仅仅是口头上的一种方法论要求；法兰克福学派当时所做的工作并没有满足这一要求。当“社会批判理论”强调批判的知识分子的作用的时候，它自己却并未成为一种有关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践性的理论。实际上，它并没有正确地、自觉地吸取德国和俄国工人失败的教训。对法兰克福学派来说（除了20世纪60年代激进的马尔库塞），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遗留下的重重创伤，阻碍着任何有关具体的批判实践的看法。

然而，由于面对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面没有系统地分析阶级斗争，这并不意味着无视这个问题。相反，法兰克福学派远远高出于通常的“象牙之塔”，它曾对许多有关阶级斗争的一般问题提出了大量隽永的见解。这里要做的，是对这些见解予以提纯，对它们各自的重要性作出估价（如同对把这些见解转变成为关于阶级斗争的实际理论的可能性作出估价一样），最后，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整体而具有的缺陷所可能导致的后果作出确切的判断。这一章将要实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元批判性的意图。

---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第275页。

## 一、马克思、列宁和法兰克福学派论阶级意识和政党

在理论—实践关系中，最基本的问题是革命理论同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本人没有写完《资本论》，因而也没有对阶级和阶级意识作过确定的陈述。《共产党宣言》虽然实质上强调的是资本作为无产阶级的无意的组织者所具有的革命本性，但是，通过辩证地运用“阶级”这个概念，书中已经自觉地抓住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一方面，它意味着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集团；但是，此外它还意味着一种政治启蒙意图——如同无产阶级的情况一样，因此，共产党人的直接目标是“无产阶级之组织成为一个阶级”。在这种政治性的发展中，共产党人超过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而具有这么一种先进性，即“对无产阶级运动的进程、路线、条件和一般的最终结果有着清楚的认识”。尽管资本已使无产阶级组织成了一种结合起来的力量，但是，为了实现这种政治启蒙，还必需一种清楚有力的社会理论；政党、理论和阶级，三者构成了一种动态的统一。

列宁的革命组织理论中坚持了这种动态的统一性，同时对之有所发展和改变。1902年，列宁写道：

“各国的历史都表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努力，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的理论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代表人物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中成长起来的。……同样，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阶级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工人群众的自发的觉醒（即朝

向自觉的生活和自觉的斗争的觉醒)和用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并力求接近工人的革命青年。”<sup>①</sup>

群众自发地投入运动之中这一事实，在列宁看来，并不减少对斗争进行组织的必要性，而是使组织更有必要。组织并不与自发性相对立，而是为后者提供安全保障，使后者可以获得更大的成效。列宁认为，事实上，只有使工人阶级的各种斗争牢固地组织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把自发的斗争转变成无产阶级的名副其实的阶级斗争。<sup>②</sup>

霍克海默尔虽然没有明确提到马克思和列宁，但他在他的《宣言》中似亦赞同这种关于政党、理论和阶级三者之间的动态的统一的观点。尽管无产阶级在它的痛苦经验（并且正是由于这种痛苦经验）中形成着自己的利益，然而，即使无产阶级这样的处境，也仍然“并不保证无产阶级有正确的觉悟”。<sup>③</sup>无产阶级的“利益”必须由理论来加以“塑造”和“引导”。<sup>④</sup>理论的敏锐性就表现在“理论家与他的思想所关心的阶级之间的差距之现实的可能性之中”。<sup>⑤</sup>

霍克海默尔为他的“社会批判理论”所定的标准是很严格的：

“一个只会怀着崇敬的心情给无产阶级的创造力唱赞歌的知识分子，一个出于迎合和美化这个阶级而对之心满意足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明白如下这一点的，即：他的思想的消极作用意味着

---

①、②列宁：《怎么办，当前我们的运动中的紧要问题》，见三卷本《列宁选集》第1卷，莫斯科前进出版社1971年版，第143—144页，226页。

③、④、⑤霍克海默尔：《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第267页、290—291页269页。



逃避理论上的一种要求，正如逃避真正积极的思想所可能要求的与群众的暂时对立一样。这种逃避只能使群众比他们本该具备的精神状况更加盲目，更加软弱无力。”

有意义的是，沃尔特·本杰明在当时的一篇文章中正好引述了这段话，并有所评论：“这种见解已经指明了一种社会批判理论的目标。”

然而，霍克海默尔对阶级和理论所作的区别，超出了列宁的观点。列宁把革命的理论家和政治上的先锋队看作一回事，霍克海默尔则正视这两类人的区别，并且认为批判的知识分子高于政治上先进的理论家：

“如果……把理论家及其在与被压迫阶级的协作中的具体活动看作一种动态的统一，从而使他对社会矛盾的揭示不仅表现为对具体的历史境遇的说明，而且表现为在这种境遇中起积极作用和促进作用的因素，那么，批判的理论的功能就显而易见了。被压迫阶级的先进分子与对这些先进分子的真理予以断言的那些个人之间争论的过程，以及这些最先进的分子（包括他们的理论家们）与被压迫阶级其余的成员之间争论的过程，应当被看作一种互相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意识不仅展现出它自身的解放力量，而且展现出它本身鼓动性的、劝诫性

---

①霍克海默尔：《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第268页。

②本杰明：《一个自由研究的德国研究所》，见《全集》第三卷，1972年，法兰克福版，第522页。

的以及暴烈的实践力量。”<sup>①</sup>

这段陈述完成了霍克海默尔的理论—实践关系观。往下需要做的工作是：追溯“社会批判理论”发展的踪迹，并且确定这一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 二、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不管怎么说，在霍克海默尔任社会研究所所长的时候，社会主义就已不再只是一种革命理论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同时不仅已经对革命斗争本身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产生了诸如实现经济任务的方式和手段等等具体化的理论。苏联的发展已经提出并且按它自己的方式回答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确切含义这一问题。

当然，《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描绘了一幅没有阶级的社会图景：“在发展过程中，当阶级差别消失，所有的生产都集中掌握到最广泛的全民族大联合的手中的时候，公共的权力就将丧失其政治的色彩。”<sup>②</sup>但是，即使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还是强调说，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使一种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成为必要，他们把这种国家规定为“作为统治阶级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sup>③</sup>这不折不扣地就是后来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但是，这里所说的“专政”，并不意味着取消民主；相反，它恰恰被设想成是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针对反革命力量的；然而，考虑到这种统治的实施，民主就是逻辑的手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第269页。

<sup>②</sup>、<sup>③</sup>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76页，74页。

段，因为无产阶级就是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并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实际上，他们强调的是它的民主的实质。马尔库塞认为：“每当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与它以前的国家形式相比较的时候，他们都根据组成国家的现实的主体来进行对比……。”<sup>①</sup>不过，当法兰克福学派返回到马克思的观点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们有这样一种含蓄的并且经常是明确的信念，即：这种民主的观点在苏联已经被遗忘了。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实质上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主体的观点集中在一起，从而使民主的观点清楚可见。然而，历史并不是按照语录发展的！事实证明，俄国的新政权所面临的混乱不仅危害到“正在消亡”的国家观念，甚至危害到“作为统治阶级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这样一种国家观念。政党、理论和阶级这三者之间的张力同样被带进了新俄国：在群众自发的要求及行动（工联主义、土地分配等等）和党所进行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目的之间，出现了一种张力。反革命事件和国外的干涉更加剧了这种张力，这种局面使得中央集权和忽视民主的优越性的作法成为维持生存的一个条件。

然而，经济混乱一直持续到“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之后，事实证明，“新经济政策”——为复兴毁灭了的经济而做出的妥协——对包括工业无产阶级在内的群众是同样苛刻的。在失业、低救济和降低工资最严重的时期，无产阶级受到了以工厂经理的权威这种形式出现的政治压迫，这种压迫

<sup>①</sup>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1958年版，1971年哈门兹沃斯企鹅出版社再版，第24—25页。



靠牺牲工人的管理权才得以维持。当然，仍然可以把这些看作只是暂时偏离了马克思的观点。列宁直到去世还在期望欧洲发达国家的革命急速到来，认为这些革命可以给苏联以“及时的支援”。他的全部理论中含蓄地透露出这么一种意识：社会主义是不能从落后的无产阶级中强行“压挤”出来的。原因很清楚：为此所必须的强制，将破坏社会主义的政治形式，即破坏“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组织起来”。1924年，即列宁去世的那一年，斯大林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学说的发表，在整个改变苏联的道路上迈出了严重的、无可挽救的一步。斯大林认为，尽管苏联免不了受帝国主义侵略，但是依靠可以利用的生产力，苏联是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

### 三、法兰克福学派和斯大林主义

西方大多数批判的知识分子正是由于对中央集权化和计划经济的觉醒才背离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在此过程中，他们经历了不同的步骤。例如霍克海默尔，他的觉悟发生在30年代初期某个时候。他的好友波洛克，直到1929年还在渴望揭示由于“工人管理苏维埃”这种蒙昧的工联主义的干预而导致的现实问题。至于霍克海默尔，他在写《曙光》一书（该书是用笔名发表的）的时候，则表现出单纯由于他那公认的无知而产生的热心态度：

“我并不自以为知道这个国家将被引向何处；无疑，那里还有很多不幸的事。但是在有教养的人中间，那些对这里的这种努力精神毫无所知的人，那些不加思索就否认全部发展的人，……却是一群可怜的同伙，他们的伙伴对他们一无回报。无论何

人，只要他睁眼看看这个无情的、不公平的帝国主义世界（这种不公平并不是因为技术不发达），他就会把苏联发生的事情看作是为克服这种可怕的社会不公平而作的一种不懈的努力，或者，他至少也会焦虑地问：这种努力是不是能够成功？”<sup>①</sup>

也许这是霍克海默尔更早的著作中的一篇（《曙光》是一本短篇格言集，写于1926至1931年间），因为在《社会研究杂志》时期以至后来所有对苏联的评价都是否定性的。

在1970年的一次谈话中，霍克海默尔解释说，他在《社会研究杂志》上的文章以批判的观点发展了一种“正义”和“真诚”的社会观，这种批判的观点不仅针对着纳粹德国，而且也针对“其他极权主义的国家政权”。他还进一步补充说，当时，“俄国的情况如果不是和当时德国的情况同样糟糕或甚至更为严重，也是与当时德国的情况很相近的”。<sup>②</sup>在同一年的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说“恐怖的共产主义”和“斯大林的恐怖统治”是“表明革命会导致恐怖的一种象征”。1968年，在回顾即将重版的他在《社会研究杂志》上的那些论文的时候，他又解释说“斯大林的法西斯主义的变种”是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各种力量之一，为了反对这种力量，应当对自由主义所具有的正当的批判价值予以保护。

1970年，霍克海默尔已经大致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即“为什么旨在追求自由的愿望却会产生出专政？”<sup>③</sup>这个

---

①霍克海默尔：《曙光：德国记事》，苏黎士，奥布里希特和霍尔布林出版社1934年版，第152页。

②③霍克海默尔：《管理世界》，苏黎士，方舟出版社，1970年版，第22页、32页。

问题甚至是资产阶级教育从来连提都没有提过的问题。不幸的是，霍克海默尔从来没有对此问题作过解答。不过，虽然他当时与苏联并没有明显的关系，他在30年代的著作中却已明确说明了许多范畴，这些范畴对于一般地讨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很有用处的。例如，霍克海默尔强调，社会主义不仅仅在于管理和提高生产力，而且还应当把人类从经济奴役下解放出来。他在1937年写道：

“这种历史性的变革不会不涉及文化领域的关系，并且，如果说在目前社会状况中是经济统治着人（这形成社会变革的一种杠杆），那么，在将来人则将支配自身的全部关系——如果能对自然的需求予以必要的注意的话。因此，孤立分散的经济事实将不会成为真正的共同体的标准。这甚至对于过渡时期也是适用的……经济主义——批判的理论在很多地方都被还原到这种主义（尽管声称说支持批判的理论）——并不在于过分看重经济因素，而在于把经济因素理解得太狭窄了。它的本来意义在于追求社会形态的整体性，这种意义降低的程度与理论对各种孤立现象的依赖程度成正比……工业生产隶属于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控制，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在批判的理论看来，只有以对这一事实的各方面的细心研究为基础，才能发现这一事实的确切意义。人们是否可以在批判的理论的意义上讨论



社会主义化？更高的原则将在何种程度上得到遵循？这些问题既非简单取决于一定的所有制关系的改变，亦非简单取决于新的社会合作形式中生产力的增长，而是同样重要地取决于所有这些事情在其中得以发生的那个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状况。”<sup>①</sup>

这里之所以引用了这么长一段话，是因为它表明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价值”理论中包含着大量的经济意味。虽然这段话暴露出霍克海默尔在对这些价值的运用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不是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辩证的相互作用，而是把二者都看作“重要的”，并且，对“新的社会协作形式”也从未作出说明），但它同时也还是表现出法兰克福学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的重视。无论苏联面临多么严重的威胁，经济上的“要求”也同样是人民为达到经济解放而产生的要求；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化”。

无论如何，霍克海默尔并不一概反对一切领导。正如他承认革命先锋队的作用一样，他也承认有象“开明的、甚至是革命的专制主义”这样的事情。他还承认：不能从这种专制主义“本身”来解释它的严厉，只有参照“它所管理的群众的一般发展水平”，才能对之作出解释。但是，在1934年阐述的这种一般原则，并不为苏联作辩护。霍克海默尔不相信苏联政府为提高它所管理的群众的一般发展水平已做得够多了；斯大林主义的专制主义并没有做足够的工作为它自身的消亡准备条件。在霍克海默尔1935年写的一篇论文中，我

---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哲学和批判的理论》，见《社会研究杂志》1937年第6期，第629页。

们可以清楚地（如果不是含蓄地）看到这么一种评价，在那篇文章中，霍克海默尔揭示了在尼采对群众的藐视中所曲折地隐藏着的历史唯物主义真理：

“只要那种统治群众的真实的权力依然给群众手中塞进一种虚假的权力并以此掩饰事情的真相，那么，群众就只不过是一群可怜的人，这是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所谓‘群众统治’的一个突出特征。但是，一旦群众真正掌握了统治权而改变了他们自身的状况，权力就失去其‘颓废’的品质，转而成为一种联合起来了的、因而是‘超人’的社会力量的结果。”<sup>①</sup>

在《宣言》中，霍克海默尔又重复了这种对于“迄今为止的历史”的论断，他强调说，尽管需要有自我约束，革命的阶级斗争还是揭示了有关“未来的自由和自发性的某些事情”，并认为“在纪律和自发性二者之间失去统一性的时候，运动就会产生出它自身的官僚主义的作用，产生出一幅本已属于当前的历史之剧的场面”。<sup>②</sup>正如十年后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反极权运动关于把自发性和组织性融合一体的想法，实际上是企图把反马克思主义的感情扭转过来的一种尝试，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感情是在看到了“镇压性的斯大林主义的发展”之后产生的。

法兰克福学派对斯大林主义的俄国所持的批评不只是对“清洗审判”的可怕的反应，这一点可以确信，的确，这种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关于哲学人类学的意见》，见《社会研究杂志》1935年第4期，第16页。

<sup>②</sup>霍克海默尔：《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第271页。

审判是一次可怕的冲击，马尔库塞在为重新发行的他在30年代的论文而写的序言中评论了这种审判所具有的“意义”；不过，法兰克福学派把这种审判看作一种更深刻的问题的征兆，即看作苏联官僚主义化和真正的工人阶级组织消亡的征兆。30年代初期，“一国社会主义”就已经给工业无产阶级加上了沉重的负担（更不用说对农民了）；不仅工资迟发，劳动强度增加，而且工人阶级的政治自主也成了问题。工会被指斥有工联主义倾向，而且，尽管这种作法被美化成对工会官僚主义的打击，但它实质上却是对整个工人阶级代表制的挑战。这就是苏联所谓“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组织起来”的形式。

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瑟尔对法兰克福学派很有了解，他揭示说，社会研究所对苏联情况的醒悟确实在“清洗审判”之前。而且，按照索恩-雷瑟尔的说法，30年代初期出版的一本斯大林传记强化了研究所成员们对苏联的怀疑态度，它对研究所成员产生了重大影响。索恩-雷瑟尔回忆不起这本传记的作者和书名，但它很可能就是鲍里斯·里夫西克的《斯大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概观》。这本传记与同时代其他传记的不同在于：它既避免了不加分析地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也避免了对斯大林的赞美之词。作者对列宁给以高度尊重，并且如实引证了列宁对渐进主义的要求的忽视，同时还把这种忽视与作为“后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品性的突出特征的高压统治、压迫以及恐怖”作了对照。与此相似，霍克海默尔在他最后一次谈话中把这一时期称为“不再遵循列宁传统”的时期。



#### 四、理论—实践关系中的断层

虽然霍克海默尔是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瓦解来确定斯大林主义的，但他并没有联系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来分析这一发展过程。马尔库塞1958年写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对纠正这一缺陷做了大量工作，他指出，苏联的孤立和日益增长的德国法西斯主义威胁是从列宁主义转向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背景性的因素。但是这时马尔库塞已经与他前一时期在研究所中的同事们决裂了。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没能在实践中作出对苏联的批判；相反，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却使他们走进了死胡同。

尽管《社会研究杂志》声称关心政治斗争，但它并没有和“斯大林—托洛茨基”争论的任何一方发生联系。与此相关，研究所的工作也未能具体联系德国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在《社会研究杂志》中甚至没有以书评的形式出现过。因而，“实践”实际上成了一个理论的、方法论的范畴，而不是一个关于社会历史性的阶级斗争的具体概念。诚然如恩斯特·莫尔所说的那样，面对斯大林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软弱无能，法兰克福学派之转向辩证的理论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但是，这种“方式”表现为一种解释，而不是维护。对辩证法进行的严肃讨论当然是建设性的，但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他组成部分，情况又怎么样呢？唯物主义的情况呢？阶级斗争的情况呢？转向理论绝不应因此就告别实践。但霍克海默尔一伙却告别了实践。莫尔又一次为此辩护说：

“批判的理论是非实践性的吗？当然，它缺少它自

己的‘收信人’，因为工人阶级被束缚在它的两个政党身上了，其中一党把无产阶级的一体化推进成现存的秩序，而另一党，即共产党，却拒绝承认这种进步的一体化。”<sup>①</sup>

然而，这种辩护也是没有道理的：霍克海默尔自己在《宣言》中实际上承认说，工人是被组织在他们的先锋队的旗帜之下的，而批判的知识分子却是独立自主的。而且这些知识分子打算通过“争论”把他们的“真理”传递给先锋队。尽管理论家与阶级之间可能会有“张力”，甚或必然会有张力，但“动态的统一”中的这三种因素之间注定要处于一种经常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因此，按霍克海默尔的观点，只有“争论”才能保障“理论—实践关系”中的关键性联系。然而，正是这种“争论”在《社会研究杂志》中非常缺乏。也许进一步的研究将说明研究所与各种政治集团之间的相互转化，不过这种相互转化只能是他们的理论出版物的抽象的附属品，它与阶级斗争实践的现实性是脱节的。

以上所述，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忽视“社会批判理论”这一庞然大物。相反，对有关无产阶级斗争的问题来说，这种理论包含着许多很中肯的见解。如果批判地看来，这些见解以及其中提出的一些范畴肯定是恰当的，必须根据它们各自对实践所具有的意义来评价它们，不仅要对它们予以补充，而且要把它们打散重新调整，以便确定是否可

---

<sup>①</sup>约翰内斯·亨利希·海西勒等编：《从马克思主义来看法兰克福学派：对霍克海默尔、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的哲学和社会学的批判》，法兰克福，马克思主义书报出版社，1970年版，第125—126页。

以把它们作为一种实践性的理论构成一个观念整体。如果不能，就必须揭露它在对这些范畴的抽象使用中包含着的失真之处并予以纠正。不言而喻，只有把这整个争论与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明确地联系起来，才能达到这种元批判性的目标。

### 五、法兰克福学派和罗莎·卢森堡

在纳粹统治日趋崩溃的时候，阿多尔诺写了下面这段话，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绝望：

“甚至连社会主义中最高尚的品行——团结——也不健康了。团结的目的原本是为了使兄弟般的对话成为现实，其方法是把对话从一般性——在那里它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提高到特殊，即提高到在对抗性的世界中作为一般性的独特性代表的政党，……然而最后，团结却变成了这么一种信念，即相信党无所不能。”<sup>①</sup>

这种见解，表明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辩证的意识形态批判中的某种政治意义，即：应当实现团结，而不应破坏团结，从霍克海默尔对60年代的学生运动的劝告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

“虽然她支持俄国革命，但是她，罗莎·卢森堡，这位受到如此多的学生尊敬的人在50年前就说过：

‘托洛茨基和列宁所开的药方（例如取消民主）本

---

<sup>①</sup>阿多尔诺：《极度偏落的道德：被破坏了的生活的反映》，第51页。



身比用它去治疗的病症更需要治疗。”<sup>①</sup>

弗兰茨·博克诺在他1938年写的一本严厉指责第三国际的书中，也持同样的看法，那本书的书名干脆就叫《共产国际》。虽然霍克海默尔当时并不象博克诺那样全盘否定列宁主义，但他实际上是赞同罗莎·卢森堡的。卢森堡比任何人都致力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概念。

早在1904年，卢森堡就对列宁的“极端集中制的”党的观念提出了指责，她认为这种观念使党的中央委员会成了“能动的核心”，而把其他部门降低到“执行机构”的地位。<sup>②</sup>此外，列宁还对工厂纪律表现出一种非辩证的、令人反感的实证主义态度。她以反对独裁主义的口气反驳说：

“不是通过把资本主义政权强加在工人身上的纪律联系起来，也不是通过把指挥棒从资产阶级手中转移到任何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央委员会手中，而只有砸烂并且连根拔除纪律中的这种盲从精神，才能使无产阶级为建立起新型的纪律做好准备，这种新型的纪律即自觉自愿的、社会民主的自我约束。”<sup>③</sup>

马尔库塞在1972年正是引用了这段话作为自己的观点的证  
据，他认为：“卢森堡懂得，工人阶级的彻底转变是革命战略的一个条件。”<sup>④</sup>

这种论点扩展到了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和法兰克福学派一样，卢森堡也使用了关于自发性与组织性辩证地融合的

①霍克海默尔：《批判的理论》，第一卷，第111页。

②、③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伦敦，1935年版，第8页。

④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伦敦，艾伦莱恩出版社1972年版，第39页。

概念，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官僚主义化。因此，和马尔库塞及霍克海默尔一样，她也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性质：

“是的，专政！但这种专政存在于运用民主的方式之中，而不是取消民主……这种专政必须由阶级起作用，而不是极少数领导者以阶级的名义起作用——也就是说，它必须通过群众的积极参与而逐步得到实行；它必须直接处在群众的监督之下，受作为一个整体的民众的指导；它必须源于逐渐增长的人民群众的政治进步之中。”<sup>①</sup>

当进一步认识苏联局势中的严重现实的时候，卢森堡又指出了下面这种巨大的危险：布尔什维克党人“把非做不可的事装成出于好心才做的事”，并且把他们的经验推崇为众人的“典范”。<sup>②</sup>

假若我们打算估计法兰克福学派卢森堡主义化的程度，并且判断这个部分在他们的理论中是否具有实践意义，我们就必须考查卢森堡所说的“民主政体”所要求的客观政治形式。卢森堡认为，这种形式就是苏维埃制度或委员会制度；委员会“必须实现它们的使命”，并且“学习如何成为这整个领域中唯一公共的权威”。她当时批评列宁和托洛茨基说，他们虽然赞同把苏维埃原则看作工人们唯一真实的代表，但是，由于普遍地压抑政治活动，这两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就在实际上破坏了苏维埃的积极生活。<sup>③</sup>因此，当卢

①、②、③卢森堡：《俄国革命》，伦敦社会主义评论出版社，1959年版，第34页、34页、31页。

③卢森堡：《论斯巴达克斯纲领》，伦敦，默林出版社，1971年版，第27页。

森堡在运动的最高潮时刻为布尔什维克党人公开辩护的时候，她不是突出党，而是突出苏维埃；这就是俄国革命教给人们的“基本知识”。

在未发表的1940年的一篇论著中，霍克海默尔直接谈论过“委员会的民主”，并且解释说：

“过渡性的革命专政，这一概念决不意味着由一些新的杰出人物对生产手段实行垄断。这种危险可以通过人民自己的能力和警觉予以防止……理论观念来自实践，紧随其开路先锋，这种观念将为新社会指明道路——即工人委员会制度。委员会制度的根可以追溯到1871年、1905年以及其他时间的一些事件。革命变革有其必须继承的传统。”<sup>②</sup>

与此相似，在对马尔克的批评中，霍克海默尔认为从1919年到1931年这期间德国的发展是“相当一贯”的，他还认为，“甚至今天极端的恐怖政策，其根也不是扎在1933年，而是扎在1919年，扎在工人和知识分子被魏玛共和国的封建帮凶们枪杀的时候。”<sup>③</sup>在霍克海默尔看来，委员会给实现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组织起来”这一观点提供了一种形式。由于它们在1919年失败了，霍克海默尔似乎就对具体的阶级斗争全部丧失了兴趣。显然，他并没有从后来德国社

①卢森堡：《论斯巴达克斯纲领》，伦敦，默林出版社，1971年版，第14页。

②霍克海默尔：《专制主义的国家》，见《毁灭》，1973年第15期，第10页。

③霍克海默尔：《专制集中的哲学》，见《社会研究杂志》，1938年第7期，第384页。



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看到类似的希望。甚至德国共产党这个“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后嗣，也不能复活这种民主政体的形式。

## 六、法兰克福学派和德国共产党

最初的德国共产党倾向于在群众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各个方面都积极加入到群众中去。曾经参与建党活动的罗莎·卢森堡早在1900年就认为，工资斗争和议会改革是为达到消灭“雇佣劳动”这一革命目标准备条件的一个基础。1918年她又说：“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必须由群众来实现，也只有由群众来实现，靠群众肩并肩地与资本主义斗争；必须通过群众在各行各业进行斗争，通过每一个无产者反抗其雇佣者的斗争”。<sup>①</sup>产业战线的这种斗争因而就是工人的课堂，革命者只有与这种斗争相联系，才能进行他们的工作。这就是早期的德国共产党不耻于主动参与工会的原因。

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其实，法兰克福学派对列宁的尊敬大多是由于他在保持政党、理论和阶级三者之间的动态的统一性方面的才能，这种统一性随后就丧失了。在这方面，马尔库塞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书，是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著作：

“列宁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把自已的战略建立在实际阶级斗争利益和工农的志向这一基础上，这一问题在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变得明确了……尔后，从1923年起，领导集团的决定日益远离无产阶级的阶

---

<sup>①</sup>卢森堡：《论斯巴达克斯纲领》，第19页。

级利益。前者不再把无产阶级看作革命的动力，而是把自己强加在无产阶级和其他下层群众身上。”<sup>①</sup>

尤其严重的是，这种蜕化变质现象也被带进了德国共产党内，而且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从30年代以来的“共产主义异化”的一个基本方面。

布尔什维克主义通过第三国际对德国共产党产生了直接影响，到1921年为止，第三国际的实权实质上已经从全体代表大会转移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手中，因而使各国共产党都受指挥于由俄国共产党支配的一种核心权威。这种控制后来逐渐加强，特别是在20年代中期，各国共产党手中都被塞进一份改组草案，以帮助它们的“布尔什维克化”。对德国共产党来说，这种干涉在1923年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最后，削弱了这个党的卢森堡主义传统。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海因里希·布兰德勒根据客观的革命潜力的消失来解释预期实现的革命的失败，他认为，当时古诺政府已经辞职，而本来是为反对这一政府才将群众发动起来的，加上军队对于权力的僭越也强化了资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起义就不可能是群众起义，而是德国共产党的暴动。第三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的看法与此不同，他认为布兰德勒“背叛了革命”。

德国共产党的新理论是关于“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理论。事实上却根本不存在统一战线；

“这种策略上的变化，实质上意味着直接宣传和号召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从他们已经被组织在社会民主党之中

---

<sup>①</sup>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第124页。

这一事实中脱身出来，并相应地放弃与这个党的代表人物打交道，以重复统一战线的策略。这就是所谓‘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它甚至在当时就已经通过识别这个党的领导是‘带着社会主义面具的德国法西斯主义行为’而找到了自己的逻辑补语。”<sup>①</sup>

随后出现的“对社会民主党的重要一击”，凝聚了这种发展，它分裂了劳工运动，对纳粹推翻共和国起了帮凶作用。

既然法兰克福学派疏远了斯大林主义，他们和德国共产党疏远就是必然的了，他们把和苏联共产党一样的德国共产党的蜕化变质追溯到1923年，德国共产党就在那时抛弃了卢森堡的理论和实践。卡尔·柯尔施在1941年写道：1923年以后，德国共产党完全成了“秘密领导集团手中的技术工具，它受俄国政府的独家雇佣和操纵，完全脱离了它的全体成员或广大工人阶级的控制”。<sup>②</sup>在1941年5月6日给马蒂克的信中，柯尔施叙述说：背井离乡的霍克海默尔研究所的一伙人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很痛快地接受了我的观点”，尤其是“赞同我的瓦尔丁评论”。（在这篇评论中，柯尔施对德国共产党提出了上述指责），在这一点上，法兰克福学派与柯尔施是一致的。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并不是仅仅因为德国共产党的非民

<sup>①</sup>特亚赖：《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的结构和功能》，第二卷，第28—33页。

<sup>②</sup>柯尔施：《为什么革命？对瓦尔丁〈走出黑暗〉一书的评论》，见《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理事会通信》1940—41年，第4期，第26页。



主的实质而拒绝德国共产党；除此之外，这些辩证的知识分子对“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一概念也有恐怖感。阿多尔诺在《极度低落的道德》中写过这么一段话（其中对马克思主义者有一定的曲解），他说：

“由于清除了社会民主党人对文化进步所持的信念，并且又处在日益严重的野蛮风尚之中，他们就经常面临着一种诱惑，即以‘客观趋势’为理由赞同野蛮风尚，在绝望的行为中盲目地、不可思议地期待着他们那不共戴天的敌人会给他们以救助，作为对立面，这个敌人被设想为能够帮助他们得到好的结局。”<sup>①</sup>

从抽象的意义上说，这是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法西斯”概念的拒绝。从法兰克福学派整个辩证的意识形态批判观念中，隐约浮现出一种政治主张。“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非辩证的实质与斯大林对德国共产党的操纵一起，帮着把希特勒推上了权力宝座。霍克海默尔后来写道：工人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防止纳粹政权的可能性“并非只是痴心妄想”。这种统一战线是被破坏了。

## 七、法兰克福学派和托洛茨基

回过头来寻找法兰克福学派上述观点的潜在的事实上的代表人物，人们很快就会注意到托洛茨基的形象。作为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托洛茨基自己尖锐地抨击了苏联的官僚主义。他认为这种官僚主义完全忽视了列宁关于政党和群众之

---

<sup>①</sup>阿多尔诺：《极度低落的道德》，第44页。

辩证相互作用的观点。与此相似，托洛茨基认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也纯粹是胡说；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将与法西斯进行斗争，但在目前他们只能借助于他们的各种组织进行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共产党人应当支持他们，因为这种斗争远比宣传和鼓动更能有效地揭露改良主义的破产。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托洛茨基提到了工会的作用，它当时还只是以工厂工会的形式存在着。共产党人必须利用这些工会去联合所有的工会委员，以增加对工厂生活、城市生活乃至国家生活的控制。

“通过扩展它们的功能，给它们委以更艰巨的任务，创立起它们自己的联盟机构，同时把联合起来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和共产主义的工人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工厂就会成长为苏维埃；而且它们能够作为暴动的组织基础而起作用。”<sup>①</sup>

只有这种战略才能保障自我活跃的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统一战线的出现。

但是，我们应当牢记，卢森堡对“如此消除民主”所提出的指责是直接针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而且霍克海默尔也是照抄了卢森堡的观点。同样，马尔库塞如下的判断，也与所谓“列宁的地位随后完全是由托洛茨基加强的”这么一种观点一致。马尔库塞认为，尽管列宁成功地把工人阶级的需要和志向联系起来，但他又确实确定了“苏维埃政权对于苏维埃工人的优先权”。马尔库塞的这种看法与他的另一看

<sup>①</sup>托洛茨基：《“工人”对生产的控制》，见《下一步干什么？与德国无产阶级性命悠关的问题》，载《德国的反法西斯斗争》，纽约，开拓者出版社，1971年版，第80页。

法是相辅相成的，即认为列宁的观点是“托洛茨基完全赞同的”。与此相似，托洛茨基继续论证了关于委员会要有强有力的党的领导这种说法：“公开承认苏维埃自己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这只是广泛传播通俗的苏维埃拜物教。一切事情都有赖于领导苏维埃的党”。<sup>①</sup> 面对堕落的俄国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霍克海默尔似乎不可能设想任何党的领导。诚然，他承认“没有一种作为先进的东西产生出来并取得了专利权的制度能够避免退化”，而且这种说法对委员会制度也是适用的。<sup>②</sup> 但是，霍克海默尔并没有进一步去论证革命政党的作用；相反，他在为民主的社会主义具体规定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之后就退了回来，希望它能够得以实现。

在此，“社会批判理论”不仅表现出与托洛茨基有别，而且与其他所有的实践的理論家都不同。法兰克福学派把委员会制度当作一种民主的形式予以强调，但并没有能够在作为革命理论的具体理论整体中勾画出这种形式。在令人沮丧的德国工人阶级的失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之后，托洛茨基写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仍然必须坚持具体的、历史的阶级斗争观点：

“那并不是关于各种敌对的抽象原则的问题，而是关于活生生的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的问题，包括其中势所难免的上下反复，各种组织的蜕化，整整一代人的被遗弃，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在新的历史阶段动

---

①托洛茨基：《下一步干什么？》第199页。

②霍克海默尔：《专制主义的国家》，见《毁灭》，1973年第15期，第10页。



真新生力量的必然性。没有人事前为无产阶级革命高潮铺平道路，……那些被这一点吓怕了的人，最好是靠边站。”<sup>①</sup>

尽管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大量的原则（它们因其消极性和孤立性而成为“抽象的”），但在这种意义上确实是靠边站了。

## 八、法兰克福学派和布兰德勒主义

这个时候，托洛茨基主义在德国并没有导致具有重大意义的实践运动，因而难于充分估价这种理论的实践意义。因此，法兰克福学派没有与托洛茨基进行任何“辩论”，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谅解的。但是，至于另一个反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组织，再这么说就不真实了。这个组织就是“德国共产党反对派”，它确实形成了一种值得考察的实践运动。这个党超出了早期德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其领导是布兰德勒，他在1925年（即斯大林主义万炮齐轰“极左”的时候）和他的支持者一道被恢复了名誉，但是，由于20年代后期的第二次左倾，德国共产党的右翼受到公开的指摘并被开除出了党。柯尔施在他的一篇曾经受到社会研究所高度赞扬的评论中，把这次发展看作德国共产党蜕化过程中的第二阶段；因此，人们可以正当地期望从德国共产党反对派身上看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原理的具体体现形式。

的确，德国共产党反对派曾经公开指责说，德国共产党一方面蜕化成了自负的官僚主义，另一方面，又退化成了一

<sup>①</sup>托洛茨基：《必须重建共产党和国际》，见《德国的反法西斯斗争》，第421页。

个被动的成员：认为这样一个党“既不能准备革命，又不能进行革命。”同时，和托洛茨基一样，布兰德勒主义者拒绝接受斯大林式的统一战线，他们认为它根本不是统一战线。尤其是，他们指责调整“红色工会”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加剧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与他们的共产主义伙伴之间的对立性；它远不是使苏联党和工会摆脱了官僚主义，而是导致对广大改良主义者使用“短棒战术”。在《曙光》一书中，霍克海默尔说了与此非常相似的话：共产党人很少关心私人性的问题，既然他们关心的只是一个“真理”（革命），他们就用“伦理和物质的力量（如果必要的话）”来“开导”社会党人。<sup>①</sup>

但是，尽管德国共产党反对派很重视保持理论、政党和阶级之间具体的辩证统一性，也完全不能把它看作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民主社会主义观念的具体体现。首先，和托洛茨基一样，布兰德勒主义者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反对崇拜任何苏维埃模式。霍克海默尔只是对德国苏维埃的失败感到哀痛，而在德共反对派的分析中则强调德国苏维埃对其失败应负的责任：1918年12月的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对资产阶级政府采取必要的严厉措施一事上太犹豫不决，太缺乏经验。1919年初，“斯巴达克同盟”的成员被血腥地镇压了，这件事不过是给由苏维埃代表大会自己不负责任地作出的决定贴上了封条而已。德共反对派认为，任何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承认，如果不同时象承认共产党在苏维埃组织中的领导作用一样承认苏维埃组织，都将是“毫无价值的”。与霍克海默尔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曙光》，第130页。

不同，德共反对派对于革命斗争的腐败的意识并不是导致一种抽象的希望，而是导致对严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确证。

但是，真正把法兰克福学派与德共反对派区分开来的事情是：后者赞同斯大林主义的政权。布兰德勒主义者在20年代虽然抨击共产国际的“官僚主义集权论”（他们是这种集权主义的受害者），但是，直到30年代中期，他们还一直拒绝把批评扩展到斯大林主义的政权本身。在此期间，关于政党、理论和阶级之间的关系，他们提出了一种令人极其反感的理论，认为只有工业化和集体化才能为减少官僚主义因素并为群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准备基础，在五年计划期间不允许任何人对这种政策后面的基本路线提出争议。问题只能如此：“党员和工人投身于实现五年计划”。可以假定，如果布兰德勒主义者在德国是胜利者，那么，德共党内“恢复”了的民主将被用于封锁一切反对以斯大林的俄国为模式进行德国“社会主义化”的人的口！

然而，真正奇怪的是，在德国共产党反对派内部有一个理论家的观点实际上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无产阶级专政观念非常相似，他就是保罗·弗罗里克，他和与他观点相似的两个同志一道，对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的许多政策提出反对，并且认为关于五年计划的论断是特别令人反感的。他们提出的修改意见读起来很象从《社会研究杂志》上抄来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明确地把矛头对准苏联：

“我们永远不能抛弃这么一条原理：社会主义的实现不仅仅是社会—经济的和技术的问题。社会主义的目标只能在工人阶级能够自觉地工作的时候才算达到了，这个阶级只有通过自身自觉的行动才能胜



任自己的任务。这就不只意味着要在执行国家下达的任务时协作（这一点大部分已经做到了）并且还意味着既承担责任、又积极参与政治决策以及增加首创精神。当今苏联共产党内的最高权力不是用来推进这种群众教育的过程，以使群众负起自我激发的责任，相反，苏联共产党是在窒息这一过程。”<sup>①</sup>

结果很自然，弗罗里克及其同情者在德共反对派内部很快就不受欢迎了，他们最后加入了社会主义工人党。这只是进一步证实了德共反对派与法兰克福学派在社会主义概念上的分歧。但是此外，这也意味着要给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找到一种实践上的体现，就必然要转向改良主义阵营，如果从高度批判的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工人党就是这个阵营的一个后嗣。

### 九、法兰克福学派和“议会共产主义”

在转而讨论社会民主党的各种组织之前，关于卢森堡主义还有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有待讨论，即“议会共产主义”。魏玛共和国初期，在德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一个自称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组织，它决不是作为对“抛弃列宁主义”这一作法的反应，而是作为对列宁主义的挑战而出现的。早在1920年，列宁就识别并谴责这个党说：“左翼”共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个政治派别的攻击。共产主义工

---

<sup>①</sup>《修正案：论五年计划时期德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地位》，见《逆流》，1930年12月6日，第703页。

人党拒绝它所称的“前革命性的组织形式”而几乎完全集中强调苏维埃形式，认为这种形式将作为革命局势中群众的要求和理想的最高表达方式而自发地兴起。议会共产主义后来的典型——“红色战斗队”——在1932年制订了这么一个文件：

“当前，革命党必须超越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为无产阶级民主的更高形式争辩，例如苏维埃专政……只有代表工人的革命意识才能导致苏维埃的建立。因而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推进这种意识革命化。在议会中，‘领导者’们为群众考虑和行动。而所需要的却是群众自己为自己考虑，并且通过他们自己的组织而行动，苏维埃……”<sup>①</sup>

与德共反对派不同，而与霍克海默尔相似，议会共产主义者并不是指出苏维埃自身对1918——1919年的革命浪潮的低落应负的责任。他们对列宁主义的改党不加断定。由于献身于通过无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原则，他们就把苏维埃制度绝对化了，并且期待新的革命高潮。因此，人们有理由问：议会共产主义是不是可能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许多原则的一种具体体现？

对“社会批判理论”有过如此影响的卡尔·柯尔施，20年代中期被作为“极左分子”开除出德国共产党。随后他逐渐成了议会共产主义的倡导者。柯尔施在纽约给《社会研究杂志》——或者说是现在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写

<sup>①</sup>汉诺·德茨希斯曼尔：《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魏玛共和国晚期对工人运动史的贡献》，见马堡《政治科学论文集》，科论白登俱乐部安东·马恩出版社1936年，第292页。

了大量评论。但他的真实兴趣却放在保罗·马蒂克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国际议会通讯》上面。他确曾试图劝说霍克海默尔一伙在他们的理论工作中承担某种形式的实践义务，但却毫无结果。这表明了柯尔施对法兰克福学派发生影响的限度。同时进一步表明了后者在坚持理论—实践关系上的失败。

全部论题又都转到了安东·潘尼凯克——一个荷兰议会主义者——这一人物的身上。1919年，潘尼凯克对俄国新政权的的评价是肯定的，他把布尔什维主义等同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但这种评价后来又被修改了；在1938年写的论文《作为哲学家的列宁》中，他把苏联官僚主义化的根源一直回溯到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粗劣的唯物主义。与柯尔施和法兰克福学派一样，潘尼凯克强调说：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性劳动和创造性的精神活动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看作知识的源泉，而列宁却“在中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意义上理解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区别，把物理性的事实作为自己的基础。”<sup>①</sup>

在潘尼凯克看来，这件事对1917年以后俄国新政权的决定性发展具有直接意义：

“革命以后，在国家资本主义——中产阶级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的结合物，同时装点上一一些辩证的术语——新制度之下，以‘列宁主义’的名称宣布了官方的国家哲学。既然在它们的

---

<sup>①</sup>潘尼凯克：《作为哲学家的列宁》，见《新论集》，马蒂克编，1948年纽约版，第51页。



指导下自然科学和技术构成了生产高速发展的基础，那么，对那些俄国知识分子——他们把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未来寄托在辽阔帝国的统治阶级身上——来说，列宁主义就是正确的学说了。”<sup>①</sup>

潘尼凯克关于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见解，表明他正确接受了卢森堡的影响，就象他和法兰克福学派关系很接近一样。例如，他谈论无产阶级时说：

“它的目标在于自己成为生产的主人，由自己管理生活的基础——劳动。只有到那个时候，才真正砸碎了资本主义。这样的目的不可能由愚昧的群众（即自信地追随党的群众，这个党把自己表现成有经验的领导者）来实现。它只能在工人群众（即整个阶级）通晓自己战斗的条件，道路和手段的时候才能实现；那时，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判断明白该干些什么。……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能自下而上地建立起一个真正的阶级组织，它有点象工人议会这样的形式。”<sup>②</sup>

有重要意义的是，潘尼凯克在用铅笔对他的著作的英文译本的附本所做的改动中，删掉了“有些象”这几个字。

除了一两处微小的差别，柯尔施对这本书也很感兴趣，他描述说它“在各方面都非常好”。这是在1938年8月24日他致马蒂克的一封信中讲的。在那封信中，柯尔施说他打算劝说霍克海默尔和他的研究所注意潘尼凯克的这本书；或者是柯尔施自己将给《社会研究杂志》写一篇评论，或者是

---

①、②潘尼凯克：《作为哲学家的列宁》，第73页、76页。

应所长的请求，他将把这件事留给霍克海默尔自己去做。如果仅仅就潘尼凯克对列宁所做的哲学方面的评价来说，柯尔施当然有理由希望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响应！然而，《社会研究杂志》上并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篇由柯尔施或其他人写的评论。柯尔施的这次失败比其他任何情况都更清楚地表明理论—实践关系的断裂；霍克海默尔一伙绕开了一切具有直接政治意义的争论。他们自己抽象的理論的具体现实正好是他们实际上所抵制的某些东西。

随后，柯尔施在1938年12月23日写给马蒂克的一封信中，表明了他对社会研究所及其“软弱无用的哲学”的完全失望。他特别抱恨“形而上学家霍克海默尔”。为了证明这种指责，柯尔施指点马蒂克看一看所长的《最近对形而上学的抨击》。这是典型的柯尔施式的夸张，他还补充说：“另一方面，当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个社会科学的唯物主义者，我甚至反对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最好形式。”当他这样说的時候，他也并没有公正地理解霍克海默尔。在那篇文章中，霍克海默尔的全部动机不仅在于说明朴素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同时还在于说明对这些局限性的形而上学沉思本身最终也是一种曲解。（见第二章）然而，柯尔施有一个观点是正确的，即：就法兰克福学派来说，重新开始的对形而上学的争论，并非在真正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的实践理論的意义上对哲学的扬弃。柯尔施肯定设想过：在半途而废的情况下，辩证法就容易滑入唯心主义。正如历史证明的那样，霍克海默尔果然走了这条路（见136页）由此就提出了改良主义问题。

## 十、法兰克福学派和改良主义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各种理论和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相信有必要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地说，法兰克福学派也赞同这一观点。遗憾的是，上述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作为他们的观点的充分体现而被接纳。如果有人想抱着寻求这样一种体现的愿望去继续审查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他最后就不得不转向改良主义的阵营。即使法兰克福学派，在此也无法予以确定，对改良主义的讨论将为分析左翼社会民主党打下基础。后者是作为对改良主义理论的否定而兴起的，通过讨论后者，就可以完整地勾画出阶级斗争的轮廓。

改良主义的基本特点实际上就是把一切改良的意识和目的绝对化。本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辩证统一性的改良与革命被割裂开来了；前者被抬高成为达到社会主义的手段，自然就会把后者不仅看作不必要的，而且看作令人讨厌的动乱。改良主义之父伯恩斯坦解释说，他的理论不是背弃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理性化了”。他还经常以肯定的态度援引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即强调民主主义斗争对争取选举权和争取集会自由等等所具有的价值以此证明他的理论。但是事实上，伯恩斯坦篡改了这些斗争的全部含义，使其成为一种进化发展的一个方面：

“普选权只是民主的一个部分，尽管是这样一部分；总有一天，它会在它之后引出许多其它部分，就象磁铁把铁屑吸引在自己身上一样。这当然要比许多人所期望的进展慢得多，但尽管如此，它却总



是在进展。社会民主党再没有别的办法会比下述办法更好地推进这一进展了。这一办法就是：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在理论上也是如此）普选权的原则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战术后果上。”<sup>①</sup>

正是为了强调自己的改良主义，伯恩斯坦把许多纲领性的原则当作“包袱”扔掉了，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伯恩斯坦认为，象这样的观点必须抛弃，因为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都投入到民主过程中了，这种过程与暴力的动乱以及所有的专政都是对立的。<sup>②</sup>

伯恩斯坦诚实的一个标志就是：他公开承认对马克思主义方法中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辩证法——提出挑战。他认为，马克思的分析之所以具有“实际”价值，就在于他强调经济的发展和民主的增长；马克思著作中的“缺点”就是它强调革命。后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乌托邦主义残余”，它还表现了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的残余，这种残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不可靠的方面，是铺设在全部逻辑分析道路上的罗网”。<sup>③</sup>马克思本人之所以弃绝改良主义，被认为是由于严重地受到了黑格尔的不良影响：“每当我们读到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的经济理论（这种理论屈服于那种把对强力的崇拜推到了顶峰的理论），我们都会遇到黑格尔式的公式。”<sup>④</sup>尽管伯恩斯坦谈论过对于剥除了神秘特点的辩证法的合理应用，<sup>⑤</sup>但是对于改良主义者来说，辩证

①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苏珊娜·希尔曼编，莱茵拜克鲁沃尔特出版社1969年版，第156页。

②、③、④、⑤、⑥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156—157页、207页、53页、62页、47页。

法仍然等于一种任意的建构。<sup>①</sup>

与此相反，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经过马克思使之合理化，黑格尔的遗产恰恰成了把历史唯物主义和朴素唯物主义区别开来的东西。因此马尔库塞在《理性和革命》中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进行了批驳，认为它抛弃了辩证法：

“修正主义用自然主义的英国国教徒式的态度取代了批判的辩证观点。由于屈服于事实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确实给‘合法议会反对派’的希望以理由），修正主义就把革命行动纳入这一信念的渠道，即‘通过必要的自然进化’达到社会主义。”<sup>②</sup>

马尔库塞继续说，既然理论和实践是紧密相关的，那么，对于理论的改变就必然导致“对现存社会形式的中立的或实证主义的态度”。因此，马尔库塞整个反对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幸的历史。

德国社会民主党无限信仰经过议会民主的道路达到进化的社会主义。由于“大联盟政府”在1930年解散，对魏玛共和国来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政府中的地位也就消失了。议会本身日益丧失它的重要性，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对通过议会道路达到社会主义的信赖却没有动摇。1930年10月，它阐述了如下的要点：“根据最近的选举结果，社会民主主义的德意

---

①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48—52页。

②、③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1967年伦敦劳特莱杰和基根·保罗出版社版，第399页、400页。

志共和国国民议会把保卫民主和宪法的安全，把保护议会主义看作自己的首要任务……。”<sup>①</sup>

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有些荒谬：这里所说的是1930年9月14日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失去了群众的支持，而它原本是指望群众来重申并加强社会民主主义议会政党的。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丧失的席位比德国共产党所得到的席位还要多，胜利者是纳粹党，它比原数增加了七倍。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结论竟要重申这种与广大坚定的工人阶级支持者疏远了的战略：改良主义变成了议会政治的愚昧病。希特勒这期间当上了总理。

伯恩斯坦实际上考虑了这种可能性，并且申明：如果反动分子企图削弱德国社会民主党日益增长的议会政治力量的功效，那么，革命手段将是必要的，而且决不会因为至今所实行的改良主义战略而削弱力量。求助于革命，这是一种不成文的权力，它象“自然法”一样受到安全保障。与此相似，德国社会民主党仍然相信，它所掌握的工人阶级的能量将在发生最坏的事情的时候“发动革命”。改良主义者声嘶力竭地叫嚷：“一百万成员！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然而事实证明：缺乏任何具体的武装行动的理论，甚至缺乏自卫的理论，而崇拜数字上的力量，结果就象魏玛崩溃一样走向了破产：德国社会民主党日益迅速地失去了工人阶级的支持，而许多仍然忠于党的武装的工会会员和社会主义者却在徒劳地期待着必要的领导来率领他们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

---

<sup>①</sup>《论共和政体和工人权利——德国国会中社会民主党全体代表决议》，见《前进报》1930年10月4日第1页。



事实证明，“乌托邦主义”不是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与革命的统一性之中，而是存在于对这种统一的抛弃之中；这不是抛弃了“思辨的”方法，而是抛弃了阶级斗争本身的实际。

1938年，霍克海默尔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灭亡看作是对所有的改良主义者的教训：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应当对一切‘文化之爱’都具有鉴诫作用。一种对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的批判态度将成为保存这种文化因素的唯一机会。相反，美好的描绘之词在很大程度上是给往日的资产阶级智慧披上外衣……”

马尔库塞的“按照整体主义的国家观与自由主义斗争”的说法，清楚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如何破坏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他还强调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垄断形式甚至不能无限地、连续地容忍自由主义的民主。改良主义企图说服群众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文化；这种观念忘记了“主要的一点，即这种文化已经不复存在了”。<sup>①</sup>正象霍克海默尔所认为的那样，必须把“自由”从一种“政治哲学”改变成“政治实践”。

### 十一、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民主党左派

由于上述原因，法兰克福学派否定了改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不过，霍克海默尔一伙并没有接受“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他们认为这种理论是非辩证的、宿命论的理论。不过研究所也没有承认托洛茨基的反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或德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专制集中的哲学》，第380页。

<sup>②</sup>马尔库塞：《文化的肯定性特征》，见《否定》，第132页。

共反对派的理论。而且，尽管议会共产主义在很多地方体现了霍克海默尔一伙的批判理论，也还是悄悄地被他们丢弃了。由此引起的怀疑就是：法兰克福学派虽然对改良主义持批判态度，但他们自己并没有为把“自由”转变成“政治斗争”制定出任何系统的具体的战略。不过，在证实上述怀疑之前，必须先对一个决定性的政治流派予以考查，这个流派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

这一运动的杰出理论家是马克斯·阿德勒，一个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起过重大影响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阿德勒的著作涉及到一个广阔范围中的许多问题，既有哲学方面的又有实践方面的问题。在前一方面，阿德勒几乎不比法兰克福学派逊色；例如，在为《格律恩堡文库》写的一篇文章中，他曾经希望看到霍克海默尔在《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起源》中对G·维科的讨论。正如后来的研究所所长试图从维科的分析中学到某些“有实践价值”的东西一样，阿德勒也把这个意大利人看作一个“指导性的、起推动作用的”人物。并且阿德勒不仅集中注意了维科的著作中那些预见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观点的部分，而且他实际上还预言了对霍克海默尔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视，即对自然科学的批评所做的元批判性的评价：

“在一个从笛卡尔、伽桑狄和伽利略那里接受了对其世界观的剧烈冲击的时代，为了把思想从神学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并且用自然法来取代神学的天意，维科对这种新思想的反对将把他排除在他同代的科学潮流之外，这是不可避免的。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对自然科学的反对并不是全盘否定科学，而只

是反对自然主义和机械论，维柯拒绝承认它们也是对理智和历史过程起支配作用的力量。”<sup>①</sup>

不过，在阿德勒看来，这种辩证的分析方法不止是一种哲学武器，它也是阐明并发展正确的阶级斗争战略的革命武器。在这一点上，阿德勒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分歧。

早在1919年，阿德勒就根据议会制度的疑难问题提出对议会制度进行讨论。阿德勒虽然赞同苏维埃政体，但他并不（象霍克海默尔几年后所做的那样）满足于任何抽象的奢望——希望一切都会很好地发展，而是在实际上认真研究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组织上的现实性。阿德勒最后公开反对工团主义，并且指点读者注意列宁和托洛茨基对苏维埃作用的规定。必须用对社会主义的清楚信念来弥补和调整苏维埃的自发性特性；因此，只有社会主义者才适合于选举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事实上，可以使公民权本身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的明确信念的基础之上。

在霍克海默尔任法兰克福研究所所长的第一年，阿德勒就论辨说：虽然在苏联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是“共产党的恐怖主义”，但是，对恐怖主义也应当依据它的具体社会历史作用来评价；就苏联的情况来说，这种恐怖主义“推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并且在那里有它的“历史的、阶级革命的正当理由”。阿德勒并非没有看到官僚主义的倾向；相反，他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但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是直接联系对这种倾向进行积极的批评和斗争的那些政治派别来谈问题的。尤其，他把斯大林—托洛茨基之间的争论

<sup>①</sup>阿德勒：《维柯对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重要性》，见《格律恩堡文集》，1929年第14期，第282页



看作关键性的争论，并且明显站在托洛茨基一边。

阿德勒后来也象霍克海默尔一样，醒悟到苏联的问题并且对议会制度做了日益抽象的宣传，没有对议会制度的难题进行认真探讨。与霍克海默尔不同的是，在阿德勒那里，这种醒悟并不是连带着把理论—实践关系也一块打破了。阿德勒的理论仍然是与具体的阶级斗争现实一致的。1932年，即《社会研究杂志》问世的第一年，阿德勒批判了社会民主党“对民主所持的非批判的、自欺式的迷信态度”，指责这种态度妨碍无产阶级“把民主用作阶级斗争的革命武器”。霍克海默尔后来所说的“对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的批判态度”，在阿德勒的理论中表现出更加具体的形式：

“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运动的发展，并不象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一直认为的那样是机械的、经济的过程。毋宁说，这种过程仅仅是由人们和阶级的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所决定的过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对立造成了这么一种局势，在其中，经济条件越是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准备了条件，统治阶级的下述愿望也就变得越坚定，即：尽可能地用强力反对这种经济的发展，并且抑制它的作用。”

因此，对于劳工运动来说，阶级战争就是一种生活的需要，一种职责和一种不可抗拒的事实。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拒绝了伯恩斯坦进化论的经济主义，恢复了阶级斗争的辩证法。

---

①阿德勒：《我们怎样走向社会主义》，见《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见解》，1932年，第6期，第33—34页。

在德国，即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发祥地，社会民主党左派在20年代末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批判的派别，并且受到马克思·阿德勒的大力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认为，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无条件地赞成维护工人阶级的权力和生活水平，而不用顾虑议会均势。虽然缺乏一切清楚有力的理论基础，左派反对者们还是拒绝了希尔弗丁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种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一个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将足以认识到隐藏在资本主义计划发展之中的丰富的社会主义特点。

1929年的财政崩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变得更加荒谬了：按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领导人的比喻，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个濒临死亡的病人，而德国社会民主党自己倒是一个不慌不忙的后嗣，好似一个“医生”。根据这种观点，最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不是促成革命的阶级意识的时机，而是一种不幸的经济骚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看来，这种骚乱能够转化成社会主义的天堂。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对问题不这样看，它认为，通过把工人的骨头磨成“药”来使用，资本主义只可能“恢复健康”。在此情况下，改良主义就变成了剥削无产阶级的帮凶。

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一个领导人马克思·塞德维茨认为，党的优柔寡断实际上削弱了劳工运动潜在的力量，这种力量本来可能而且应当组织起来用于反对即将到来的法西斯极权主义；资本主义当局毫不妥协地要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这迟早会迫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坚定地站出来并且高唱：到此为止，不许再甚了！

“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占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主义

为了进一步推进他们的目标，将会直接使用它最后的武器——法西斯主义。在此局势下，反击资本主义反动要求的可能性就完全取决于工人阶级所能够集中起来用于反对阶级敌人的军事力量。社会民主党越是让步和妥协，‘到此为止，不许再甚’的界限就会越后移，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无产阶级军事力量也就变得靠不住了。”<sup>①</sup>

乌克斯·阿德勒的影响得到了正确的理解。但是，这种军事力量的组织情况又怎么样呢？

在赛德维茨发表这篇挑战性的文章的同一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开除了左派反对派，这个左派反对派组成了目前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事实证明，这个党的历史及其为实现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原则而进行的实际斗争史是令人失望的。苏联的演变让人既爱又恨，其中表现出一种无法把握的矛盾；并且，与霍克海默尔一样，社会主义工人党把议会形式看作一个“重大的历史教训”，没有考虑到苏联自1917年以来的经历中的实践教训。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社会主义工人党仍然是一个分裂出来的小派别集团；事实上，虽然它是魏玛时代末期德国最大的一个小派别集团，但它的影响却远比相对而言在组织规模上较小的德国共产党反对派要小得多。即使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批评者，在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官僚主义腐化现象等等问题上，左派也缺乏清楚有力的理论；这一缺陷也传给了社会主义工人党。虽然得到了德国共产党反对派中的右派的支持（包括弗罗里克的支

<sup>①</sup>赛德维茨：《法西斯主义的作用：资本主义希望怎样消除危机？》见《阶级斗争》，1931年第5期，第163页。



持)，社会民主党左派也从未发动过任何有重大意义的革命实践。1932年末，这个党中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意识到了他们面临绝境，并且对他们的同伴们那种软弱无力的政纲及其把社会主义廉价变卖为抽象的民主政治形式的作法提出了强烈指责。

和法兰克福学派相似，社会民主党左派也拒绝德国社会民主党非辩证的、宿命论的改良主义，虽然他们同时也拒绝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概念。此外，再次与法兰克福学派相似，社会主义工人党与托洛茨基和德国共产党反对派都明显地保持着距离，后者那好战的列宁主义似乎对更好的民主原则有所侵犯。但是，最后，还是与“社会批判理论”一样，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没能够把自己的各种理论片段构筑成为透彻有力的群众政治实践理论。

## 十二、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元批判

但是，甚至与社会主义工人党也不同的是，法兰克福学派似乎在30年代初期曾经确信：如果具备一定的条件，政治实践就是注定的了。“社会批判理论”的“真理”必然变得日益脱离有组织的反对派集团；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这个真理将被一次重大的政治运动认真地采纳。霍克海默尔在《社会研究杂志》上以预言这种时期的口气写道：

“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发生之前，真理可能只是少数小集团的独占品。历史教导我们，这样的小集团可能受到社会中的对立因素的忽略或排挤，但它们却是坚不可摧的，并且，以其远见卓识为基础，它们

可以在决定性的时刻起领导作用。”<sup>①</sup>

因此，甚至在《宣言》中，关于批判的知识分子，政治先锋队以及群众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观念，就从持续不断的争论转向由理论自发地向实践转变的可能性了。

自然，一种关于自发性的理论便于避免那种阐述有组织的范畴的理论所具有的必然性，但是，任何一种这样的理论都很难称得上是革命的“真理”。事实上，这种理论虽然说明了某些政治实践的可能性，但是关于这些实践的情况它却只字未说。“社会批判理论”虽然确实说明了实践观的理论意义，但它本身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实践性的理论。因而，当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在60年代以学生的反权威运动的形式表现出一种实践意义的时候，也正是这同一个运动很快地、而且必不可免地就被卷入对“社会批判理论”的根本性的元批判之中了。例如阿多尔诺的最有才华、最富于批判精神的学生汉斯—于尔根·克拉尔写道：

“批判的理论受益于德国唯心主义传统，因此它的理智活动中充满了反实证主义的以辩证法作为中介的理性。批判的理论能够承认一种整体性观念——就其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持的看法来说，这种整体观是反形而上学的——但它却不能根据这种整体性观念的具体表现把它理解为阶级对立……粗略地说，实践的阶级立场并没有作为这种理论的一个积极的

---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见《社会研究杂志》，1937年第6期，第291页。

构成部分进入这种理论。”<sup>①</sup>

这段话不仅表明了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局限性的见解，它还是对法兰克福学派对自己的理论活动的看法所做的反驳。克拉尔评论阿多尔诺说：“他的批判的选择认为，一种理论要证明自己是真理，就必须超越自身，并且以实际改变社会为现实目标。这种理论，如果不能用有组织的范畴来建立自身，就将没有自身的粘合力。”<sup>②</sup>与此相似，霍克海默尔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的牧师”，又是一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的理论家”；“他无法填合这两种身份之间的沟壑”。<sup>③</sup>

霍克海默尔声称：通过揭示各种矛盾力量的革命意义，“社会批判理论”起着加剧社会张力的作用。现在看来，这一声称并不尽然。如同稍晚一些的另一个法兰克福批判家曼弗里德·克莱门茨所指出的那样，由霍克海默尔一伙进行的理论—实践关系的概念化，把意识形态批判和实践性的理论之间的关系看作不成问题的事，设想一个可以直接转变成另一个。下面这种批评还不是最激烈的指责：“法兰克福学派不能领导革命”。更确切些说，学生的反权威主义运动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回避了这么一个问题，即形成一种对过去或当前的阶级斗争的具体的实践的批判的反映。

60年代德国学生运动并没有自我欺骗式地认为革命即将来临；相反，他们的最杰出的理论家强调说：问题不在于

①汉斯—于尔根·克拉尔：《宪法与阶级斗争：论人民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辩证法》，法兰克福，新评论出版社1971年版，第289页。

②、③柯拉尔：《宪法与阶级斗争》，第286页、241页。



“立即进行夺权斗争”，而在于“向人们说明长期的启蒙过程将是怎样的情况”。然而即使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批判理论”也不能为人们提供什么：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大量揭示了物质和文化控制中的机械主义，但它却脱离了由同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所提出的一些实践范畴。结果，这种意识形态批判甚至对意识形态斗争也没有提供什么具体的指导。（参见第四、五章）。

学生运动对“社会批判理论”的借用是元批判性的，这不是在一种纯粹理论的意义而言，而是在实践的意义而言。例如，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变成了对有组织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必要性的觉悟。克拉尔认为：

“与资本主义的需要相适应的专门化，破坏了真正的教育和科学反思所必需的时间，把它断送给了反历史的、纯粹形式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时间：劳动时间。一个知识分子，不能容许自己这种本质性的自觉的科学反思的时间被剥夺……”<sup>①</sup>

因此，德国方式的学生反权威主义运动构成了对大学教学的方法和内容的社会意义的批判。他们要求（并且他们也制订了）新的教学程序，特别鼓励对社会和教育进行反思；而且他们也揭露了教育中最根本的资产阶级专政。

### 十三、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瑟尔

在此不可能详尽说明学生反权威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①柯拉尔：《宪法与阶级斗争》，第238页。

②柯拉尔：《宪法与阶级斗争》，第240页。

史·毋宁说，这里是要概要地指出“社会批判理论”的不当之处。同样的论点可以参考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瑟尔，他是与霍克海默尔一伙同时代的理论家，但他所走的道路却与法兰克福学派很不相同。索恩—雷瑟尔与本杰明和阿多尔诺有私人交往，据他自己承认，他还受到霍克海默尔和马尔库塞的很多影响。他说：“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他认为自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份子。但是在决定性的意义上来说，他并不是，相反，他的理论工作使他走上了另一个方面，从而帮助他超越了以上已大体勾画出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缺陷。索恩—雷瑟尔的理论在70年代表现出成熟的形式，其中试图严格根据资本主义剥削的垄断阶段对这种剥削的确切本性给以历史唯物论的分析，同时还包含着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最后还试图提供有关“彻底解放”这一问题的观念。

索恩—雷瑟尔的工作是以一种完全不引人注目的对商品形式的分析开始的，他认为这种分析是达到超验的目标的关键。早在1937年他就写道：

“以全部理论知识为基础的起构筑作用的综合（既是逻辑地、又是发生学地）是由剥削导致的具体化和具体化了的社会化。这一论点的论证包含着以对自相矛盾的东西的清算为形式的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性清算，在这种自相矛盾中，人们的理性由于崇拜具体化而使自己纠缠不清。”<sup>①</sup>

当本杰明代表霍克海默尔的研究所审阅这篇手稿的时

<sup>①</sup>索恩—雷瑟尔：《对先验论的批判性清算——一种唯物主义的研究》，见《商品形式与思维方式（论文集）》，哈格等编，法兰克福，欧州教育出版社1971年版，第70页。

候，他在旁注中写道：“如果他是正确的，那就怪了。”<sup>①</sup>在1937年3月28日的一封信中，本杰明告诉所长说，尽管企图从商品生产中推演出纯理论性的思想将困难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有“重大意义的”。

索恩—雷瑟尔认为，社会研究所将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接受他的著作。1936年他给阿多尔诺写了一封说明信，几十年之后，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认为是雷瑟尔第一个指出了如下的问题：“在超验的原理背后，在精神的普遍而必然的活动中，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社会本性的作用。”<sup>②</sup>索恩—雷瑟尔承认说，在他看来，没有人比阿多尔诺更赞同他了，“阿多尔诺在他自己的理论工作中，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提出了同样的见解。”但是，索恩—雷瑟尔后来的发展使他自己越过了阿多尔诺的认识论的元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前提；因此，索恩—雷瑟尔谈论他在三十年代的著作时说：

“在这个阶段，我还不清楚我关心意识形态批判的目的并不在意识形态批判本身，而是通过它达到对存在的批判，也就是说，目标在于对现实中隐藏着的发展的更好的理解。事实上，意识形态批判不能胜任‘知识的元批判’这一任务……”<sup>③</sup>

这对于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对于他们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具有批判的意义。

①索恩—雷瑟尔：《对先验论的批判性清算——一种唯物主义的研究》，见《商品形式与思维方式（论文集）》，哈格等编，法兰克福，欧州教育出版社1971年版，第70页。

②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艾什顿英译，伦敦，劳特莱杰和基根·保罗出版社1973年版，第171页。

③索恩—雷瑟尔：《商品形式与思维方式》，第19页。



索恩—雷瑟尔重新考查过的另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是劳动分工，特别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在马克思看来，后者是最首先的真正的劳动分工。因此，当他强调“个人对劳动分工的奴隶般的服从”之消失是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一个必要条件时，他又补充说：“与此同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这就是为什么在无阶级的社会中虽然生产还保持有必然性但却必须包含一种新的自由：“在这个领域里，自由只能在于社会化了的人，在于协作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使这种相互作用处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象受盲目的自然力量摆布那样受其摆布。”因而，自由不只是劳动过程的超越，而且是后者<sup>①</sup>的一个方面。对于劳动过程的精神上的控制必须由劳动者自己占有；这就是无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

按照这种观点来分析当代社会，索恩—雷瑟尔提出了一种垄断资本主义中的经济控制理论。他以F·W·泰勒作为理想的模式，作为“整个一个新时代的标志”，根据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绝对分裂来解释“科学的管理”（时间和行为研究或工业工程学）；泰勒本人确实就是这样考虑问题的。但泰勒没有看到：工业工程学这门新学科只是“工人自己的劳动的异化了的社会化”。这一点在索恩—雷瑟尔看来是垄断资本主义控制的根本方面。

法兰克福学派虽然没有透彻有力的经济学理论，但他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在《社会研究杂志》发表的一篇题为《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应用》的文章中，马尔库塞得到了

<sup>①</sup>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恩格斯编，伦敦，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索恩—雷瑟尔非常相近的看法，他在这篇文章中实际上集中注意了泰勒主义的意义。对于马尔库塞的讨论将放在本章后一阶段，因为他处于比他的同事们更进步的地位。但是，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尔也非常接近这个问题；在一段描述惯常的上层建筑的绝对控制的杰作中，他们集中论述了当代社会中的经济控制；起因是对奥德修斯和赛壬的讨论：

“通过整个社会（它是一切关系和动机的体现）的中介作用，人们被再造成类的存在物，正如每个人在被迫联合起来的集体性中以分离的方式表现为类的存在物一样。彼此相互不说话的浆手各自都被结合在同一节拍中，就象现代的工人被结合在工厂、影剧院和集体中一样。在社会中实际起作用的条件强求划一主义——那些也使被压迫者沉默并把他们与真理隔开的意识的影响不在此列。”<sup>①</sup>

遗憾的是，经济控制的首要性并没有在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的研究的各个方面反映出来。

索恩—雷瑟尔的政治学理论不仅使人能够理解经济控制，而且也使人能够理解劳动解放的理论。人们可能还记得，霍克海默尔曾经相当正确地强调：社会主义不只意味着所有权的转移和“以社会性协作这一新形式提高生产力”。遗憾的是，霍克海默尔在集中论述了“所有这些事情在其中得以发生的那个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状况”之后，并没有进一步追问“社会协作的新型式”的确切性质。因此，他把马克思

---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合著：《启蒙的辩证法》，约翰·卡明英译本，伦敦，艾伦·莱恩出版社1973年版，第36—37页。

关于“真正的自由王国”的说法重复解释为“超越工作日之外”，而没有具体说明无产阶级的生产过程之中的这种自由，即构成其他一切自由的实质基础的自由。这种经济的自由在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那里也从未得到具体说明；相反，他们的具体的经济理论经常落后于他们的所长那些虽然抽象、但却精辟的见解。例如，K·曼德尔鲍姆和G·迈耶认为：“随着生产手段的社会化，阶级统治的基础也就被铲除了。”他们根据“有计划的经济控制”来设想无阶级社会，却没有强调社会化意味着由生产者进行控制。

显然，法兰克福学派最先进的概念和范畴并没有辅之以相应的经济理论。今天所需要的就是重新强调这种平衡；索恩—雷瑟尔的工作对于该如何扬弃“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清楚的暗示。例如，只需借助于经济异化理论，就可以充分把握苏联的腐化变质。索恩—雷瑟尔并不是没有看到由于战争破坏造成的经济混乱加在布尔什维克党身上的重负，他批评的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把早期经济方面的权宜之计永久化了。弥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理论在苏联被忘记了，索恩—雷瑟尔说：

“当然，民主化的潮流使他们感觉到了这种潮流，但是，象在西方那样，这种潮流的目的决不是以工人人们的社会主义权力来取代工厂指导者的权力。毋宁说，问题在于工人逐渐参与对工厂的指导。”<sup>①</sup>

用卢森堡的话说，苏联共产党把非做不可的事说成了“出于好心”才做的事。他们丢掉了真正马克思式的“无产阶级作

<sup>①</sup>索恩—雷瑟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第176页。



为统治阶级组织起来”这一观点。

索恩—雷瑟尔的经济理论意味着他能够对苏联持批判态度而不放弃与阶级斗争的具体联系。正象索恩—雷瑟尔正确指出的那样，由于缺乏经济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与斯大林主义的俄国疏远之后的结果是“未能形成任何共产主义政治观或工人的实践观”。就此意义而言，法兰克福学派“背离了阶级斗争的政治实践”。这并不是否认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例如，霍克海默尔用标准的卢森堡式的语言强调说，“在争取无阶级社会的斗争中，群众首先必须把自己组织起来，把自己从单纯的历史客体改造成积极的历史主体，从而永远摆脱他们作为群众的特点。”<sup>①</sup>但是，关于这种斗争的实践性，却没有给以任何说明；而是用一种自发性理论取代了难堪的沉默。相对而言，索恩—雷瑟尔的理论提出了一种关于争取工厂支配权的阶级斗争的一般理论；它是一种实践的理论，“这种实践如果没有这种理论的觉悟，就会迷失方向，仅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中进行貌似革命的单纯的工作斗争，从而最终遭受到挫折。”<sup>②</sup>索恩—雷瑟尔关于真正的革命斗争的理论并不是完美无瑕的；尤其是，完全成熟的无产阶级正在推进一种正当的阶级意识和对资本主义的激烈攻势，这时对无产阶级的前景的展望却仍然完全不清楚。但这些问题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甚至连提都没有提过。因为它缺少一种经济方面的分析。

---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蒙太奇与怀疑的用处》，见《社会研究杂志》1938年第7期，第42页。

<sup>②</sup>索恩—雷瑟尔：《经济上的二重性》，第26页。

#### 十四、霍克海默尔的“社会批判理论”的蜕化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缺乏经济学理论，这最终不仅意味着抛弃阶级斗争，同样也意味着把“批判的社会理论”从开放的意识形态中抽取出来的价值唯心主义化的倾向。霍克海默尔自己曾经强调说过：如果在运用自由和平等等这些观念时不“清楚地考虑到历史现实和实践”，这些观念就会“蜕化成一些纯粹的概念”。遗憾的是，这些原来针对社会民主党的理论而发的指责，同样也击中了霍克海默尔本人，甚至在30年代，他的“社会批判理论”就丢掉了理论—实践关系（就其唯物主义的方面而言）。随后，倾向性的唯心主义逐渐变成了现实。

40年代中期间世的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标志着这一蜕化过程的一个阶段。虽然其中对“文化生产”的批判是精辟的（参见第五章），但由于缺少经济上的分析，却导致许多核心概念被人格化了。因此，“当启蒙由于惧怕真理而瘫痪下来的时候”，就会从中发现启蒙运动之所以蜕化成一种新的压迫性的神学的原因。虽然作者们强调决不能把“启蒙”和“真理”只理解成一种“文化价值”，而应当根据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现实的、唯物主义的方面来理解，然而，他们却从来没有用任何合适的方法对这个方面作描述。这样一来，与实践之间的任何联系就都被排除了，所谓“如果要不完全辜负人民的期望的话，启蒙就应当检查自身”也就仍然是外强中干的律令。因此，韦尔默尔——他曾经错误地把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描述成对马克思进行批判的十分重要的批判家（见第二章）——把《启蒙的

辩证法》看作由“社会批判理论”所做出的一个肯定性的进展，这就毫不足怪了。

从“社会批判理论”中为自己找到许多理论武器的学生反权威主义运动，也没能促使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他后来返回欧洲了）对他们的工作进行反省。相反，学生运动不是被回报以沉默，就是被报以敌意，就象克拉尔所陈述的那样，有组织的学生运动被斥为“行动主义者”和缺少任何观念上的连贯性。在为自己的《社会研究杂志》论文集写的再版序言中，霍克海默尔主要关心的是把自己与他的观念在德国学生的造反运动中的一切实践表现区别开来：

“面对日益严重的对个人自由的威胁，保护、保存甚至在可能的时候扩大这有限的、短暂的个人自由，这是当务之急，这比抽象地否定这种自由或通过毫无成功希望的行动危害自由要紧迫得多。”<sup>①</sup>

这不仅是对“社会法西斯主义”概念的否定，而且在根本上也是对全部批判的实践活动的抛弃。与霍克海默尔在30年代提倡的作为实践策略的“对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的批判态度”不同，他现在倒退到改良主义的对“较少的罪恶”的承认，而听任随后的事情走到了他曾经最为痛恨的敌人一边。

这标志着霍克海默尔在理论上全面垮掉的开始，这种衰颓，证实柯尔施对“形而上学理论家霍克海默尔”（见115页）的指责是正确的。例如，原研究所所长后来竟发展到抽象地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辩护，

“人的发展是与竞争（即自由经济最重要的因素）紧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批判理论》，第1卷，第115页。



密相联的。经济领域的自由竞争也可以提高人的精神……马克思把个性的全面发展作为一个目的注入未来。然而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时代的结果，并且因而与自由主义的消失一起消失。”<sup>①</sup>

这样一来，自由主义就得到了往日历史的证明，而可能使无阶级社会中的全面发展得以实现的批判的实践则从视野中消失了。

到霍克海默尔去世时，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观点实际上整整转了一个圆圈。在他的就职演说及《社会研究杂志》序言中，他认为社会服从于变化，这种变化将在“社会批判理论”中得到阐述，但他并没有说这种理论设想在指导这种变化的工作中起积极的作用。随后，他关于批判的知识分子的作用的观点远远超出了这一观点，但实际的分析并没有达到实践的批判的理论所应具有完备的理论—实践关系。在年老昏聩之时，他又返回到以前的观点，认为“批判的理论始终有着双重的任务：具体说明什么应当变化，并且保留某些文化要素。此外，它还必须描绘出我们的世界所遵从的变化过程。”<sup>②</sup>

霍克海默尔完全忘记了的一点是，一种理论如果不联系能动的变化主体，就甚至不能确定“什么应当变化”。

### 十五、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庸俗化

在马尔库塞看来，霍克海默尔最后的观点“不值得批

---

①《〈明镜〉周刊与哲学家霍克海默尔的谈话》，《明镜》周刊1970年1月5日，第80页。

②《明镜》周刊1970年1月5日，第79页。

判”，这种尖刻的评判虽然是针对他原先的同事的，却也是完全正当的：对于颇有才能而又刚直不阿的马尔库塞来说，霍克海默尔晚年不仅背叛了研究所早先的“社会批判理论”工作，而且背叛了霍克海默尔曾经说过的在一种新建的形而上学框架中仍然坚持的很有价值的东西，但霍克海默尔的背叛行为也不是完全出人意料的；毕竟，柯尔施在30年代后期就已经预言过它了。事实上，面对日益兴起的学生反权威运动，“社会批判理论”的内在矛盾——即一方面借用各种自由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在借用过程中缺乏革命的唯物主义——必定要求对之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解决。霍克海默尔非批判地把自由的意识形态绝对化，这是对矛盾的一种解决办法。幸亏另一种可能的解决——即“社会批判理论”的唯物主义化和彻底化，在马尔库塞那里得到了直接的表现。

马尔库塞最近承认，甚至在30年代他与霍克海默尔就有分歧了；例如，马尔库塞认为研究所的工作和出版物“心理气味太浓了”，并且缺乏一种相应的经济和政治尺度。对马尔库塞本人这一时期的稿件进行考查，就可以看到他上述观点的具体表现。与霍克海默尔不同，马尔库塞在《批判哲学研究》中重申了马克思关于自由存在于生产过程之中而非生产过程之外的观点。他引用了《资本论》中一段有关的话，并且解释说：在这里自由第一次被看作“组织社会性劳动过程的”任务之一。在谈到无阶级社会的时候，他提到了索恩-雷瑟尔的观点，“权力结构由阶级社会决定，这种状况将会消失，尤其是资本主义统治制度的剥削作用和对‘管理’所做的政治性的占用将会消失。”在谈到“对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性应用”时，马尔库塞实际上把泰勒主义斥为

“现代化了的专制制度”。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中，马尔库塞指出：在苏联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中”，统治仍然在劳动分工中起着专门化的作用，因而仍然是官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垄断。

这种唯物主义的见解直接导致了马尔库塞与60年代兴起的批判的实践活动之间的一致性。霍克海默尔对表面上看来并不一致的造反运动持疏远的态度，与此不同，马尔库塞则证明这种造反活动的正当性，他说：

“在其最高发展阶段上，统治起着管理作用；在公众消费过分发达的地区，有压抑的生活成了全体最好的生活。为了保持这种生活，连对立面也被联合起来了。这是纯粹的控制形式。相反，对它的否定表现为纯粹否定的形式。全部内容似乎都归结为‘要求结束统治’这一抽象的要求——即唯一真实的革命迫切性……”<sup>①</sup>

但是，马尔库塞不仅仅是一个同盟者而且是一个虽然友好，但却严厉无情的批评家。他把全部否定描述为一种“抽象的”要求，并且强调它“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形式”。<sup>②</sup>与他对生产战线的强调一致，马尔库塞断言：“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仍然取决于构成生产过程中的人的基础的那一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阶级就是产业劳动阶级。”<sup>③</sup>与大众的信念相反，马尔库塞从未离开过这一基本立场。

不过，这并不排除对学生骚乱所具有的批判意义进行严

---

①、②马尔库塞：《单面的人》，伦敦，星星出版社，1968年版，第199—220页、200页。

③马尔库塞：《解放论》，第59页。



肃的讨论。与他原来的同事不同，马尔库塞把“破坏性的激进分子”导致的似乎是外来的大学政治化，作为教育本身内在动力的合理表现加以维护，认为它是“把知识转变成现实、把人道主义的价值转变成人道的生存条件”。激进的意识可能确实源于社会的教育制度内部，而且与克拉尔相似，马尔库塞强调：应当保护这种气氛以便反对整体性的工具化：“为争取自由的和批判的教育而进行的斗争，变成了更广泛的、为争取变革而进行的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sup>①</sup>

不过，尽管马尔库塞也谈论说无产阶级的彻底化有赖于“无产阶级行列之外的革新家”，<sup>②</sup>他也并不赞成列宁主义有关知识分子先锋队的任何观念。早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中，他就议论列宁说：

“他与‘经济主义’的斗争和有关自发的群众运动的学说，他关于阶级意识必须从无产阶级‘之外’灌输给无产阶级的名言，都预示着把无产阶级在事实上由革命过程的主体变成革命的客体。”<sup>③</sup>

因此，马尔库塞在他最近关于革命组织的概念中细心地避免使用任何关于由学生和知识分子“把真理交给工人”这样的观点，而认为工人和知识分子这两个集团必须“各从自己的基础出发，根据自己的意识，自己的不满及各自的目标进行活动”。学生和知识分子可以、而且确实应当向工人提供与他们各自的斗争有关的鼓动性的材料，但并不存在由知识分子领导这种斗争的问题。正如马尔库塞自己承认的那样，这

---

①、②马尔库塞：《解放论》，第66页、59页。

③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第32页。

种观点“与所谓‘从外部来的阶级意识的发展’非常不同”。

马尔库塞认为，存在着这么一种“机会”，在这种机会中“最先进的人道意识可以最充分地表现出自己的力量”；这只是一种“机会”，但这并不是霍克海默尔对纯粹“真理”的被动关注所说的自发性理论。确切些说，马尔库塞的自发性与议会共产主义的反列宁主义运动是相联接的。值得注意的是，保罗·马蒂克的《马尔库塞批判》最终并不完全是否弃马尔库塞。马蒂克这个原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前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成员，他批评马尔库塞缺少对世界经济学的分析，但他自己也认为革命是一种“机会”，而不是时刻都存在的，能够由列宁主义的先锋队加以实现的潜势：“革命步骤的形成并不必然要求一种始终如一的先于最初的独立行动的对立行为；在一定条件下麻木不仁的工人阶级在另外的条件下可能变成激情满怀的工人阶级。”<sup>①</sup>因此，革命的理论家等待这些条件以使革命成为现实。如同马尔库塞最近指出的那样，他自认是卢森堡的斯巴达克同盟的左派共产主义的真正继承人而不是右派共产主义的继承人。因此，马尔库塞最后的著作讨论了重视苏维埃的可能性，即重视“自我决定、自我管理（或者是为自我管理准备条件）的组织”的可能性。虽然他补充说这样的理论和战略决不应盲目崇拜任何“下层”，<sup>②</sup>但他并没有设想一种按列宁主义传统来领导苏维埃的知识分子先锋队。

---

①马蒂克：《马尔库塞批判：阶级社会中的单面人》，伦敦，默林出版社，1972年版，第106页。

②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第44—45页。

马尔库塞激进的理论活动，并没有产生任何“决定性”的革命战略，因为他的理论是对正在兴起的新的实践活动的辩证回答，而这种实践活动仍然处在初期阶段，它本身还没有提出任何决定性的理论武器或实践武器。因而从六十年代中期往后，马尔库塞的工作是试图更新、扬弃“社会批判理论”的革命意图并使之彻底化，同时在批判的统一性中把它和刚出现的实践运动联系起来。在这种意义上来说，马尔库塞是对《社会研究杂志》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扬弃”。

### 十六、“社会批判理论”和对控制的分析

在追溯了法兰克福学派内部两种背道而驰的发展并确定了马尔库塞的作用在于对“社会批判理论”进行了充满活力的扬弃之后，我们仍然需要继续考察《社会研究杂志》时期的理论成果所具有的意义。学生的反权威主义运动为什么会如此认真地接受这些成果并使之重新流行呢？克拉尔在某种程度上对此作了回答：法兰克福学派帮助学生和知识分子大体上认识到了德国唯心主义和辩证法的意义。而且“社会批判理论”还集中注意了“控制”的问题，克拉尔说：

“批判的理论为知识分子（他们是过去的资产阶级的一个支族）的政治运动提供了解放的概念。批判的理论说明了资产阶级个人和自由市场上自由支配的意识形态是怎样一去不复返了。另外，虽然人们必须承认霍克海默尔用辩护的眼光在自由社会中所看到的东西实际上只是适合于资产阶级家族，但是，批判的理论也还是说明了这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发展了一种朝向技术性的阶级社会的趋



势，这种社会把个人还原成了按巴甫洛夫的狗那样的反应模式进行活动的动物，全部剥夺了资产阶级家族一直默认的个人的批判的自我的因素。”<sup>①</sup>

克拉尔所谓“解放的概念”并不是说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践方式，他的意思是：包含在对控制的广泛批判之中的那些一般概念具有一种批判的、潜在的实践意义。与此同时，“社会批判理论”中缺少经济的和社会—政治的具体性，这就意味着这些概念的失真性。

霍克海默尔在1965年写了下面这段话，把他在《社会研究杂志》上的论文和他现在的立场联系起来：“在那个时候我以对社会的分析为基础而产生的对进步活动的信念，现在变成了对新罪的畏惧和对极权主义统治的畏惧。”<sup>②</sup>然而，即使在30年代，对现代控制机器的敏锐意识就受到了对于实践的信念的限制。《宣言》认为批判的理论家不能指望任何社会集团的支持，因为“在目前条件下，每一个社会集团都在意识形态上受到约束并且腐败了，尽管它的社会地位注定了它需要真理”。<sup>③</sup>因此，即使在《社会研究杂志》时期也已经大量地涉及对控制进行分析了。但是，另外，霍克海默尔对实践所抱的任何信念都缺乏相应的“社会分析”基础。事实上，缺少经济和政治理论将使任何乐观主义都变成一种抽象的、纯粹主观的成见。

在第二章中我们大致勾画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方法论

---

①克拉尔：《宪法与阶级斗争》，第234页。

②霍克海默尔：《批判的理论》，第2卷，第Ⅴ页。

③霍克海默尔：《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第291页。

贡献，在这一章里我们又精确地指出了这一理论最终在理论—实践关系中存在的断层，剩下还要做的就是详细考察法兰克福学派对控制所做的分析。不过，元批判性的观点要求这种考察有严格的程序：必须以澄清理论上的曲解的办法来使用批判的范畴，并且把控制机器内部的矛盾与批判的实践活动的要求、可能性以及目标联系起来。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在于推翻法兰克福学派在有关时期（1930—1942）中所做的工作，而是为了使之合理化

## 第四章 历史唯物主义的心理學： 控制和反抗的心理方面

对控制的分析首先是一个心理学的课题，因为这种控制是支配着上层建筑的控制的，无论是在霍克海默尔的就职演说中，或是《社会研究杂志》第一期的编者序言中，这一点都有所宣告。由研究所所长提出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表现之间的“心理的联系环节”问题。霍克海默尔在《社会研究杂志》第一期上的一篇文章中又指出了这一问题的疑难所在：

“只要理论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经济生活中的结构变化如何通过某一时期各个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心理素质而转化成他们整个生活观念的变化，那么，这种相互依赖的理论就有某种武断的成分，这种成分严重地限制了理论在说明现实时所具有的假设意义。”<sup>①</sup>

如此，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心理学的问题就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社会批判理论”面对近代历史（垄断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产生）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霍克海默尔的就职演说曾提到对有关主体的科学著作进

---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历史和心理學》，见《社会研究杂志》1932年第1期，第134页。



行有条理的研究的必要性。从此，《社会研究杂志》就一反《文库》的作法，开始评介弗洛伊德、荣格和其他心理学家的著作。不过，在分析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一领域的工作之前，必须回答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任何心理学的部分是否都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容。这就提出了关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一问题并不是可以轻易解决的。举例来说，卢卡奇曾于1923年强调“正统性专指方法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就是坚信辩证唯物主义是“达到真理的途径”，而且“它的各种方法只能沿着它的创立者们所开辟的路线发展、推广和深化”，反之，“一切试图超越或‘改善’它的打算都已经和注定要导致简单化、浅薄琐碎和折衷主义。”<sup>①</sup>

尽管恩格斯也曾承认（见第一章）他和马克思在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强调内容而忽略形式，亦即这些概念所借以产生的途径和方法”，但是，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通常他们被称为“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普遍公认的意见是心理学并不能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心理学是不能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们制定的路线相容的，因为它必然要导致“折衷主义”。例如，沃尔特·乔普克就坚持认为即使法兰克福学派也使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他们也是使其失去了本义而用“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范畴混合而成的折衷概念来代替它们”。罗伯特·施泰格尔沃尔德谈论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物学的、本能结

<sup>①</sup>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罗德里·科文斯通英译，伦敦，鹰巢出版社1971年版，第1页。

构的修正”，而格特·迈克斯勒则声明“对人类社会进行心理分析的尝试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至少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统观念”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结合起来的任何作法都必然是一种折衷。

诚然，“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些经济范畴还未能构成一种前后一贯的理论体系，这是毋庸置疑的，正是这一缺陷使它在整个《社会研究杂志》时期具有理想化和人格化的倾向；但是，法兰克福学派有关控制的理论对大学生反权威主义运动的理论宝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对社会研究所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分析给予认真的考察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就会证明“社会批判理论”的折衷主义实际上并不是由于把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协调起来的尝试所造成的，而是因为它是一个以前者损害后者的不成功的结合。

## 一、弗洛姆和精神分析学的意义

对法兰克福学派来说，能够运用于“社会批判理论”的最适当的心理学就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在霍克海默尔的同事中承担起提出并实现把弗洛伊德的著作综合到“社会批判理论”之中这一任务的成员就是弗洛姆。而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最初的重要论著就是《基督教义的发展》一书。在弗洛姆参加社会研究所之前所写的这一著作中，他的研究就指明了弗洛伊德主义既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也有某种非历史的曲解。这一分析在《社会研究杂志》上受到了博克诺的好评，说它是“根据具体事例说明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

分析的方法论综合的第一个尝试”。<sup>①</sup>弗洛姆随后就加入了霍克海默尔的班子，着手对这种综合进行详尽的论述并作出某种具体的应用。

弗洛姆的第一篇纲领性的文章被冠上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标题：“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和职能。”这篇文章也没有忘记引证恩格斯承认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有空白的言论。接着，弗洛姆就进而说明为弥补这一空白所作的种种尝试，由于对心理机制的完全无知而怎样在“固有道德原则”的伪装下偷运着“纯粹唯心主义心理学”的货色。因此，精神分析学的内容不仅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致的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所必需的，这样，才能在具体分析中排除唯心主义的赘物。

弗洛姆坚持认为弗洛伊德所发展的是一种普遍受欢迎的心理学，他的精神分析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的、社会的科学。弗洛姆争辩说，本能说原本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致的，不过，这种“本能素质”只有在和社会历史地特定的“生活经验”的辩证的相互作用中才能表现自己。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他曾涉及到人的“欲望”或“本能”，而在《资本论》中，他也承认某些欲望的原始本性，并且谈到“一般的人性”和“每一历史时代人性的变化”。对马克思来说，对基本需求的满足又“导致新的需求”，在“生产消费对象的同时，也就生产着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机”。<sup>②</sup>这样，人正是通过满足他的需求，从而创造这些需求的新形式以及新的需求的

---

<sup>①</sup>博克诺：《评弗洛姆的〈基督教义的发展〉》，《社会研究杂志》，1932年第1期，第174页。

<sup>②</sup>马克思：《写作提纲：政治经济学批判要点》，马丁·尼古拉斯英译本，哈门兹沃斯企鹅出版社，1973年，第92页。



过程来创造自己的。

对马克思来说，生产还包括智力生产在内，这里面当然也包含着法兰克福学派最关心的意识形态问题。下面的话可以表明，马克思是排除了一切拙劣的经济决定论的：

“人们是他们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象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来自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sup>①</sup>

但是，这是一个使异化的社会在智力活动的异化形式中进一步被扭曲的过程，除非借助于精神分析，这一过程就是只可记述而不可解释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法兰克福学派试图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意识形态控制的分析作出种种独创性的贡献。

弗洛姆争辩说，弗洛伊德主义心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在关于意识不是历史的最终动力而是“另外的隐秘力量”的反映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对马克思来说，这些力量正是人的本能、需求和生产能力，它们之所以是“隐秘的”，是因为这些人性的力量在阶级社会中采取了某种具体的、异化的样式。人自己的创造能力反过来成为一种支配着他的异己力量。弗洛姆力图揭示出这种异化的心理作用。这里的关键因素就是性欲的特殊性。如果说饥饿这种本能也是

<sup>①</sup>马克思：《写作提纲：政治经济学批判要点》，马丁·尼古拉斯英译本，哈门兹沃斯企鹅出版社1973年，第47页。

变化的，那么这种变化除了对食物的满足之外，不要求别的什么东西；反之，性欲的冲动则可以引起极为不同的变化：它可以被延缓、抑制、升华、变态。“人的食欲只需食物就可满足，而他的爱的欲望则能够用关于美好事物的幻想以及对上帝的爱来满足……”<sup>①</sup>性欲的强弱变化标志着这一本能可以最大限度地“适应满足这种生活的现实可能性”。<sup>②</sup>这样，它实际上具有某种调节、甚至辩解的作用，而对弗洛姆来说，这是理解意识形态的钥匙：“精神分析可以表明人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的愿望、本能欲望、兴趣和需要的产物，它们本身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无意识地找到理性的表达形式——即意识形态形式的。”<sup>③</sup>

## 二、弗洛伊德和荣格之争

在《论文集》中，弗洛姆说明弗洛伊德是可以与“社会批判理论”相结合的唯一心理学家，这首先是因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术范畴由于它们的“动力的特征”是“唯一适用的范畴”；其次，还因为弗洛伊德已经把这些范畴运用于权力问题（这是“社会研究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并且得到了“不少重要的和富有成效的见解”。弗洛伊德的工作经历了几个完全不同的阶段，而对法兰克福学派来说，最有意义的自然主要是1920年代以后这一时期弗洛伊德的理论成果。正是在弗洛伊德研究工作的这一时期，霍克海默尔的同事提出了他们的绝大部分思想并直接采用了大量引文。这是因为1920年是弗洛伊德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引进了死本

---

①、②、③弗洛姆：《分析的社会心理学》，见《精神分析的危机》，第153页、154页、172页。

能这一引起争论的论题，从而为引导到超我这一概念铺平了道路。后一概念对法兰克福学派来说，提供了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的一把钥匙。

与此相反，对于荣格则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利奥·洛温撒尔早在1932年就拒绝荣格的全部观点，特别是他关于种族学说的神秘主义倾向。在以后的年代里，马尔库塞还在《社会研究杂志》上附和这种评价：荣格是“新弗洛伊德修正主义”的“右翼”的样本。这意思就是说，荣格背离了弗洛伊德。他对弗洛伊德的非难正是弗洛姆视为精神分析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成分的优点。和马克思一样，弗洛伊德承认即使人的基本需求也是历史地变化的，反之，荣格则强调欲望和意识两者的非历史性：“从无意识之中可以产生出确定的感应，它不依赖于传统，并以此方式被想象地描述，以此来保证所有个人有某种类似的以至相同的体验。”<sup>①</sup>这不仅根本否定了人和他的社会历史联系之间的辩证的相互作用（在荣格看来，这是“一种外倾的析因法”）而且在与“原始意象”的结合中，引出了关于宗教起源问题的一种唯心主义歪曲；按照荣格的说法，宗教“包括着某种起源神秘的天启知识”，并且直到现在“还以光辉的想象阐发着灵魂的秘密”。

在弗洛伊德看来，宗教是一种在文明发展中产生的“幻想”，是一种“普遍的神经病”，一种“愿望”，一种“迷惑”，一种“大众的迷惑”。自然，这种观点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比如，阿多尔诺在谈到瓦格纳对神话的价值时写道：

<sup>①</sup>荣格：《论原型，对图腾崇拜提供一个特别的证据》，见《荣格全集》第9卷第一部分，伦敦，劳特莱杰和基根·保罗出版社，1953年版，第58页。



“一方面，他的神话学的意图是针对个体心理学的自觉阐述并在其对整体的依赖中去观察表面上似乎独立自存的个体。另一方面，这些神话本身却为退化到原始状态服务，而且还是永恒不变的。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对立实际上已经包含在瓦格纳的著作之中。”<sup>①</sup>

而在马尔库塞看来，荣格的心理学甚至还算不上神话，而是某种“蒙昧主义的伪神话学”。需要的不是对弗洛伊德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倾向作某种修正，而是要真正地了解它。

### 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力量和弱点

弗洛伊德的主要成就是发展了一种批判的方法论和范畴体系，以便阐明经验、反应与“人类本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如弗洛姆在评价分析的心理学时所说的：“它在自然的因素中寻找那使社会过程发生改变的人的本能机制，尽管这种改变的程度是有限的……人的心理始终仍然是一种通过社会过程而变化的心理”。<sup>②</sup>遗憾的是，弗洛伊德自己不是一个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相反，他关于家庭的透彻分析却常常要用一种关于当代社会的心理结构的溯古索原的神话来补充。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弗洛伊德关于谋杀“远古的父亲”的论题。迈克斯纳不太准确地讲述过这个论题，其目的是为了揭露弗洛伊德学说的反历史主义的荒谬性，并以此来

---

<sup>①</sup>阿多尔纳：《关于瓦格纳的断想》，《社会研究杂志》1939年，第8期，第27页

<sup>②</sup>弗洛姆：《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第171页。

维护他关于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不能相容的主张。这一突出的轶事确实是说明弗洛伊德的所有错误的一个例子。然而，弗洛伊德还曾试图为这一论题进行辩护并使其合理化，称它是一个“假设”，一个“有根据的传说”，用来“照亮史前时代的黑暗”；实际上，关于远古的父亲被谋杀的故事是毫无历史根据的。

充其量，这一轶事可以使人们对当时社会内罪的原委有一点认识。然而，不幸的是，弗洛伊德本人曾宣称他对同时代人（或者毋宁说是中产阶级的人）的分析可以看作是对“人”的描述，自然，这里根本不存在对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社会之间的被意识到的区别，更不用说各个阶级自身之间的差别了。和黑格尔一样，弗洛伊德也认为异化是物质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比如在他看来，“绝大多数人只有在贫困的重压下才进行劳动”就是“人类天生厌恶劳动”的证明。<sup>①</sup> 不管怎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对这样一种观点并不断然抛弃它，相反，只要对它加以修改，他就能使它转而成为一种正当的控诉。马克思在谈到亚当·斯密关于劳动是一种牺牲的观点时说：“当然，他是正确的，在奴隶劳动、农奴劳动和雇佣劳动这些历史形式中，劳动总是令人厌恶的，总是一种外部强制的劳动，与此相反，不劳动才是‘自由和幸福’。”<sup>②</sup> 霍克海默尔在其关于哲学人类学的文章中所持的也同样是这种看法。大体上，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考察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时所用的方法。

<sup>①</sup>弗洛伊德：《文明及其弊端》，《弗洛伊德全集》第21卷，第80页。

<sup>②</sup>马克思：《写作提纲：政治经济学批判要点》，第611页。

但是,如果说上文概述的非历史的倾向是可以被克服的,那么,在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中却留下一个主要成分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没有解决的,这就是所谓的“死亡内驱力”。后者自相矛盾地既引出了弗洛伊德的一些最具有社会批判意义的见解,其中就包括关于超我的考察,但同时,把“死的本能”看作是一种原初的永远不变的心理力量的全部论述却暴露出基本上是非历史的和社会地非批判的特点。《社会研究杂志》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拒绝这一弗洛伊德主义的独特论点,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解决曾使弗洛伊德困惑的这一疑难问题。而且,他们当作弗洛伊德思想中最有效的东西所使用的,恰恰是那些从死亡内驱力这一理论中引伸的思想。法兰克福学派既未能改造这些概念,也未能把它们从其不幸地赖以生长起来的元心理学的论题中解放出来。因此,在关键的情况下弗洛伊德学说的各种矛盾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多方面的批判应用中又得到了重现。从而,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熔合起来的问题就只能通过揭发、弄清并解决死亡内驱力这一理论的矛盾才能作出回答。

#### 四、死亡内驱力理论的隐患

以弗洛姆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死亡内驱力理论的拒绝并不否认弗洛伊德关于这一论题的论据是“有意义的”。在考察了“复旧的强迫性”问题之后,弗洛伊德得出结论,人的肉体是注定要老化以至衰退的;所有欲望的目的是“事物的某种古老状态,某种原初状态,生命体总是从这种状态开始自己的历程或变为其它东西,并且循其发展的循环路线



力求回复到这种状态”。<sup>①</sup>对人的心理来说，这就表现为好被动而不好主动，好隐退而不好前进，由此，弗洛伊德作出结论，人的肉体渴望死亡和安宁。

然而，这里就有一个二律背反，“复旧的强迫性”对性的欲望来说具有对立的意义，这种欲望在爱罗斯这一崇高的名称下，现在成为“真正的生命本能”，并且把活生生的人们结合成为越来越大的联合体，因而，它是社会地向前发展的。在这种发展中，早期的关于性欲和自我保存的二元论就被关于死亡内驱力和爱罗斯(爱欲)的二元论所代替。弗洛姆否弃这一点，并且代表社会研究所声明，弗洛伊德“对生命的各种过程和需要的某种适应性”的全部见解所包含的意思就是“人的这些本能是和生物学的死亡原理对立的”。一般认为，弗洛姆之所以批判弗洛伊德1920年以后的著作，是因为“弗洛伊德这时的思想远比他原先的思想更具思辨性和更少经验成分”。<sup>②</sup>

至于霍克海默尔，他所批判的是把一切心理现象都归结为一种“内驱力”的这种倾向，并且认为这种批判对从另一方面来了解弗洛伊德也是适用的。霍克海默尔强调指出，弗洛伊德屈服于这一诱惑：即用关于生和死、善和恶的斗争这种形而上学的术语来解释历史，因而也就使他所使用的一些范畴失去了原有的“辩证的”性质。总的说来，弗洛伊德关于“死亡内驱力”的论断是没有社会批判意义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弗洛姆声明“我们的出发点是弗洛伊德的早期思

<sup>①</sup>弗洛伊德：《超越唯乐原则》，见《弗洛伊德全集》第18卷，第98页。

<sup>②</sup>弗洛姆：《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第151页。

想”。<sup>①</sup> 不管怎样，关于“死亡内驱力”的论题是不能用不理不睬来驳倒的；而且更为麻烦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心理学方面的工作还是以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恰与这一论题具有直接的不解之缘的一些概念为基础的。因此，需要的不是什么对早期的二元论给以特别的偏爱，而是要有根有据地驳倒、或更确切地说修正1920年后的观点。否则，借用弗洛伊德的方法和范畴将会重演并加深他的各种矛盾。

弗洛伊德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控制理论的最重要的批判性的贡献就是他的超我概念。这一概念，不论从逻辑上说还是从发生上说，都是依赖于进攻、施虐狂和受虐狂问题的。这一问题反过来又完全归结于神秘的“死亡内驱力”。这后一论题又促使弗洛伊德去修正关于性欲中有某种“天生的攻击因素”的观念，并开始把进攻性解释成为“一种死的本能，这种本能在自恋（纳西索斯Narcissus）里比多（libido）的影响下被迫远离自我并且必然地只在对客体的关系中显现出来”。

这种进攻性在弗洛伊德的更晚期的著作中具有一种独立存在的“本能”的意味，正如霍克海默尔所指出的，这一点不但表露出一种抽象的文化悲观主义，而且还表露出一种非辩证的、社会制约主义；

“弗洛伊德说明在战争中（以及别的地方）表现出来的残酷，不是主要以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的欲望的变化为根据，也不是把它说成是使人驯顺地忍受苦难的一种强制行

<sup>①</sup>弗洛姆：《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第151页。

<sup>②</sup>弗洛伊德：《超越唯乐原则》，《全集》第18卷，第54页。

为。相反，他倾向于认为‘文明的压抑作用’恰如其对性行为所起的影响一样，是对内在的毁灭欲望的压抑，而不是对全部需求的压抑，后者是大众不管社会有多大的满足能力都必须加以约束的。”<sup>①</sup> 弗洛伊德由于忘记了性爱是“真正的生命本能”，因而落到了这样的境地，在这里他全然不假思索地承认：就性爱而言，“是不愿让新的代替老的地位的。”<sup>②</sup> 这不是说性爱本身会排除为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协作劳动，而是说，如果不使性欲从属于系统的压抑，那么性爱的保守性一旦与人的“天生的进攻本性”相结合，就会造成社会的必然崩溃。

对弗洛伊德来说，控制是社会生活绝对必需的条件，这完全是因为人有破坏的内驱力：

“文明竭尽全力主要为的是给人的进攻本能立下各种界限，并且通过心理反应结构对它们的表现保持控制。因此，今后的事情是要用各种方法去激励人们的自尊心理，并且有目的地禁止某些男女关系，从而达到对性生活的限制。”<sup>③</sup>

实际上，弗洛伊德甚至也怀疑这种抑制是否能永远充分有效，并用这一论据去“驳倒”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学说，即认为随着私有制的废除，社会的敌对状态就会停息。不管人怎么去控制侵犯行为，“这一人类本性的不可泯灭的特点仍是要继续存在的。”这就表明，弗洛伊德的文化悲观主义和社会

---

① 霍克海默尔：《利己主义与自由》，《社会研究杂志》1939年，第5期，第266页。

②、③ 弗洛伊德，《文明及其弊端》，见《全集》第21卷，第108页、112页。



制约主义不是偶然的，而是从“破坏的内驱力”这一学说中逻辑地得出的。而且，必须记住，这种“破坏的内驱力”只是“死亡内驱力”的表现，历史唯物主义者借用弗洛伊德的成果时，必须最终地驳倒后一论点。

## 五、超我与心理控制

弗洛姆在《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评注文章着重指出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对于理解意识形态的意义，这主要指的是关于超我的学说。在弗洛伊德1923年的主要的研究工作中，有一篇题名为《自我与本我》的论文中认为，在自我之内有一种东西，它本身既主动地抑制和反映着无意识活动，同时，它本身又是被抑制的和无意识的。弗洛伊德也觉察出在始终如一的自我和从自我分离的被抑制的东西之间的某种对立。和只注重某种自称为非历史的“集体潜意识”的荣格不同，弗洛伊德一直想使这种“动力潜意识”成为一种社会批判的范畴。弗洛伊德通过找出超我在家庭中的起源来作到这一点；而且，尽管他关于一般家庭所说的一切都是对家长制家庭的尖锐批判，他还是把家长制家庭绝对化为一般的家庭。

弗洛伊德对儿童发育成长的模式描述如下：一个男孩子（弗洛伊德只集中描述了男孩子，因为他的发育模式可以同样用于女孩子身上）把他的父亲看作对手，并发展到把母亲看作自己的性爱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男孩子能够得到的他所需要的关心和肉体接触越来越少。这时，父亲就表现为母亲的柔情的独占者，而这个男孩子也就对这个竞争对手产生怨恨。但是，由于体力上的自卑感，反抗是没有用

的，于是，这种把母亲变为自己的性爱对象的愿望也就破灭了。在这个阶段上，爱罗斯的柔韧性就会表现为：这种原初的心理冲动就以不同的方向，或者达到与母亲的同化，或者强化与父亲的同一。这后者照例是恋母情结的结果，并且是了解超我的关键，正是这种超我通过不断地反映父母的影响而使“那些起源不明的因素的存在永久不衰”。<sup>①</sup>

弗洛伊德就是用这一理论来否定“乱伦的本性”这一概念的，并以现代家庭中的具体经验来证明后者的适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这些由一定个体组成的群体——现代家庭，其中所有成员都经历着类似的恋母情结的冲突，能够很容易地“用同一个目的去代替各自的自我理想”。至于社会对性欲冲动的有效控制，不过是如上所说的同化作用的结果。然而，这里最重要的还是（正如在消除恋母情结的处境中一样）自我理想或超我恰能存在于这样的人或群体身上，他们最受别人憎恨并能以牙还牙；这样，尽管存在着无可非议的不满，“被统治阶级还是能够在感情上依附于他们的统治者。”这就是弗洛伊德对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贡献。

对弗洛伊德的超我学说的疑问在于它直接地为死亡内驱力的论点所决定。尽管弗洛伊德在谈到超我的起源时把它看作是对第一个性爱对象的里比多的升华，<sup>②</sup>但是，死亡内驱力的盛衰变化在使这种压抑状态永久化中仍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超我的强化过程有如下述，

“他的进攻性反诸内心，并内在化；实际上，它是退回到

---

①、②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见《全集》第19卷，第35页，45—46页。

它所从出的地方，这也就是说，它被引导到他自己的自我。在这里，它被接纳为自我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作为超我把自己置于自我的其余部分之上并与其对立，这时，它就以‘良心’的形式随时准备调动一种同样尖厉的进攻性来反抗自我，以使自我能甘心于适应自身以外的其他个人。”<sup>①</sup>

只要这种进攻性还被看作是某种不可减弱的“死亡内驱力”的表现，那么，弗洛伊德关于意识会越出一定的思想体系轨道的洞见就不得不补充上对这一过程的不加鉴别的防范，这也就是说，压抑和控制是人类社会绝对必需的条件。任何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要运用超我学说，都必须毫不含糊地使它摆脱对死亡内驱力的依赖关系。

弗洛伊德本人从来就不满意关于死亡内驱力的假说；他一直未能象对爱罗斯（里比多）所作的那样，找到死亡内驱力的能力来源。因此，不出所料，弗洛伊德在谈到爱和憎、温柔和好斗的对立时写道：“我们要是能作到把这两种对立相互联系起来并从一种对立中导出另一种对立来那该多好。”<sup>②</sup>弗洛伊德自己从未达成这样的归化。弗洛姆也没有作到这一点，他只是简单地否弃了这一问题，并且回到了弗洛伊德出于健全的理智而不得不抛掉的早期观点上。不过，这种归化的轮廓却被弗洛伊德的另一个马克思主义批判者完成了，这个人就是威廉·赖希。

赖希从未使用过有关“死亡内驱力”的任何概念。实际上，甚至在他使用“破坏的内驱力”时，也是含有对弗洛伊

---

①弗洛伊德：《文明及其弊端》，见《全集》第21卷，第123页。

②弗洛伊德：《超越唯乐原则》，见《全集》第18卷，第53页。



德的批判意味的；赖希不把这种现象解释为什么“死亡内驱力”的表现，而把它看作是异化和同化所必需的一种生物学过程。至于说到这种欲望的不合理的表现，那么，它是某种“文明的产物”；“人的破坏的内驱力之特出之处，首先在于它的结果不是生物学上所必需的。这样看来，它确实是与许多得不到性欲满足的动物的疯狂性一致的。”<sup>①</sup>在这一点上，早在1927年，赖希就把不合理的进攻看作是对某种恶劣环境的应答，而不是什么固有的内驱力。显然，这种“破坏的内驱力”在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被化归为性爱。赖希的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突破是在1933年，即弗洛姆在《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他的纲领性论文的第二年。但是，早在这以前，赖希对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的严肃认真的再考察就使他走上了这样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不但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重要的先驱者，而且明显地优越于他们。

## 六、法兰克福学派和威廉·赖希

弗洛姆对赖希1932年的著作的评价令人迷惑不解。一方面，赖希既“对性道德的社会制约性和社会职能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他也就对社会心理学作出了一些“杰出的实验证明”。<sup>②</sup>然而，弗洛姆却不承认赖希关于性道德的研究对驳倒“死亡内驱力”学说的深远意义。而且，另一方面，对赖希的评价又主要是否定的；弗洛姆在集中谈到方法论的

<sup>①</sup>赖希：《生物的功能：关于性行为的精神病理学和社会学》，阿姆斯特丹，托马斯—芒特出版社1965年版，第162页。

<sup>②</sup>弗洛姆：《分析的社会心理学》，见《精神分析学的危机》，第155页。

意义时表明，社会研究所认为这一方法是错误的，因为“它正如赖希所作的那样，把精神分析只限制在个体心理学的领域，并且硬要反对把它应用于社会现象（政治、阶级意识等等）”。尽管弗洛姆又补充说：“在他最近的著作中，看来赖希已使这一观点变得真正富有意义了。”<sup>①</sup>然而，事实是弗洛姆任何时候都没有能够充分地理解赖希的方法。

弗洛姆的旁征博引所涉及的赖希原来的观点就是如下的观点：

“精神分析的实际对象是社会的人的心理生活。民众之受到注意，只是在他们中出现了特出的发自个体的现象（比如关于领袖人物的问题）的情况下，并且也仅限于这样的程度：即‘大众心理’——忧虑、恐惧、恭顺等等的各种性格能够被我们用个体的知识加以说明的时候；如此看来，象阶级意识这种现象恐怕不能用精神分析去对待，而一些社会学的问题（群众运动、政治活动等）就不能成为精神分析方法的对象。”<sup>②</sup>

因此，对赖希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心理学谈不上对阶级意识的起源和本性会有什么明确的认识，它顶多只能说明还没有形成阶级意识的情况。大概，弗洛姆是想表明精神分析能够说明阶级意识的现实存在的。他是否能够成功，我们还得拭目以待。

---

①弗洛姆：《分析的社会心理学》，见《精神分析学的危机》，第155页。

②弗洛姆：《分析的社会心理学》，见《精神分析学的危机》，第155页。

不过，姑且不说别的，弗洛姆的总的批判看来显然是错误的。第一，赖希并没有打算把“精神分析局限于个体心理学的领域”，而是相反，他自始至终都把“社会的人”看作精神分析的对象。第二，对“大众心理”这一概念的争辩和嘲讽性的反驳，明显地是对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的有意的背弃。第三，赖希的把“发自个体的现象”有条件地扩展到各种社会现象的方法是霍克海默尔在其《历史 and 心理学》这篇论文中所采纳的方法，即使弗洛姆本人也在他的《论自卑感》一文中应用过这一方法。

事实表明，弗洛姆自己也只是试图对民众的消极表现中的一种、即自卑感给出一种社会地定向的分析。他对阶级意识的正面的出现和作用从未提供任何有意义的阐释。与此相反，赖希却正是在这一点上发展了他的学说。而且，他之所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积极地参加了意识形态斗争。在1934年，赖希写道，阶级意识“表现在任何角落并渗入到日常生活之中”。①他并没有因此而把阶级意识降低为无产阶级的主观状态，这个阶级一直需要政治先锋队坚定的思想领导。但是，赖希着重指出，群众的阶级意识因素存在于“对本阶级的需要之普遍自觉”之中；存在于“使他们满足的方法和可能性的自觉”之中；并且存在于“对建立在生产工具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在他们的生活道路上所设置的种种障碍的自觉认识”之中。这些“具体的因素，”如果都能具备、得到启蒙并结合到一起，就会形成一种革命的意识。这样，赖希

---

①、②赖希：《什么是阶级意识？》，伦敦，社会主义者复兴出版社1973年版，第35页，68—69页。



关于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心理学的描述就包含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组织 and 领导的一个观点。还要看一看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对赖希这一阶段的工作有何反应。

## 七、社会研究所对权威的分析

霍克海默尔关于《权威和家庭研究论文集》的“总论”引进了一个和“社会批判理论”意义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生产过程不仅在直接的和当代的形式中影响着人们，这种形式是他们自己在劳动中不期而遇并处于其中的；而且，还在它所造成的相对稳定、缓慢变化的机构，如家庭、学校、教会和艺术这样一些形式中影响着人们。”<sup>①</sup>

就第一种形式来说，我们已经看到（见第二章和第三章），使其受当时社会制约的具体的经济机制并未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充分的分析。《论文集》中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也是零碎不全的，因而没有为霍克海默尔、弗洛姆和马尔库塞所进行的上层建筑分析提供什么满意的经济学的支持。不过，后者在对控制的分析上还是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现在，这一贡献的价值，它的最终的适用范围，必须得到确认。

霍克海默尔在《论文集》的序言中提出了一个可被看作纲领的明确的区分：“权威主义者”所指的是权威的尊奉者，也就是作为权力的对象而被支配的一方；有权力的指的是权力的需要者，亦即权力的主体、支配者一方。就事实而论，这种区分在《论文集》中并没有得到他们自己的严格遵守。这一点并不表明他们的疏忽，而是证明在当代社会内部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总论部分》，见《权威与家庭问题研究》第9页。

权威主义的型式是无所不在并且极其复杂的。最根本的权威就是资本；经济条件本身就是“有权威的”。这样，权威主义的体验就支配着一切人和一切阶级的生活，在这意义上他们就是社会决定作用的对象，而不是它的主体。霍克海默尔及其伙伴们由此就可以谈论“权威主义状态”，并在这种背景中谈论父母的权威主义的干涉。

在揭露这一权威主义社会的中介关系网上，“社会批判理论”超出了弗洛伊德的视野，弗洛伊德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儿童在其父母手下的处境，却忽视了父亲在社会经济领域仍然有权威体验存在。而这一点，在劳动力“自由”买卖的条件下，对于雇佣劳动者阶级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他们被迫签订的契约对缔约双方来说并不是一视同仁的。”因此，要最终地消除权威主义者的统治不是一个“个人解放”的问题，而是一个革命的问题。这是重申了《资本论》的观点。

法兰克福学派的革命思想，尽管还缺乏具体性，却说明了小资产阶级的反叛和真正的革命之间在心理上的差别。尽管法兰克福学派从未受过任何一种政党的约束（阿多尔诺认为卢卡奇是知识分子屈从于党的组织而误入歧途的典型）。但是，霍克海默尔的一班人还是赞成革命纪律的理论原则；马尔库塞曾写道：“在自己队伍内部的革命的从属关系以及对阶级敌人的革命权威，在为实现未来社会制度而进行的斗争中，是必要的条件。”<sup>①</sup>霍克海默尔也象列宁一样着重指出，无政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产物，他们不去戳穿关于个

---

<sup>①</sup>马尔库塞：《对权威的研究》，见《批判哲学研究文集》，布雷斯英译，伦敦，国立盲人图书出版社1972年版，第136页。

人自由的空想，而是把它发展到荒谬的极端。弗洛姆也支持这一点，他的证据是“造反”者所感受到的是社会压迫的程度，但却不能发觉这种压迫的真正本质，因此，他在反对一切权威而遭到幻灭时，往往会通过转向法西斯主义以求助于权威主义独裁，而“革命”者却相反，必须消灭阶级社会的盲目的经济权力，并且在社会政治领域实现他在与其他人的相互关系中早就想达到的东西，具体说就是结束权威主义性质的构成形式。不管怎样，法兰克福学派也感到革命的理论 and 战略是决定于社会制度和人们之间的关系的，就此范围来说，它是不能等同于盲目的经济权威的所有中介物的。由此，社会研究所的分析就试图通过探索家庭内部的权威主义来矫正这种不平衡。

#### 八、社会研究所对家庭的分析以及家庭的辩证法

在家长制家庭中权威主义的主动人物显然是父亲。弗洛伊德把这看作是父亲在体力和智力上的优越性的“自然的”结果，在弗洛伊德看来，任何社会就此来说都是可以用家族的观点来考察的。霍克海默尔指出，父亲之所以成为一家之主，乃是因为他通常是雇佣劳动者。至于说到父亲何以必需处于支配地位，霍克海默尔则强调父亲在劳动过程中最直接地体验了资本的权威这一点。霍克海默尔对这一权威在家庭生活中的影响的描述是克拉考尔的“骑自行车”比喻（见第一章）的继续。

然而，如果父亲的权威是建立在他们的工资的基础上的，那么，这种权威就必然要受劳动力市场的一切变化的支配。法兰克福学派指出的第一个矛盾就是青少年也有挣得工资的



能力。社会研究所进行的调查表明：青少年，特别是男孩子们已经“更加不愿受父母的权威的约束了”，并且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必须认真对待的经济力量”。无疑的，这种新产生的权威在失业时期难免遭到经济上的削弱，不过，这同样的情况也是适用于父亲自己的。这就是在《论文集》中讲到的第二个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连得到有益的职业都不能保证的时候，社会还在反复宣扬“劳动和纪律”的重要性；霍克海默尔在谈到这样的父亲时说：“如果他不再挣钱，或者只剩下最后一点点财产、金钱，他也会因此而丧失他的社会地位，并且这也就威胁着他在家庭中的威信。于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一规律也就使他身遭其害。”正如调查表所表明的，即使有失业救济和社会保证金，也不能完全补偿正常的权威结构所受到的破坏。

不过，法兰克福学派对家庭的分解所持的看法是辩证的，并且不无悲哀的情调。尽管他们对“现代家庭”对于劳苦大众究竟有什么真正的深远意义这一点不抱任何幻想（马尔库塞还引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状况和娼妓现象的可怕的描绘），然而，霍克海默尔一伙依然认为家庭不只是一个栖居之处，它不只是进一步分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事实上，如果从范围的大小来看，家庭是一个不能再分的单位；在这里，一个人才能够不仅仅是一种“机能”，而是人。尽管权威的格局要在家庭生活中继续下去，并且天伦之乐也受到了贬损（正如《论文集》所表明的那样），家庭还是被看作不只是这些东西。法兰克福学派惋惜的是家庭受到

---

①霍克海默尔：《总论部分》，见《权威与家庭问题研究》第71页。

了舆论、社会操纵和法西斯主义的破坏。关于这一点在阿多尔诺的《极度低落的道德》中有最尖刻的表达：“正在兴起的集体主义制度是对一种所谓无阶级社会的嘲弄。它在肃清资产阶级个人时，也就清算了这样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曾一度得到母爱的支持。”<sup>①</sup>家庭并不是正在被扬弃，而是正在被消灭。按照他们一般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惯例，法兰克福学派赶忙作出结论：至少要保留家庭的理想。

但是，对家庭作出辩证的评价是这种悲观论调不能胜任的；霍克海默尔实际上看出了从家长制家庭的空壳中产生的一种新的建设性力量。

“在家庭的最初的利害关系已经大大削弱的基础上，这种力量也许可以产生一种关于共同体的同一感情，以超出家庭范围的人们之间的友爱精神把他们团结起来……儿童们将不再作为将来的继承人而得到培养，并且人们也不再用‘我的’这种私有观念来对待他们。劳动也是一样，如果大家都能从事劳动，它就不再只是他们谋生的一种手段，从而也就会促进他们去实现为他们自己、他们的孩子以及别的人们而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一历史任务。”<sup>②</sup>

这个世界看来是阶级意识和革命实践的某种结合。实际上，霍克海默尔收入《论文集》的稿子是以“文化中的激进方面正在战胜保守成分”这种热情而鼓舞人心的调子作结束的。

---

①阿多尔诺：《极度低落的道德》，第23页。

②、③霍克海默尔：《总论部分》见《权威与家庭问题研究》第72页、76页。

## 九、对“死亡内驱力”的驳斥

霍克海默尔关于解放的预想与意识形态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毫不沾边，反而停留在抽象的自发性学说上。这一缺陷将在下文加以论述。但在这之前，有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冒了出来：究竟霍克海默尔是以什么理论为根据而相信解放是完全可能的呢？当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可以把自己的信念建立在这样一种社会预见之上，在这种社会中，对生产资料的支配真正充分地社会化了。但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怎么能和这一预想一致呢？毕竟，弗洛伊德所应用的是死亡内驱力学说，在这之上建立起了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并用它来为压抑的社会辩护以驳斥关于无阶级社会的学说。

对弗洛伊德的文化悲观主义和社会驯服主义简单地置之不理，这是不够的；因为精神分析学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析是与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比如，霍克海默尔在否认任何“屈从的内驱力”的首要地位并使它去代替权威主义的家庭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他还正确地认为，这种屈从性会导致一种能在别的方面成为进攻性的力量。“在家庭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坏的意识得到数不清的刺激，这些刺激能以另外的方式指导他们去反对造成个人失意的各种社会条件。”<sup>①</sup>当然，谁都可以象弗洛姆和霍克海默尔一样断言，这些“刺激”并不以任何“死亡内驱力”为先决条件，但是，事实仍然是弗洛伊德只能求助于这一悲观主义的论点来恰当地解释超我。另外，正如弗洛姆所承认的，关于“死亡内驱力”的假定是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总论部分》见《权威与家庭问题研究》第59页。



建立在一个“有意义的”论据之上的。

需要的是要对“死亡内驱力”进行系统的批判，并把它的所有似乎真实的表现归结为一种能够容许并积极要求解放的精神力量。这也就是赖希在考察弗洛伊德时所运用的方法。赖希开始于1920年代的元批判，首先重新审查了性爱这一概念。早在马尔库塞关于“压抑的”和“非压抑的”升华这种划分提出之前，赖希就强调指出，“真正的”升华不仅不以压抑为基础，而且，实际上是受压抑排斥的：“升华的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是各自不同的内驱力不受来自压抑的刻板作用的影响，这种压抑不仅阻止直接的满足，而且阻止着所有发自内驱力的建设性活力。”<sup>①</sup> 压抑把继续存在的直接的性欲冲动转变为某种违反人意的神经质的病态，从而导致完全的堕落和通常被看作“性自由”的各种行为，甚至使性行为变为反社会的行动。

对弗洛伊德的二难推理的唯一回答就是坚持关于性爱的进步解释，只有这种性爱才使真正的升华成为可能。因此，赖希要求确认“劳动和恋爱的能力”。<sup>②</sup> 与此相反，弗洛姆在拒绝接受死亡内驱力的论点时，却重新回到性本能和自我本能的更早的极端观点上去了。因而，性爱不是某种不受压抑的社会的基础；正相反，对它的某种控制看来是社会所需要的。另外，对于性欲的满足是由什么来组成的问题，弗洛姆也抱着非批判的态度，他说：“尽管性欲往往可以通过纯粹的幻想得到满足，以自我保存为目的的各种欲望还是必须用现实的、具体的手段去满足它们。”他又说：“这里所指的不

---

①、②赖希：《生物的功能》，第187页，192页。

仅是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而且还指最低限度的精神生活；并且，各种性本能也必须得到最低限度的满足。”<sup>①</sup>然而，这里既没有指明这个最低限度的具体范围，也没有说明不受压抑的满足的种类。

不管怎么说，要最终地解决弗洛伊德元心理学的内在矛盾就不仅要求对性爱作出肯定的评价，而且还要求彻底抛弃关于死亡内驱力的论点。这是由赖希于1933年在《人格分析》中完成的。总的来看，这本著作完全重申了精神分析学关于受虐狂、复旧的强迫性以及快乐原则的学说。复旧的强迫性现象之所以引起对某种死亡内驱力的假定，是因为这种强迫性看来是“超越唯乐原则”而起作用的。因而，赖希就根据他自己关于性行为和压抑的理论重新审查这种复旧的强迫性。他把恐惧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实在的恐惧”（Realangst），这是对某种真正的威胁的正常反应，并且，它或者引起退却，或者引起依胜利的前景而定的进攻；一种是“记忆的恐惧”（Stauungsangst），这是一种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持久的、动力学的状态，这种人的内心包藏着某种可能以另外的方式转化为一种合理进攻的东西，并把这种进攻对准他自身。这一点是理解受虐狂的钥匙。

当复旧冲动在快乐原则之内起作用时不存在“死亡内驱力”的问题。因而，赖希所极力反对的是把这一解释运用到这样的场合：在这里强迫似乎是超越唯乐原则而起作用的。这实质上就是受虐狂现象，对此，弗洛伊德作了如下的概述：

“我所要做的是辨认出一种原始的或色情的受虐狂，由

<sup>①</sup>弗洛姆：《分析的社会心理学》，见《精神分析学的危机》，第153—154页。

此又有两种后继的形式，女性的和道德的受虐狂发展起来。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受体的施虐狂反转过来指向主体自身并从而产生第二性的受虐狂，它们是原始受虐狂的附加物。”<sup>①</sup>

但是，事实上，弗洛伊德实际做到的只是观察了“第二性”受虐狂的某些表现，而且由于他不加批判地承认对性欲加以压抑的“必要性”，因而虚构一个“原始的”受虐狂，以使这种受虐狂有一个还原之所，并以此作为理论上的权宜之计。不仅如此，弗洛伊德还实际上曲解了受虐狂。

赖希则抓住“死亡内驱力”的最极端的表現，即自杀，并且把它归属于一种被扭曲变型的性本能，这种性本能已被导至某种不能忍受的“记忆恐惧”。一个活着的人之所以自杀，既不是因为他“想自杀”，也不是因为他受什么“生理因素的推动”，而仅仅是因为社会的现实所产生的“一些压力变得如此沉重，以至于只能用自我毁灭才能得到解脱。”<sup>②</sup>受虐狂的不太激烈的形式展现出同一的原则：它们并不是什么“原始的受虐狂”或“死亡内驱力”的一种恢复正常形式，而是一种和性欲同一起源的紧张心理的反常释放。事实上，弗洛伊德关于作为“痛苦中的快乐”的受虐狂的全部解释是不正确的；受虐狂只不过是神经官能症患者当作免除“记忆恐惧”的手段而采取的对痛苦的忍耐。<sup>③</sup>不会有“超越唯乐原则”的受虐狂。

“就复旧的强迫性的含义来讲，首先是每一内驱力都为

---

①弗洛伊德：《关于性欲学说的三篇论文》，《弗洛伊德全集》第7卷，第158页。

②、③赖希：《赋予特征性的分析》，第286页、239—241页。



求确立某种安宁和平静的状态；其次，这种强迫为的是使人不断重新体验类如快乐这样一些已经体验过的状态，对于这种复旧的强迫性概念是不会有有什么异议的……但是，就是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复旧的强迫性仍然是在快乐原则的框架之内。实际上，正是快乐原则本身才能说明强迫何以能重复发生。”<sup>①</sup>

这样，“死亡内驱力”的整个基础也就崩溃了，同时，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的根本矛盾也得到了解决。

在他稍后的一部重要著作《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中，赖希对《人格分析》中关于政治上软弱无能问题的分析结果加以发挥：

“道德的压抑约束着儿童的自然性欲，当其对生殖的性欲的严格限制达到极点时，就产生出一种忧郁的、胆怯的、虔诚的、恭顺的、并且从庸人的观点来看是‘善良’的和易受教育的人。从此以后，一切进攻的冲动就被极度的恐惧所扼杀，从而也就使人丧失他内在的反叛力量。类似地，关于洗脑的压抑性戒律对主动的思想和批判主义也造成普遍的窒息。”<sup>②</sup>

赖希清楚地表明，精神分析学的“死亡内驱力”的论点，可以在不放弃超我的批判概念的条件下被推翻。实际上，超我的概念也只有通过系统地驳倒“死亡内驱力”才能显出它的全部批判价值。

相比之下，弗洛姆的立场就软弱无力得多，他从来没有

<sup>①</sup>赖希：《赋予特征性的分析》，第241页。

<sup>②</sup>赖希：《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政治反动的性欲经济和无产阶级的性欲政治》哥本哈根社会政治出版社1934年第二版，第50页。

使超我摆脱它与弗洛伊德的悲观主义元心理学的纠缠。从某一方面来看，弗洛姆实际上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关于受虐狂的经济学问题》的观点，并把它看作有关受虐狂问题的权威著作。这是令人感到吃惊的，因为弗洛伊德正是在这本著作中，在明确地根据“原始的”受虐狂的盛衰变化来说明超我的时候，建立了他的“死亡内驱力”假说的全部学说的。（甚至在弗洛姆晚些时候将《论文集》作为权威性版本详加叙述时，他也只是使一个没有解决的矛盾依然如故。）弗洛姆承认赖希在受虐狂问题上有所发展，特别是赖希证明了任何超越唯乐原则的谬误。但是，弗洛姆未能看到，或者至少是不承认，赖希从而也就推翻了“死亡内驱力”。弗洛姆不赞成赖希把这种“内驱力”归结为性爱，反而竟然宣称赖希关于受虐狂著作的丰富内容“由于他通常对性因素的生理方面看得太重而受到严重的损害”。显然，弗洛姆对赖希的学说一点也没有理解。

#### 十、期望的心理学的实践的困惑

法兰克福学派在他们利用弗洛伊德的著作时，也未能遵守他们自己的要求，即系统揭露和清除同时代的理论家们另外的一些批判著作中所存在的思想上的曲解。而且，霍克海默尔一班人在他们对弗洛伊德的讨论中也没能实践他们的另一个方法论原则，即使诸如尼采、柏格森和弗洛伊德这样一些人的批判的研究将会在一种新的理论形式中成为实际的批判运动的构成部分。法兰克福学派设想把权威主义的矛盾提高到“良心矛盾”的程度，以使意识“不仅显露出它的解放力量，而且显露出它的激励的、训导的以及强烈的实践力

量”，从而使批判的知识界与之“相联结”的那种“斗争”“尖锐化”，以求得至少能与这一时期的社会研究所的《宣言》相适应。但是他们究竟做得怎样呢？事实上，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得到回答。

《社会研究杂志》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不仅缺乏同具体实践的任何联系，而且对意识形态斗争甚至连反权威主义的斗争都缺乏任何认识。这不能归因于德国革命形势客观上处于低潮，而是和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一样（参看第三章），暴露出法兰克福学派甚至还未能提出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霍克海默尔在《论文集》中所写的那一篇文章以一种热情的但却是忏悔式的语调结尾的原因。有组织的革命实践活动被看作是自发的，因而，革命意识的形成也未能按照群众意识形态斗争的议题加以讨论。弗洛姆在他对赖希著作的评论中默认历史唯物主义心理学能够阐明阶级意识的形成。然而，社会研究所从未把这一诺言付诸实现。

就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政治组织的全部想法来看，似乎给知识分子先驱者留下某种地位：比如说“世界历史的变化”（或者各种革命！）通常都是由这样一些团体所促成的，“这些团体摆脱了根深蒂固的心理模式，并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认识（Erkenntnis）的基础上。”<sup>①</sup>这些团体并不是按他们的社会政治特点来划分的；实际上，他们之所以成为带头人，看来是由于他们有幸受到反权威主义的教育而具有的美德。但是，霍克海默尔根本不顾这一缺陷，试图作到从

---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总论部分》，见《权威与家庭问题研究》第21页。



“认识”直接到政治领导的理论上的过渡，他在谈到这种过渡的契机时说：

“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在经济上的没落使相应的文化生活形式放纵到如此程度，以致社会大多数人的苦难很容易地引起造反，并且，他只需要进步集团有果敢的意志去战胜现在已经纯粹成为整个制度的全部支柱的武装力量。”<sup>①</sup>

对社会研究所来说，各种权力结构的“辩证法”是可以被“社会批判理论”当作某种能够随机变为革命的东西而简单登记入册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心理学理论在结构上是不适应当前任何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的。对反权威主义斗争的理论和战略，也没有作出任何指示。

赖希的见解是有重大区别的；尽管“只有社会的经济能够为智力和性欲的自由发展提供基础”，精神分析仍然能够并且必须“作为社会教育的一个心理学基础”而在儿童教育范围内起一种革命作用。在《性成熟》、《禁欲和婚姻道德的压制作用》中，赖希概述了性行为的根本方针，人们既可以在德国共产党的保护下积极地去追求它，同时，又必须有“实现某种自觉的社会目标的性政策”（Zielbewusste Sexualpolitik），赖希实际上非难德国共产党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反权威主义教育的革命意义。党的领导盲目崇拜“政治”，并且只限于为揭露希特勒这一最反动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而斗争。他们不积极联系群众的“微不足道的、平庸的、纯朴的、简单的日常生活”，而只有这种联系才能“把

---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总论部分》，见《权威与家庭问题研究》第14—15页。

客观的社会过程与人们的主观意识统一起来”。赖希强调指出，只注意到社会经济总体中的矛盾是不够的；这些矛盾还必须得到充分的利用。只有经济命运的一致和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产生出统一的革命行动。

在魏玛德国最后年代阶级斗争处于决定性的命运攸关时期，赖希的这一著作起了积极的作用；对比之下，法兰克福学派却不希望改变世界，而只限于说明世界。这种说明即使是辩证的，也没有为反权威主义战略提出任何思想，甚至连这一战略本身的必要性都未能受到重视。尽管社会研究所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和抽象进化论断绝了关系，并且看重阶级斗争的作用，法兰克福学派的心理学理论并没有为这一斗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任何有实践意义的思想。马尔库塞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的工作可算是一个例外，这一点将在下文进行讨论。

### 十一、心理学的绝对化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心理学理论中缺少具体的实践，这不只是一种疏忽，而事实上是整个“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结论。实践的唯物主义方面只有用这样的理论才能把握，这种理论直接与霍克海默尔笼统地看作历史动力的阶级斗争相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是以建立在经济学之上的阶级分析为先决条件的，这种分析是法兰克福学派从未提出过的，尽管他们一再批评弗洛伊德没有根据阶级的群体来区分自己的范畴。

然而，在缺乏一种深刻的经济理论的情况下，心理学的作用就会被歪曲。不同的是，霍克海默尔把它看作是解释历

史的一种“辅助科学”，形成这一科学的一些范畴实质上是经济范畴。至于阿多尔诺，则完全正确地强调，求助于心理学不是没有危险的；他在谈到马克思时写道：

“后者没有某种‘浅薄的心理学’。他根本没有心理学，因为他有可靠的理论的理性。在马克思看来，世界是受价值规律支配的，而不是受人们的精神支配的。现在，人们仍然是社会过程的实体或成员。用关于这个世界的牺牲者的心理学方法来说明世界，就已经预先设定了某种离开基础和客观过程的抽象，而人们正是这种客观过程的主体。”<sup>①</sup>

当法兰克福学派远远超过任何粗俗的心理主义的时候，由于缺乏经济理论，他们对心理学的运用确实倾向于阿多尔诺上面所指出的“抽象”。

最后，法兰克福学派没有弄清楚的恰恰是心理学怎么能够揭露控制的真相这一点。对于魏玛德国统一阵线的失败它能披露出一点什么东西呢？对于法西斯主义它又能有何揭露呢？唯一的回答是历史唯物主义心理学能够有助于说明小资产阶级投向法西斯主义的心理面貌。在这一点上，霍克海默尔正确地宣布，社会研究所将把注意力集中在分析白领工人上（见第一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学的探讨本身摆脱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总的宗旨，而且，对所谓“中间阶级”的研究也作为某种“思想模式”扩展到了城市无产阶级。因此，霍克海默尔在1933年，即希特勒被委任为总理的那一年写道，无产阶级也显出“资产阶级的性格”；同时，

---

①阿多尔诺：《韦布林对文化的攻击》，见《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杂志，1941年第9期，第409—410页。



他在谈到这一点时所用的基本上是心理学的术语。

这一简单化的、并且直至今天仍然不切实际的关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Verbürgerlichung)的论点还在妨碍着一切真正的阶级分析。特别是它模糊了对经济的控制进行分析的理论上的必要性。这种分析是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瑟尔曾经进行过的，而且是不能用“社会批判理论”的方法和范畴来完成的。马丁·杰伊在社会研究所关于权威问题的第一部论文集中的一章中写道：“但愿批判理论被应用于解决当代最迫切的问题，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这一问题。”<sup>①</sup>不幸的是，关于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所包括的方面远远不止《社会研究杂志》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所考察的那些东西。人们决不会忘记，在魏玛德国恐怖统治之前的最后一次选举中（1932年11月），两个工人阶级政党“联合阵线”所得的选票大大多于纳粹的选票。显然，任何以杜撰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论据来说明法西斯主义之兴起的尝试，都是一种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加以折衷的混合物。

## 十二、在马尔库塞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中心理学的 作用

马尔库塞最近曾泄露，在本世纪30年代他和霍克海默尔的许多分歧之一就是社会研究所的研究“过分心理学化”。因而，看一看马尔库塞自己从本世纪60年代起在他的激进学说中使用的心理学概念与他的同事们在《社会研究杂志》时期使用的心理学概念究竟如何不同，倒是很有意思的。这

<sup>①</sup>杰伊：《辩证法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和1923—1950年的社会研究所》，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73年版，第116页。

无需详尽分析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整个元心理学的重新考察，只要谈一谈这样一点就足够了，这就是：和弗洛姆的著作大不相同，《爱欲和文明》承认既需要恰如其分地对待弗洛伊德1920年后的著作，又需要使性爱摆脱弗洛伊德的在思想上有局限性的理论水平。尽管马尔库塞曾为“死亡内驱力”辩护（反对“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修正主义”），这一论点还是被系统地、从弗洛伊德基本的悲观主义思想中解脱出来了。

不过，在马尔库塞新近的著作中，和社会研究所初期比较，心理学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爱欲和文明两者都既是一种主张，又是一种幻想。在本世纪60年代，马尔库塞的理论活动响应一种实际运动，即大学生们的反权威主义运动，这一运动要求彻底解放，并要求为这一解放而试验性地制定一种理论和战略。当霍克海默尔转向反动，抛弃了自己早期的观点并实际上支持教皇关于天赋容忍的圣谕时，马尔库塞本人与这一新运动结盟，并从中为“社会批判理论”吸取新的灵感。

面对垄断资本主义和大批工人阶级政党的蜕化变质与官僚主义化，马尔库塞肯定了自我斗争以及同盟者之间进行斗争的重要性；这也就是被广为误解的“生物学的”革命的含义：

“但是，当关于发达的工业社会具有解放的潜力这种幻想受到统治者及其受益者们的压制（和憎恨）的时候，它就要激发起一种激进的反抗，并给这种反抗赋予一种不可思议的异端的性质。以往各个历史阶段上的每一次各不相同的革命，都是一次反抗，它反对的是整个机构严密的、繁荣的

社会，是对它的形式、人和事的商品形式的抗议，也是对虚伪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欺骗的抗议。”<sup>①</sup>

不过，马尔库塞是一个批判的同盟者，他的意图是不断推进这一新运动。因此，他主张这一运动必须从反权威主义转变到所谓“组织状态”。尽管如前所述（见第三章），马尔库塞的立场倾向于工联主义的自发论，但他还是能够对初期阶段所遗留下来的东西作出某种尖锐的批评。反权威主义运动必须从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泥坑中拯救出来：“个人的解放意味着超越资产阶级的个性”，它以“社会的解放”为先决条件。而社会的解放又是以革命的组织为先决条件的。

与《论文集》关于群众必须由“摆脱了根深蒂固的心理习惯并把自己的行动建立在认识的基础上的人们的集团”来领导这种说法相反，马尔库塞一反法兰克福学派把任何一种“纯粹的”知识实体化的倾向；他提出批判的知识是那种关于个人本身被社会变为畸形的知识。

“年轻的德国激进派有这样一句惯用的话，我们（激进主义者）每一个人都是被现存社会的各种矛盾这样那样地困扰、愚弄、腐蚀、扭曲了的。因为只有革命本身的力量才能解决这些矛盾，所以他们才肩负起这一运动的责任；然而要理解这些矛盾，就得参与战略的发展工作。”<sup>②</sup>

这样，马尔库塞的理论不仅是对反权威主义运动的反应，而且是超越于这一运动的一种理论上和战略上的发展。

---

<sup>①</sup>马尔库塞：《论解放》，1969年初版，哈门兹沃斯企鹅出版社1972年再版，第56—57页。

<sup>②</sup>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伦敦，艾伦莱恩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



总之，不管对马尔库塞的政治作用怎样才能作出准确的评价，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就是他本世纪60年代以来的著作标志着他超越了《社会研究杂志》时期的社会研究所和他先前的同道者们，把“社会批判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

### 十三、控制：从心理学到“文化生产”的过渡

回顾一下本世纪30年代，可以说，与马尔库塞晚期的著作（一种要求解放的运动的理论表达）相反，社会研究所在《社会研究杂志》时期的一些心理学论文却基本上是关于控制的理论。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延伸部分所产生的种种曲解都已经略述如上。不管怎样，即使在本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关于控制的分析也经历了一次变革，弗洛伊德主义心理学的作用得到了承认。从表面上来看，这既与《论文集》的仓促出版这一事实有关，又与弗洛姆在相互怨恨的气氛中离开社会研究所有关，弗洛姆离开的原因一直是不十分清楚的。然而，不论怎么说，这一变化的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对象的改变。

在美国，法兰克福学派所面临的是一种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同样发达的虽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但仍受控制的大众文化网。他们不再把家庭看作是适应社会过程的决定性力量；相反，他们看到了家庭的分解，从而也看出了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模式的意义之严重的局限性。心理学的成分整个说来逐渐地被归入一种更为广泛的对大众文化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社会政治分析之中。关于“文化生产”的概念将在第五章详细地讨论。在这里，只需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注意力已从家庭分析转到对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的更

复杂的研究就足够了。马尔库塞的《单面的人》就是说明这一转变及其原因的代表作品：

“内在性格……意味着一种与外部事变相区别以至对抗的内在方面的存在——一种撇开公众意见和公众行为的个人自觉和个人潜意识。

……今天，这一私人生活领域已被工艺的现实侵入并破坏了。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配囊括了所有的个人，而且，工业心理学早已不再局限于工厂之内了。人的内在性格的多种多样的过程似乎在近乎机械的作用中僵化了。”<sup>①</sup>

马尔库塞又说，作为适应社会要求的某种动因的家庭的作用也日益被“外界的团体和传播工具所取代”。<sup>②</sup>特别是文化传播工具成了最后一期《社会研究杂志》所注意的焦点（这一期题名为《哲学和社会科学论文集》），并且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生产：启蒙就是群众性的欺骗”这一标题下声名狼籍了。

当然，心理学的一些范畴仍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总的参考框架现在已经是有关流行的大众文化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一领域的批判工作可以追溯到本世纪30年代，特别是阿多尔诺的一些论文，并且构成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社会的批判理论的一个突出的贡献。这一元批判的研究现在应当转向他们著作的这一方面。并且象前面一样，有两方面的意图，既要对批判的概念和分析作出恰当的评价，又要指出其局限性以及由于他们未能引申出一种关于经济控制和政治解放的适当的理解而产生的种种曲解。

<sup>①</sup>、<sup>②</sup>马尔库塞，《单面的人》，伦敦，环球出版社1968年版，第25页、25页。

## 第五章 历史唯物主义美学：作为“肯定”、“文化生产”和“否定”来看的艺术

霍克海默尔的就职演说关注的问题是“社会的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个人精神发展和文化领域（狭义的）中的变化”。后者显然是包含艺术在内的。于是，在《社会研究杂志》第一期上就发表了洛文塔尔的《论文学的社会地位》一文就毫不奇怪了。洛文塔尔（生于1900年）在这里强调需要建立关于上述问题的一种全面的理论观点，即“关于历史和社会的一贯的理论”。洛文塔尔还意味深长地说：

“在对上层建筑的社会解释中……意识形态的概念占着决定性的地位。因为意识形态是意识的成分之一，它具有把社会对抗隐藏起来的作用，并且往往用协调一致的幻想来代替对这种对抗的认识。文学史的任务就是对各种意识形态进行大量的分析。”

这一预示着后来的有关“肯定的”艺术之批判的理论，着重指出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每一独特的文学作品所表达的究竟是各个社会结构的哪些方面？第二，某一作品在其社会范围内有什么影响？然而，在实践的分析中，洛文塔尔只着重于前一问题，而对后一问题并未认真对待；至于以特

---

①洛文塔尔：《文学的现状》，见《社会研究杂志》1932年第1期，第94—95页。



定的读者和未来革命的社会实践为对象，反映社会危机的宣传鼓动艺术的问题，还根本没有提出来。

不管怎样，在进行总的评论之前，有一点是必须弄清楚的，这就是在本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不仅美学的相对作用发生了变化（参看第4章），而且，受历史制约的美学对象本身也因此而有一定程度的变化。正如阿多尔诺后来所写的：“关于什么是艺术的界说最初导原于它曾经是什么，然而，对它的合理说明则只与它已经变成什么、以及对它自身采取开放态度看它将来试图变成什么和可能变成什么有关。”<sup>①</sup>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就是从社会历史的总体角度对艺术进行动态的分析；分析它如何反对封建的意识形态并取得胜利的斗争，分析它怎样由全盛时期随之转入衰落，分析它在“文化生产”中地位的降低；此外，如同艺术的延续问题一样，也把它作为一种批判的社会力量的不稳定的存在来进行分析，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任何中肯的分析，那怕是批判地分析，必须符合这一完整的理论群体。

### 一、作为肯定的艺术

除了沃尔特·本杰明（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位边缘人物，对他的理论将在后面进行讨论）的著作外，法兰克福学派在谈到艺术问题时，最常用的论断就是“肯定”这一批判性的概念。对这一概念，马尔库塞于1937年作出了一个最清楚的表情：

“肯定的文化所指的就是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化，它在其

<sup>①</sup>阿多尔诺，《美学理论》全集第7卷，法兰克福，祖尔坎普出版社1970年版，第11—12页。

发展过程中把智力和精神世界视为一种独立的价值领域从文明中分离出来并把它置于文明之上。它的根本特点是维护一个普遍的强制要求，即为这样一个世界辩护，这个世界不断地变得越来越好，并必须无条件地得到承认。它和每天为生存而进行斗争的现存世界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可以由每一个人从他自己‘内部’得到实现，而无需对社会现实进行任何变革。”<sup>①</sup>

由于这一见解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唯心主义所进行的批判在美学领域的另一种说法，因而一点也不奇怪，这一批判不仅仅是谴责：马尔库塞强调这一特殊文化，不管怎么说，由于它的唯心主义已成为对一个被盲目的经济必然性所笼罩的世界所感到的不满的表达。自由资产阶级时代的艺术，曾经为揭露隐藏在商品生产的具体帷幕背后的人类的天性和人与人的关系而奋斗，并以此对经济拜物教提出控诉。然而，对“肯定的文化”的唯物主义的批判仍然坚持认为：

“肯定的文化用精神来对抗现实的具体化，只是到最后才向它屈服……在肯定的文化所属的存在方式中，‘现世生活中所希求的幸福……只有作为一种幻想中的幸福才是可能的。’然而，这种幻想也有一种产生满足感的实际作用。虽则，近年来它的意义有了决定性的改变，但它仍起着为现状效劳的作用。”<sup>②</sup>

---

①马尔库塞：《文化的肯定性特征》，见《否定：批判理论文集》，哈门兹沃斯企鹅出版社1972年版，第95页。

②马尔库塞：《文化的肯定性特征》，见《否定》，第108页、121页。

这样，马尔库塞坚持认为“肯定的文化”正是由于自身的存在方式而注定要衰落。在美学的演变中，从理论和实践上取代唯心主义，就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要求。

这就提出了一个扬弃这种文化的问题，不仅要对它作出批判的反映，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保证解救艺术中所表达的对立的力量，并把艺术本身从唯心主义的曲解中解救出来。这一任务自身表现为发展一种批判的美学理论和实践，它能弄清“幸福”和“自由”的唯物主义范围，并且解除对“精神”或“艺术”的一切专制，使它能够作为社会内部的一种连贯的对立力量而合法存在，把批判的社会活动的各种需求、目标和观点作为一个整体紧紧地联结起来。重要的是，在这里必须准确阐明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由于不懂得矛盾而在困惑中表现出的退缩。

正如被柯拉赫称之为“实践的阶级观点”的整个社会理论一样，在美学领域法兰克福学派也是软弱无力的。然而，在弄清这种软弱无力的确切性质之前，必须清楚地了解这种关于“肯定”的批判的矛盾心理是不无正当理由的。面对着垄断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文化生产”的新的社会政治群体，对自由主义文化的评价也就改变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肯定的”文化以其非单向度存在的优点展示出它是一种起破坏作用的力量。这一理论因《单面的人》一书而出名，但是，它的轮廓在马尔库塞1937年论“肯定”的文章中就已经有了：

“理想以其完全虚幻的形式保持着处于恶劣现实中的人们的最美好愿望的活力，他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力量在社会各



阶层都背叛了自己的理想的时候，才变得最为清楚。”<sup>①</sup>

这一评价的不足之处是认为“理想的批判和革命的力量”仅在于它能恢复自己，但却不能支持批判的美学实践以满足群众在新的社会历史演变中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并从中扬弃自己，所谓“批判的和革命的力量”也仅是“变得清楚”而已。在“甚至连保持实现愿望的活力在现有条件下也是处于险境的”这一断言中，这一消极态度就更明显了。<sup>②</sup>而对从这种“险境”向批判的实践过渡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但是，关于这种实践的任何讨论，只要“文化生产”的本性，贯穿于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控制的本性还没有得到理解，它必将仍然是抽象的。这一任务，当今批判的知识界如同19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一样，也是不能回避的，而且，幸有《社会研究杂志》时期霍克海默尔一伙人在这一领域的大量著作，已完全表明这一任务也是当今不能对它放手不管的。

## 二、作为控制来看的艺术：“文化生产”

法兰克福学派在构筑他们对文化控制的批判时，矛头所指的不仅仅是法西斯主义（象对待某种“自在之物”那样），而实质上是针对整个垄断资本主义的。比如，马尔库塞的论“肯定”的文章在略述自由社会的精神“自由”时，就谈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一体化”方式中的两个对立的压倒一切

---

①、②马尔库塞：《文化的肯定性特征》，见《否定》，第102—103页、131页。

的转变。（见第二章）从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个最激进的立场出发，极权主义是不能为非法西斯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作意识形态辩护的。

极权主义的一种想法是把对大众文化的一种学院式的评价认知为一种控制力量。霍克海默尔在他发表于《社会研究杂志》的最后一批文章的一篇中，把“大众的娱乐”和“文化生产”的概念同正在明确化的“控制”这一中介概念相提并论。在《启蒙的辩证法》这一综合著作中进一步明确表达了《社会研究杂志》时期的各种分析，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概要地说明了什么是他们所看到的现代大众文化的最主要的特点。

“消遣艺术已经成为独立存在的艺术的影子。它是严肃艺术的一种低劣的社会自责……它的分裂是这么一回事：它至少表达了由不同领域构成的文化的否定性。通过把消遣艺术并入严肃艺术，或者反过来，把严肃艺术并入消遣艺术的办法，也绝不能使对立的双方达到和谐。然而，这却是文化生产想要作到的事……通过减价出售的计划来废除教育特权，并不能为民众打开那个把他们排斥在外的领域，而在特定的生活条件下，还会直接加快教育的衰败，并助长粗野无聊的发展。”<sup>①</sup>

这就是说，法兰克福学派所责难的并不是作为民众文化的通俗文化的发展，而是在垄断资本的庇佑下，采取被抑制的或不自然的特定形式的通俗文化。

把“社会批判理论”应用于大众文化，这一点应归功于阿多尔诺，他于1938年才移居美国（意味深长的是比他的同

---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伦敦，艾伦莱恩出版社，1973年版，第135、160页。

事们都晚)去普林斯顿无线电研究计划署工作。毫不奇怪,阿多尔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分析同时也是对传统的“中庸式的研究”中常用的实证主义方法的批判。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阿多尔诺在研究纲领上表现出和他的主要同事们之间的分歧:阿多尔诺拒绝把消费者的反应型式看作似乎是不可约的“既定的东西”加以权衡和分类。相反,他关心的是这些型式与消费者所反应的“客观现实”之间的符合。

在阐明自己的立场并着手建立一个完整的范畴体系时,阿多尔诺表明了他在《社会研究杂志》上所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关于音乐拜物教和听众的退化》的真正含义。这篇富有理性要求的文章试图把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和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连接起来。阿多尔诺写道:

“马克思指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就是商品作为个人自己所生产的东西而受到崇拜,但它又作为一种交换价值又从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而异化(“人”)……这一秘密是成功和名望的真正秘密。它不过是反映出,当一个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到某种产品时,他所崇拜的实际上就是货币,他用它也可以为自己买到托斯卡尼尼音乐会的入场券。确实可以说,他是‘制造’了这样的成功,它的实现和得到认可都有一个无需得到他自身承认的客观标准。”

同时,正如马克思的拜物教概念以对商品生产的分析为基础一样,阿多尔诺关于大众文化的消费这一概念的外延包括着对文化生产的系统批判。这一批判发表在社会研究所的期刊上,象《论大众音乐》这样一些文章中。

①阿多尔诺,《音乐的形象特征与听觉的退化》,见《社会研究杂志》1938年第7期,第330—331页。



阿多尔诺关于文化生产的概述是以“规范化”的现象为开端的，借助这一过程，他成功地发现，类型和“混合物”可以通过文化生产在物质上的垄断而得到促进。规范化以“臆个体化”的方法为其补充，这种方法容许甚至怂恿对准则的“刺激性”的背离，从而为物质上的单调厌倦提供“借口”。

“所谓臆个体化，我们指的是在自身规范化的基础上赋予群众文化生产以自由选择的晕圈或为它打开市场。流行歌曲的规范化总是象以往一样通过对其听众的影响保持传统习俗。对它的局部来说，臆个体化主义通过使它们丢弃陈词滥调或‘预先整理’而保持它们的基调。”<sup>①</sup>

而且，这种臆个体化产品的分配在大肆宣传中找到适当的实施方法，它采取“闭关自守”的办法粉碎对永远平等的任何抵抗。这样，听的习惯本身就成为规范化的。

在这种情况下，“给大众以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一要求就不能被看作是一个不可降低的事实，它本身是受“控制”的改变所支配的。值得称赞的是，阿多尔诺认为只要按计划进行，这种控制就和生产第一线的群众的控制问题有关。

“音乐会的听众就是他们自己的客体，或实际上是同一过程的产物，这个过程决定着大众音乐的生产。他们的空闲时间只是用来再生产他们的劳动能力。这是一种代替目的的手段……他们需要标准化的商品和臆个体化，因为他们的空闲是劳动的间歇，并且在同样时间里是受他们的心理状态影响

<sup>①</sup>、<sup>②</sup>阿多尔诺：《论大众音乐》，见《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杂志，1941年第9期，第25页、27页。

的，这种心理状态是唯一地由他们日常的人世生活所形成的。”

尽管在“社会批判理论”中，对经济控制的描述未能提供“在资本统治下劳动的实际归类”的适当概念，然而，整个说来，它的方法论的意义是正确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强调上层建筑领域的控制不是任何“法西斯阴谋”的一部分，正相反，整个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本质上是受象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盲目”的经济决定论那样的无意识的决定力量支配的。阿多尔诺强调说，例如在广告宣传中，只要人们被诱惑，人们的举止就处于一种生活方式之中，他们之中的个人就会抱以一种期望，要与呈现的“标准”生活方式相协调。意味深长的是这种专注于“文化产品”的生产的控制，尽管它起初的目的与其说在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倒不如说在于有益的消费；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它们能很快地与深思熟虑的政治控制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在关于文化生产的论文中强调无线电广播在过渡到法西斯主义过程中的作用，这种文化生产促进了表面上似乎没有利害关系而实际上“完全适合于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权威。无线电广播最终成为“元首在全宇宙的喉舌”。

最后，对发展着的通讯工具的控制使用的分析引起了对后者的非控制的甚至批判的使用的问题。不管怎样，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之前，必须首先建立关于“批判的”艺术的

---

①、②阿多尔诺：《论大众音乐》，见《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杂志，1941年第9期，第38页、31页。

一般概念。在它的唯物主义的表达中，批判的艺术是与为社会的根本变革而进行的全面斗争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借用阿多尔诺的话（见另一段引文）来说，这就是艺术力求成为什么和“也许能成为”什么的问题。而且，这是一个确定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的唯物主义最终界限的唯一问题。这一点将在下文得到充分的证明。然而，为了明确起见，应当首先通过对某一批判的美学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述的简短讨论，然后再探索作为“斗争”来看的艺术的概念。关于列宁、卢卡奇和布洛赫的讨论，并不是详尽无遗的，也不一定符合“正统的路线”，然而，通过这一简要的讨论却可以使我们基本上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理论究竟在哪些方面对其进行了批判、歪曲并最后作出了有缺陷的回答。最后，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的系统陈述主要依据阿多尔诺于1970年出版的《美学理论》一书，因为这本最晚出的著作是对《社会研究杂志》时期所提出的有关思想的最清楚的表达。同时，不管怎样，对本世纪30年代的这些思想的明确表达将与一切必要的准确性相关。

### 三、列宁和托洛茨基论革命的艺术

列宁在1905年曾断言文学上的“自由”充其量是一种幻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艺术家对人类遭遇缺乏责任感的虚伪粉饰。与此相对，他提出文学必须自觉地把自已与无产阶级联系起来，“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最卓越的革命思想。”<sup>①</sup> 列宁甚至要

<sup>①</sup>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见《列宁论文学和艺术》，莫斯科前进出版社1970年版，第26页。



使党的艺术从属于党组织的需要；尽管在1905年时他只能提出一个关于党的文学的设想，但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坚决认为整个艺术应该“充满无产阶级为胜利实现本阶级的专政而进行的阶级斗争的精神”，并宣布共产党应该指导这一工作。

无论如何，有两件事实对于理解列宁关于这种艺术的发展的论述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件事是：就在1905年，他断然声明无产阶级政党如不实际地鼓励、扩大“个体的主动性、个人的爱好、思维和想象、形式和内容”的范围，它就不会成为一个整体。他作出结论说：“我们不但不提倡任何类型的标准化体制或用少数行政命令的方法解决问题，而且认为一刀切和千篇一律的体制是最不适用的。”<sup>①</sup>第二件事是：在1920年的一篇文章中，他着重批判了关于不依赖于人类文化的历史而“径直地”发展无产阶级文化的抽象概念，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列宁得出结论，包括为社会主义文化生产而斗争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更进一步的工作”。

---

①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见《列宁论文学和艺术》，第24页。

②、③列宁：《论无产阶级文化》，见《列宁论文学和艺术》，第155页、156页。

这一教导当然是与法兰克福学派在意识形态批判上的总观点一致的。

列宁自己关于艺术运动的分析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与他所宣称的方法论相符，在这里不作详细论述。只需说明的是，他实际上是全然无法对先锋派作出任何鉴别评价的。

“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先锋派的敌意的明显迹象将在随后关于卢卡奇的论述中找到根据。真正的问题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来说，有关艺术表现其自身的辩证思考究竟表现到了什么程度？

至于在列宁逝世之后，俄国共产党内关于艺术问题的辩论，这里也不详论。不过，这一论战的一方是必须提出来谈一谈的，因为它明显地受到了阿多尔诺的推崇。这牵涉到托洛茨基的论点——资产阶级的艺术只能由社会主义艺术来代替。阿多尔诺在谈到这一论点时，认为托洛茨基的本意在于驳斥“无产阶级文化”这一概念。<sup>⑥</sup>至于托洛茨基的论据，可以回想下面一段话：

“随着新的社会制度越来越能防止政治和军事的袭击以及文化创造的条件变得更加有利，无产阶级将会越来越多地融化到社会主义共同体之中，并使自己摆脱其阶级的特性，从而不再成为无产阶级。”

然而，阿多尔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提到这种对“无产阶级文化”自治的否定并不意味着抛弃列宁主义关于党的艺术的概念。托洛茨基在这里所说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

---

⑥托洛茨基：《从文学与革命出发》，见《托洛茨基论文学与艺术》，塞格尔编，纽约，开拓者出版社1972年版，第42页。

下文化的职能，他并没有谈在资本主义国家艺术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作用。在谈到后一问题时，托洛茨基肯定了列宁主义的观点，并毫不含糊地声明：

“社会主义将要消灭阶级对抗和一切阶级，而革命时期，只有那种促进工人阶级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加强团结的文学，才是先进的和必需的。革命文学必然充满着社会仇恨的精神……”<sup>①</sup>

这一态度，对阿多尔诺活动于其中的整个群体具有最大的影响，它完全超出了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的范围。

#### 四、乔治·卢卡奇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正当霍克海默尔招兵买马组织他的班子的时候，公认的共产主义艺术路线在德国的代表是乔治·卢卡奇。卢卡奇也关心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继承，不过，在他看来，这只能采取非常有限的形式。他的主要论点是，那种自称为对立面的小说（一种适合那个时代的流派）只是表现了一种唯意志论的“启示”或“倾向”，落后于象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这样一些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所达到的成就，在他们的作品中，现实主义的力量克服了他们主观的、甚至反动的“倾向”。卢卡奇详细地引述恩格斯于1888年4月给哈克尼斯小姐的信（在这里恩格斯讨论了有关一部带“倾向”的长篇小说的问题），并结合列宁的认识论，从而发挥了这样一种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私人利益和现实的党性是一致的，因而摆脱了抽象的、主观的“倾向”的一切束缚。在谈到革命的、历

<sup>①</sup>托洛茨基：《从文学与革命出发》见，《托洛茨基论文学与艺术》，塞格尔编，纽约，开拓者出版社1972年版，第42页。



史唯物主义的小说家时，卢卡奇说：

“他不以任何‘外在的’要求来影响他关于现实的样式，这纯粹是因为他的现实样式本身必须符合于那些从阶级斗争中提出具体要求和物质要求的人们的命运，同时，他必须把这些要求作为客观现实的构成因素来描述它们的起源、演变和对现实的作用；否则，他就不会有恰当的、辩证的描写。”

现实主义思想完全符合于被称之为“样式论”或“模仿论”（完形论）的卢卡奇理论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尽管现实本身是有党派性的，经济生活的拜物教又把这种党派性隐蔽起来，但在艺术中，也象在政治经济学中一样，这种拜物教只能通过抽象作用的批判力而克服。在又一次引证恩格斯的一封信时，卢卡奇进一步精确地表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实质：

“在现实的形态中，个人及其命运必须作为一种典型出现，也就是必须符合这些个人各自的阶级特性。艺术所塑造的世界的具体整体只能适应这样一些个人，他们在社会交往的动态现实中相互作用、相互启发并在性格上相互渗透，这样，这些个人首先就成为相互可以理解的，其次，他们之间的各种个人关系就形成综合的典型形象。”<sup>①</sup>

只有这样，才能象阶级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那样

---

①卢卡奇：《倾向性还是党性？》，见《文艺社会学文集》，选集第1卷，路敦编，诺伊曼德，卢赫特尔汉德出版社1961年版，第118页。

②卢卡奇：《传闻还是编造？对奥特瓦德长篇小说的批判性评论》，见《文艺社会学文集》，选集第1卷，第128页。

**揭露出社会的本质。**

阿多尔诺当然也同意艺术作品有必要形成各自的客体。他早在30年代就写道：“真正的美学应在对象的‘数量’的显豁中把注意力转向形式主义的东西。”但是，到头来，他却把批判的锋芒对准卢卡奇本人，攻击后者的“对艺术作品的题材和交流的前美学的偏见”。在阿多尔诺看来，卢卡奇的偏见反映出对艺术的“客观性”的误解。这样，理所当然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对阿多尔诺来说就是十分令人讨厌的，因此，他指责卢卡奇关于反映“文化上保守的”社会存在的批判艺术的全部理论，特别是其中表现出来的对资产阶级小说的偏爱。至于卢卡奇所主张的艺术作品是特殊和一般的一定的统一，他认为这只不过是“来自唯心主义的鹦鹉学舌式地一再重复的一个教条”。阿多尔诺说，卢卡奇在坚持把“标准的”艺术作品和非典型的作品进行对照时，是以“违背艺术的本性”的方式思想的。

在这里阿多尔诺触及了卢卡奇的最大弱点之一，这就是他未能把握艺术中的先锋派的内在矛盾。这一弱点在批判表现主义时就暴露出来了，例如，卢卡奇坚持认为，正是在他们自己所标榜的反对派的成就中，在表现主义者的作品中，社会问题这一主题被抬到了神秘的唯心主义水平，从而使有关问题的唯物主义本质变得模糊不清。但是，卢卡奇更进一步谴责表现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在稍后沦落为法西斯主义”，因而它具有“为法西斯主义作意识形态准备的作用”。理由是下面这段总结性的话：

“法西斯主义作为战后时期最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混合的思想体系，它继承了帝国主义时代所有流行的、表明自己的

颓废寄生性格的东西，因而包括一切冒充革命和伪装反抗的运动。”<sup>①</sup>

卢卡奇的不足之处是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伪装反抗的”和“冒充革命的”运动究竟有没有实践意义，特别是它们是否促进了任何一种艺术生产力的发展，使之能够扬弃自身成为“首尾一致”的反抗的和革命的美学实践。对卢卡奇来说，给它贴上“颓废的寄生的”这一标签就可以不再置一词。

与此相反，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却对先锋派艺术作出了较高的鉴别评价。但是，在同一段时间里，人们宁肯对对立的两端进行辩证的分析并且颂扬现代艺术的反推论的倾向，却不去考虑进行革命的扬弃的可能性。因此，阿多尔诺写道：

“现有的美学理论对现状的批判远比对那样一些著作的批判明确得多，这些著作由于明白易懂的社会批判主义，为了达到形式上的概念的一贯性费了大劲，从而默许和承认到处蔓延并正在兴旺的交往方法。”

根据这种观点，批判的艺术之所以是批判的，并不是由于怨恨，而恰恰是由于它拒绝把自己设想为明确表达出来的骚动信号或任何形式的逻辑上一贯的理性交往。

这一理论是与马克思主义者对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批判一致的（参看《资本论》第一卷），然而，这一关系是一种非

---

①卢卡奇：《帝国主义时代德国知识界的意识形态》，见《文艺社会学文集》，第324页。

②阿多尔诺：《美学理论》，第218页。



常特异的关系：阿多尔诺强调艺术要恢复那被机能主义者的认识排除在外的东西，<sup>①</sup>亦即“不同一的东西”。这样，艺术所要恢复的东西就是那否定以抽象劳动和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同性的东西，不过，阿多尔诺的理论竟然拒绝美学领域的一切同一性。艺术既不能描述无阶级的社会，以及为实现这种社会所进行的斗争，又不能“描述”这种斗争的面貌；艺术的批判力量恰恰在于它断然拒绝“支持某种东西”。不仅如此，艺术作品就是它自身。“我们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关头，这就是艺术作品只有不把任何特定的东西看作自己的内容才能够不再悬浮于经验的现实（抽象的功能—联系）。”<sup>②</sup>这样，艺术对其社会根源的批判的意识导致一种与其自身的自主性同义的“反抗”态度；

“艺术的社会特点就是它所固有的反社会的运动，而不是对该社会的明白表达。它的历史姿态总是排斥经验的现实，纵然艺术作品通常象事物一样是这一现实的一部分。甚至可以断言艺术作品的社会职能之一，就是它的非功能性。”<sup>③</sup>

这种理论尽管是针对着废除经济束缚来说的，但它不能使这种目的和实际的社会实践的需要和目标相协调。用克拉尔的话来说，“实践的阶级观点”是必然（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说法是无论如何）要失败的。

当然，阿多尔诺拒绝过高估计艺术的“明确表态”的意义是正确的，因为这会使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问题混淆不清。然而，即使他的关于艺术的批判作用的结论在实践上是不结果实的，但它对于考察一种艺术能否设想这些事实是有

①、②、③阿多尔诺：《美学理论》，第87页、203页、336—337页。

决定意义的：第一，象卢卡奇和阿多尔诺一样拒绝任何强制的“倾向性”；第二，和阿多尔诺一样，但和卢卡奇不同，顺利地看到先锋派中对立的多产的力量(迄今仍被神秘化)，而且，最后避免了阿多尔诺对这些力量的“自然”状态的绝对化。这一问题要求对先锋派进行更加准确的分析。同时，对后者的实践意义的辩证探讨就直接引导到伯特·布莱希特这个人物。所谓布莱希特—阿多尔诺两极对立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暴露出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的根本弱点。

### 五、布莱希特的戏剧

布莱希特一方面承认关于“客观现实性即党性”的认识论概念，而拒绝任何抽象的“倾向性”，同时，更进一步承认那揭露了基本的阶级群体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成绩，另一方面，他仍然对卢卡奇关于如何达到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想保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布莱希特反复声明，写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并不意味者必须按巴尔扎克或托尔斯泰的风格去写作，而是要给读者一幅关于他那个特定的社会现实的逼真而清晰的图画。由于这种现实本身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任何参照特定的现实主义者而建立起来的有关现实主义的“标准”，都不免导致形式主义的结果。布莱希特强调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依据其固有特点可以通过“伟大”人物而描绘出来，与此不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则是社会的大多数人们自身的能动性的表现。任何现实主义的描绘都要正确对待这一差别：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考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最后决战时代大规模复杂的人类生活过程能否作为形成伟大人物的‘情节’、舞台背景来‘使用’这种简单化的问题，简

直是浪费时间。这些人物在现实中于什么范围内受欢迎，那么在书本中也一定在同样圈子中受欢迎。”

这样，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概念，以及关于批判的艺术的要求不断变化的思想，给布莱希特提供了一把了解先锋派艺术的钥匙。

布洛赫的《当代遗产》也以对资产阶级衰微的辩证分析来驳斥卢卡奇的现实主义概念，并给后者打上唯心主义者和客观主义者的标记。至于布莱希特，他一直坚持“与其被好的旧传统缠身，不如与坏的新事物结缘”这一谚语，<sup>①</sup>并且在本世纪30年代后期所写的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中，显露出布洛赫的强烈影响，对卢卡奇把资产阶级文学的衰退与无产阶级文学的上升割裂开来表示极大的不满：

“实际上，资产阶级的衰落在其文学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空虚中就显露出来（它只剩下拘泥于形式的现实主义），同时，道斯·帕索斯这一类人物的作品轻蔑地对待或更确切地说破坏现实主义的形式，却显示出一种新现实主义的突破，而无产阶级的兴起则保证了它们的可能性。这不只是依靠一种倾向代替另一种倾向的职能而实现的过程，而得依靠一个积极的辩证地奋斗的群体”。<sup>②</sup>

布莱希特不得不承认表现主义并不能揭露垄断资本主义的本性，但他着重所指的是托马斯·曼的一些符合于“现实主义”的作品。同样，表现主义所包含的对立并不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完全解放，因而，布莱希特拒绝给这一运动打上非辩证的静态的标记。相反，他把注意力集中于新生产力

①、②、③布莱希特：《超现实主义》，《全集》第19卷，第310页、298页、317页。



与有生气的现实主义的需求之间的关系上，比如，布莱希特关于乔治皇帝写了下面一段话：

“无疑地，皇帝是一个利己主义者。然而，在他的行为表现中总有某种东西存在，与其利己主义不相称，而适合于我们。比如说，皇帝的行为发生在伟大的莎士比亚式的联想意志之前……皇帝指引自身达到人类理性……他一度允许对部分观众的革命的新姿态在戏剧中存在，允许冷静的、有分析的、感兴趣的姿态存在，这种姿态是科学时代的观众的态度。”①

如此，布莱希特的戏剧试图继续发展主要的原则，并把反移情的戏剧交流的强烈的批判的潜能变成现实。

这一点是理解布莱希特的“异化”概念的一把钥匙。这种异化（*Verfremdung*，与*Entfremdung*截然不同，后者是马克思主义表述经济异化的一个术语）不仅剥去了世界的自然的、正常的、自我表现的外观，而且引起了对它的诧异和好奇。和阿多尔诺的对具体社会的“整体”否定根本不同，布莱希特的异化方法是对社会的辩证继承；所有的关系，所有的价值都具有历史意义，并且是不必盲目崇拜的。而其结果则是一个前后一贯的推论的认识：“从前被认为是当然的东西，在一定的意义上，又会变成不可理解的东西，然而，在这种情形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它变为更加可理解的东西。”② 先前仅仅是“被知”的东西（*bekannt*），现在就

① 布莱希特：《现代戏剧回顾》，《全集》第15卷，第152—153页。

② 《布莱希特：1935—1941年戏剧艺术的新技巧》，见《全集》第15卷，第355页。

成为“被认识的东西”(er-Kannt)。这一引理有其指导宣传鼓动的价值：戏剧把世界赤裸裸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以使“他们能够反过来得到世界”。布莱希特的戏剧提供了一个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否定，因而成为批判的艺术与意识形态斗争之间的中介。法兰克福学派虽和这种艺术理论和实践中的反卢卡奇主义的见解发生共鸣，但在其他方面所持的态度几乎是完全否定的。霍克海默尔的《曙光》作出了下面这样一个总括性的结论：

“戏剧何以能在今天继续起革命作用，这一问题的回答就在于：这种戏剧使阶级斗争问题变成公众思考和讨论的对象，从而在美学领域造成一种真实的和谐，这种和谐当它在无产阶级意识中表现出来时，就必定会被打破。这是政治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sup>①</sup>

霍克海默尔重视革命斗争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但他却暗示这些问题是从来不可认识的，因而歪曲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实际的美学实践。特别是霍克海默尔忽视了布莱希特在这一时期的进展。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布莱希特就明确地系统阐述了他要和自己原来的观众决裂并且只和无产阶级组织联合的意图。实际上，当时就有不少工人阶级观众从各个地方写信给他，他也更进一步实际地专为无产阶级观众写作和上演他的戏剧。然而，法兰克福学派主要的美学家阿多尔诺却仍要责备什么中立化的和谐卷入文学。例如，阿多尔诺到本世纪60年代还写道：

“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不管它的名称怎么变化，自称是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黄昏：德国札记》，苏黎士，黑尔柏林出版社1934年版，第108页。

批判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与其说它是这样一些形象，他们并未宣誓效忠于任何政治口号，而是通过自己的单纯表现，使得那些屈从于权威主义支配的人们的呆板的协作体系无所适从；倒不如说它更容易使敌对的态度与一切新的和陌生的东西和解”。<sup>①</sup>

布莱希特的美学实践，一言以蔽之，就是“实证主义”。<sup>②</sup>

以上表明，阿多尔诺所用的异化概念（他用的仍是Entfremdung，而不是Verfremdung）远不如布莱希特的概念明确。例如，阿多尔诺写道：“形式的作用就象磁力一样把经验现实的各种构成因素排列起来，以至使它们从其外在的美学存在关系中异化出来，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它们成为这一存在的主体。”<sup>③</sup>这就是为什么阿多尔诺的美学理论在极少数荣获“批判的艺术家”桂冠的人物之中选出卡夫卡来作号召，而不只是局限于消极的颂扬。反之，布莱希特对卡夫卡的钦佩（作为艺术中异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则是一种随着生产力对群众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而变化的动态关系。

阿多尔诺和布莱希特的两极分化在他们对蒙太奇技巧的态度上进一步表露出来了。布莱希特声称卢卡奇把蒙太奇当作“颓废的东西”而加以拒绝，因为它撕碎了作品构思上的“有机统一”；这一反对卢卡奇的现实主义的论点和布洛赫的论点是一致的，布洛赫的论点看起来似乎也是同意法兰克

①阿多尔诺：《契约》，见《文学笔记》第3卷，祖尔坎普出版社，1965年，第112页。

②③阿多尔诺：《美学理论》，第152页、336页。



福学派的总的文化观点的。但是，布洛赫在详细说明蒙太奇技巧时明显地参照了布莱希特的剧作艺术，在那里，蒙太奇的意思是“把某一个人物从其原来的境遇中汲取出来并重新安排他，使他投身到一种新的境遇中”，或换一种说法是“选取一种行为的准则，把它看作是各种条件的确定组合的产物，并把这种准则试用于根本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是，阿多尔诺在解释他自己的蒙太奇概念时所参考的却是玛赫勒，在谈到音乐拜物教时，他写下了关于作曲家的这样一段话：

“他所赖以进行创作的一切事物都是已有的。他在对生活已显得陈腐的叙述中把它们记录下来，所以他的歌曲就已经成为不合时宜的。而且，已经没有一个音符是我们曾经听惯的：每一个音符就象有一块磁石使它发生了偏斜一样。确切地说，那些已经陈腐并且表演者已不再沾指的声乐，只有变换调子才能获得第二次生命。”<sup>①</sup>

这样，蒙太奇不是在阶级鼓动的意义上，而是在一般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否定”的意义上得到了详细的说明。实际上，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中，“否定”代替了“斗争”的地位。关于“否定”的理论现在可以得到扼要的说明。

## 六、作为否定来看的艺术

把艺术看成否定这种概念是“社会批判理论”的全部弱点的根源。当阿多尔诺承认艺术是有“党派性的”时候（虽然他用的是Parteilich，而不是Parteilich这一认识论概

---

<sup>①</sup>阿多尔诺：《偶像》，见《社会研究杂志》，1937年，第6期，第354页。

念)，显然，他所指的仅仅是促使自觉的意义，而不是鼓动性的阶级意识的意义。

“‘艺术’作品的党性不亚于人的党性，这种党性有其深刻的根据，在那里，社会的自相矛盾变成艺术形式的辩证法：艺术家们通过形象的综合使这些矛盾上升到语言表达的水平，从而形成他们的社会角色。”<sup>①</sup>

对于阿多尔诺，这个过程也就是“一种对不能言传的东西的表达”，它构成“对具体化意识的猛烈冲击”。<sup>②</sup>然而，实际上，对文体表达的否认，就会妨碍一切具体的为群众的阶级的觉醒而进行的宣传斗争，从而打断理论和实践的联结。应该指出的是，后一关系被阿多尔诺归结为“对谁有利”这样一个通俗的问题，从而容易被看作一种“手段”而忽略掉。<sup>③</sup>

有时，对艺术的孤立之唯物主义意识有所突破，但问题仍以维护艺术的优越感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用人格化的术语）：“只有尊重人的精神才是那唯一的精神，它不是象社会塑造了人那样去迎合人，而是自己沉浸于那既不为人所知，又为人所有的目标之中。”<sup>④</sup>有一种和这一观点正相反的庸俗的看法（按照这种看法，艺术之所以是不可理解的，原因在于它忠诚信守自己的本性，即否定性，——这一理论自始至终地贯穿于阿多尔诺的美学之中），这种看法声称民众事实上非常清楚他们之所以拒绝先锋派，是因为它向他们在其被控制的生活方式中的安全保障提出挑战。霍克海默尔在《社

---

①、②、③、④阿多尔诺《美学理论》，第345页、292页、183—184页、217页。

会研究杂志》中声言：

“然而，每一新的艺术作品使群众陷入恐怖。它既不象‘元首’那样以强烈的号召力感染人们的心理，也不象精神分析学那样，保证指引这一心理朝向‘调整’。在遭受蹂躏的人们之中，一部震撼着他们自己的绝望意识的艺术作品所教导人们的就是他们可以自由地发泄愤怒。”<sup>①</sup>

群众无论是作为一个行动着的整体还是作为个人，都是和一个为艺术所“否定”的异己的世界打交道。尽管艺术不是它希望得到的一切，它所能做到的不过是蔑视和“否定”它所属的单面社会，阿多尔诺还是辨解说：

“诚然，艺术是与黑格尔称之为世界精神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因此，艺术也对这个世界负有某种责任；不管怎样，它只能通过消灭自己而逃避同谋犯的罪责，并且，如果它真的这样作，它也就会真正地帮助并积极唆使对人类的异己的、不堪言说的统治，从而屈从于野蛮状态。”<sup>②</sup>

在关于“肯定”的艺术之批判概念还没有完全失去意义的时候，关于扬弃的问题就转变为实践的一批判的斗争。

这一点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批判理论”。霍克海默尔的《宣言》曾说到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能动的统一”；不管批判的理论家和他的理论所“涉及到”的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他的理论仍然始终与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在“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中，这一纲领迁就于已

---

①霍克海默尔：《艺术与大众文化》，见《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杂志，1941年第9期，第298页。

②阿多尔诺：《美学理论》，第310页。



被腐化和被控制的群众的见解，这就把“真理”作为批判的知识分子的禁地而孤立起来。这样，在某种意义上说，法西斯主义的经历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种沉重打击。他们的理论没有得到任何发展，对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一直存在的对抗没有任何认识；更不必说，以群众彻底的阶级觉醒为条件的全面革命，被看作只是绝望地卷入那已被打得四分五裂的真实世界的矛盾之中的一种活动。这一弱点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中也得到重演。对控制的分析尽管很深刻，然而，关于“否定”的概念却倾向于唯心主义。

在缺乏社会—政治水平的革命实践的情况下，注意力就转向于艺术的“激进的”实践。为了结束这一恶性循环，无论如何，艺术的“否定”只能是被动的，并且无能为力地等待革命实践的真实否定。阿多尔诺的艺术理论既是杰出的；又是悲观的；

“艺术不只是实践，因为它甚至转向实践的反面，一视同仁地谴责现实世界的各种界限和虚伪。实践也许能曲折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实际的重整世界的事业，从来还没有取得过成功。”<sup>①</sup>

恰恰在他们对实现没有异化的社会的具体斗争感到不满时，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仍然焦急地、被动地、软弱无力地等待着这一斗争达到成功，以具体地实现在当代只有在艺术中才有其“必要性”的否定。

然而，正如在心理学中的情况一样，法兰克福学派对艺术的分析，间或听起来似乎有乐观主义的调子，特别是它对

---

①阿多尔诺：《美学理论》，第358页。

文化生产的重点分析；既然它只能在孤立状态中漂泊，那么，就会有“某种辩证的東西”发生。阿多尔诺在《社会研究杂志》中的论文常常以这种调子结束。因此，马丁·杰伊（他正确地指出阿多尔诺从来没有放弃他的“文化优越论”，不过他未能对这一概念作出具体的说明）谈到“正如爵士音乐中的情况一样，阿多尔诺在大众音乐中也感觉到有一种力量正在悄悄地变成独立的否定因素”。这一点也是对的，但杰伊没有进而深究这一“否定”的唯物主义方面。只要提出这一问题，那么，法兰克福学派的通常的弱点就再一次暴露出来了。下面就是阿多尔诺的论点：

“对大众音乐的热忱需要听众出自内心的不屈不挠精神，他们必须把他们所屈从的外在的秩序转变为一种内在的秩序。音乐创作的才能和里比多（性欲）活力一起都是由自我控制的，因而，这种控制不是完全无意识的……但是，在紧张不安的情况下，意志的决断、各种装模作样和自我谴责的急迫感越接近意识的外观，那么，这些倾向在群众中得到突出表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并且一劳永逸地免除对音乐的压抑。”<sup>③</sup>

尽管这种“可能性”所提供的并不是积极加强意识形态斗争的真正的指南，但它却再一次证明了先锋派艺术的优越感和狭隘的神秘主义。比如，霍克海默尔在其发表于《社会研究杂志》的倒数第二篇文章的末尾写道：

---

①、②杰伊：《辩证法的想象》，第23页，192页。

③阿多尔诺：《论大众音乐》，见《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杂志，1941年，第9期，第45、47页。

“总有一天我们会认识到，即使在法西斯主义国家里，群众也会在其内心深处隐秘地分清真理和不可置信的谎言，他们就象经历了一场精神病魔一样，只要他们的恍惚状态一结束，就再没有什么东西能躲过他们。因此，继续说一种不易了解的语言也许不是毫无意义的”。<sup>①</sup>

这里暗示群众是不能被整个控制的。同时，批判的艺术对“文化生产”的弱点的所有具体关系的概念化，不仅是含糊的，而且是不存在的。因此，现在正是提出批判的著作在大众文化中的可能性这一问题的紧要关头，这就是逐步利用先进的交往手段的问题，这一问题又一次把我们引向布莱希特的形象。不过，在这之前，简短地讨论一下沃尔特·本杰明的著作是有益的。本杰明关于革命文艺问题的理论著作是使布莱希特的实践系统化并普及化的一次大规模的尝试，并且，这也就构成了本杰明对美学的最后贡献之一。无论如何，它首先为弄清本杰明和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基本差别提供了资料。

## 七、沃尔特·本杰明

简要地说，本杰明和阿多尔诺之间的基本区别就是他们各自的著作具体化的程度不同。阿多尔诺的美学呈现出高度的实体化（人格化），甚至到了晦涩难懂的程度，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的《美学理论》中的如下一段话：

“文艺作品是否干预政治，这是难以决断的；即使它们这样做，那么对各不相同的作品来说，通常都是转弯抹角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艺术与大众文化》，见《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杂志，1941年第9期，第304页。



的；同时，即使它们力求这样做，它们也通常缺乏自己的概念（Begriff）。它们的真实的社会效果或影响是非常间接的；它参与这样一种精神（Geist），这种精神致力于改革社会的隐蔽过程，并且浓缩在艺术作品中。”<sup>①</sup>

另一方面，本杰明在1934年的一次讲演中就曾谈到要预先反对并拒绝的也正是这一段话，他说：

“那些使自己以法西斯主义的名义让人们听到的理性、精神必然会消失。那种仅以自己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一种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力量）使人相信的理性可能会消失。因为革命斗争并不是资本主义和理性之间的搏斗。它是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搏斗。”<sup>②</sup>

对本杰明来说，这一观点不仅仅是一个固定的方法论的公式（如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一样），而且实际地表明了他对特定的文化现象的分析，特别是在布莱希特的影响下所进行的分析。

和阿多尔诺一样，本杰明也曾对先锋派非常感兴趣，但他却避免了阿多尔诺的消极态度。这一点大大地归功于布莱希特的影响。布莱希特在反驳卢卡奇对先锋派的非辩证的攻击时，仍然强调指出它也可能变成非现实主义的；它可能“前进到使其队伍的主要部分跟不上它以至于看不见它等等”。本杰明追随着这一批判的观点，他在关于超现实主义的反机械论力量与实现无阶级社会的斗争之间的密切关系的论述中着重指出：

①阿多尔诺：《美学理论》，第359页。

②本杰明：《作为演员的作家》，伦敦，国立盲人图书馆出版社，1973年，第103页。

“正如伯尔所提出的，一个艺术家纵然不断革新艺术，他也不会因此而比鲍埃特更革命，对鲍埃特来说，革命就是革新服装式样。在全部艺术中，先锋派的最先进、最大胆的作品，不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都只在上层资产阶级中拥有他们的观众。这一事实，不管对它如何评价，它仍然为了解隐藏在這些现象背后的各集团的政治疑虑提供了线索。”<sup>①</sup>

本杰明最先使用“单面性”这一新概念，从而成功地揭露了唯物主义者感到特别疑難之处：

“由于我们面对这样的事实……资产阶级的出版和发行机构有吸收和传播的能力，因此，关于数量大得惊人的革命题材的作品的继续存在问题或它为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从来还没有被认真地提出来。”

这样，本杰明就阐明了蒙太奇在布莱希特的史诗剧的术语中的合理应用，在这里，蒙太奇并没有刺激感觉的力量，而只具有“组织的作用”。这种组织作用不只是艺术家的“否定”的脑力劳动（象在阿多尔诺的玛赫勒中那样），它的目的是通过合情合理的表达使阶级斗争的实际情景连接起来，从而把所有听众组织成为一个“团结一致的统一体”。

## 八、布莱希特的广播作品

本杰明有关生产、分配和接受的范畴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生产”的分析，具有元批判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本杰明的著作多半是对布莱希特的美学实践（也就是他

<sup>①</sup>本杰明：《法国作家的现代社会观点》，见《社会研究杂志》，1934年，第3期，第73—74页。

实践地深入群众的手段)所进行的广泛的理论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第一次在理论上专注于新的交流手段还是在移居美国之后,结果,把这些手段都归之于“文化生产”这一带有贬义的名称之下。然而,布莱希特则自本世纪20年代末期以来就极其关心它们,并试图使它们应用于进步的方式。布莱希特不愿作一个消极的批判者,并主张仅当这些废话是保证为它们而生产时才把这些新手段当作“废话”而注销。

布莱希特相信新的手段不仅不会被取代,而且会“在机能上转变”或“渐进”为有益于无产阶级相互交往的东西。除了使其实现之外,布莱希特还要求在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关系上有一个根本的变化:

“无线电广播将会成为公众生活中可以想象到的相互交流的最重要的设备:这就是说,一个大规模的广播网,由于它不仅清楚了解怎样发报,而且也清楚如何收报,因而不仅能使听讲者,而且也能使实际的演说者都变成听众,这样,就不会把他们作为被动的对象分离开来,而是使他们和其他听众和演说者建立积极的联系。在我们看来,无线电广播将不仅成为一个供应者,它将把每一个听众作为一个供应者组织起来。”<sup>①</sup>

本杰明非常重视布莱希特的“机能转换”概念的意义,并且详细考察了对艺术进行技术复制工作的普遍意义,从而突出了这一积极的进展:“气味”的丧失就意味着艺术从其“对繁文褥节的寄生式依赖”中获得彻底的解放。

这一肯定的评价促使阿多尔诺进行一次批判的回答,他

<sup>①</sup>布莱希特:《1927年—1932的广播剧》,见《全集》第18卷,第129页。



实践地深入群众的手段)所进行的广泛的理论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第一次在理论上专注于新的交流手段还是在移居美国之后,结果,把这些手段都归之于“文化生产”这一带有贬义的名称之下。然而,布莱希特则自本世纪20年代末期以来就极其关心它们,并试图使它们应用于进步的方式。布莱希特不愿作一个消极的批判者,并主张仅当这些废话是保证为它们而生产时才把这些新手段当作“废话”而注销。

布莱希特相信新的手段不仅不会被取代,而且会“在机能上转变”或“渐进”为有益于无产阶级相互交往的东西。除了使其实现之外,布莱希特还要求在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关系上有一个根本的变化:

“无线电广播将会成为公众生活中可以想象到的相互交流的最重要的设备:这就是说,一个大规模的广播网,由于它不仅清楚了解怎样发报,而且也清楚如何收报,因而不仅能使听讲者,而且也能使实际的演说者都变成听众,这样,就不会把他们作为被动的对象分离开来,而是使他们和其他听众和演说者建立积极的联系。在我们看来,无线电广播将不仅成为一个供应者,它将把每一个听众作为一个供应者组织起来。”<sup>①</sup>

本杰明非常重视布莱希特的“机能转换”概念的意义,并且详细考察了对艺术进行技术复制工作的普遍意义,从而突出了这一积极的进展:“气味”的丧失就意味着艺术从其“对繁文褥节的寄生式依赖”中获得彻底的解放。

这一肯定的评价促使阿多尔诺进行一次批判的回答,他

---

<sup>①</sup>布莱希特:《1927年—1932的广播剧》,见《全集》第18卷,第129页。

众的小学生们朗诵飞行员的台词并变成“飞行员”。在以“想象的飞行员”为标题的一段正文中，把技术进步与社会政治混乱相提并论，把现实和理想两方面并列起来：

“在城市里，社会阶级的混乱创造了神，  
因为在这里人民被分为两类：剥削者和愚昧无知者，然而，革命总会把它们消除干净……

让我们参加

反对一切原始东西的斗争，

进行对‘来世’的清算，

并破除一切神灵，不管它在哪里出现。”<sup>①</sup>

这样，小学生们就成了情节的主体，一个自我群体的主体，进步的实践主体。

### 九、布莱希特的鼓动歌曲作品

通过批判的美学实践创造群体自我的尝试并非新的东西，而是从工人歌曲及合唱队的事例中，吸收魏玛德国时期阶级斗争的主要特色的产物。列宁未能和先锋派建立建设性关系（就算他是一个“老保守”），他曾坚持认为：实际上，对先锋派进行评价只有第二位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则是那种“属于人民的艺术”。这种艺术必须作为宣传鼓动的武器而发展。并被“灌输到最深层的劳动群众中去”从而“团结并提高他们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在1913年，列宁实际上已经谈到过“歌颂正在来临的人类从雇佣劳动下获得

<sup>①</sup>布莱希特：《飞越海洋：对青少年的广播教材》，见《全集》第二卷，第576—577页。

解放的热诚的无产阶级歌曲”，这并不意味着关于“正统的”列宁主义路线的断言是正确的，相反，它表明列宁善于准确地找出在魏玛德国能真正为提高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之间的感情、思想和意志服务的群众艺术形式。

布莱希特在这个时期和汉斯·埃斯勒一起写了大量的宣传鼓动歌曲，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一首“团结歌”，它的歌词中有一段是：

“勇往直前，决不后退，  
团结一致，就是我们力量之所在！  
无论我们忍饥挨饿还是吃饱喝足，  
我们都要在团结奋斗中  
勇往直前，决不后退。”

它的最后一段歌词是稍作更改的下面一段话：

‘勇往直前，永不后退，  
不管我们吃饱喝足还是忍饥挨饿，  
我们都要挑战地质问：  
‘明天将是谁的明天？  
这个世界将是谁的世界？’”

这首歌曲直接地与魏玛德国的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在那里，民众慷慨大方的性格决定了工人阶级生活的现实特点（参看第一章），因而这里的“我们忍饥挨饿”不是一种不合实际的陈套文章，而是一个孤注一掷的紧迫问题，它动员群众投入一场可能是革命的、但不幸又是分崩离析的斗争。

对歌曲的正确表演在于把歌唱和吟咏融合起来，这种融

---

①布莱希特：《团结起来》，见《全集》第8卷，第369—370页。



合既富有感染力又保持各自的特点，布莱希特强调，正确的演唱腔调简单说来就是要最好地适应阶级斗争的当前表现形式，因而有时激越，有时狂热，有时豪放。与此相反，伴随整齐节奏，而且受到各种限制的始终如一的声调“没有充分的刺激能力”。这样，由于布莱希特深入地参与群众的意识形态斗争，他之拒绝接受“肯定的”艺术就有了十分明确的实践结果。

有时，阿多尔诺也肯定布莱希特的“纯化鉴赏力”的技巧，以便认识表现方式的丰富性与现实的贫乏之间的复杂关系。然而，阿多尔诺由于对本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一首宣传鼓动歌曲的支离破碎风格的效力发生疑问（尽管怀疑主义是一种“纯理论”的美学），从而提出“艺术对粗俗和野蛮究竟是抱着实际谴责的态度还是和他们社会现实中的这些力量打成一片，这是永远得不到解决的问题”。这样，阿多尔诺的立场就仍是一个对具体化的“整体否定”，并排除具体的宣传鼓动斗争。相反，布莱希特则保持对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并强调批判的理论（以及艺术）对其接受对象的关系：

“你不能只是‘写真实’，你是在为某人并给某人而写作，并且，这某人与你所写的东西总会有某种关系……你必须不仅把具有某种气质的人作为你的接受对象，而且还必须以那些在其社会观点的形式中受益于这种气质的人为对象。”<sup>①</sup>

<sup>①</sup>布莱希特：《1933—1938年的艺术与政治》，见《全集》第18卷，第230页。

阿多尔诺对此所作的回答就是把布莱希特的作品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对拯救的劝诫”。这就暴露出阿多尔诺对阶级意识的复杂性、动态性的无知。对布莱希特来说，这里并不存在一条明显的界线，可以把“拯救的”和“未拯救的”人区别开来。倒不如说，革命的艺术是这样一个时期的艺术，这时，群众已经被大规模发动起来并且有先进的批判意识；同时，革命的艺术面向人民，指引他们实现增强他们的意志和净化他们意识的生气勃勃的任务。

阿多尔诺的唯心主义观点在他后来关于艺术的“否定”与批判的社会实践之间的潜在协调这一关键问题的讨论中也暴露出来。尽管他完全正确地指出，任何一部特殊的艺术作品~~的~~实践效果不全然决定于作品自身，而是决定于历史的进程，~~但是~~，阿多尔诺却把这一思想引伸到“嬉皮士运动”的政治意义上（他又进而补充说布莱希特是“政治上的弱者”<sup>①</sup>）。阿多尔诺对整个艺术作品仍然坚持：

“它们所希求的效果当下还不存在，它们由此也蒙受了屈辱的痛苦；但是，一旦它们为获得这种效果而使自己迎合流行的需要，它们也就从人们那里剥夺了恰是它们能够（用堂皇的术语把需要认真表达出来，并用它来反对它自己）给予他们的东西。”<sup>①</sup>

阿多尔诺深信，通过广泛的交流把艺术和实际的社会政治斗争联结起来，将意味着完全取消艺术，这并不是什么扬弃，而是向野蛮状态的让步。那时，“真正的”批判艺术“给予”我们的必定只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作品。

<sup>①</sup>阿多尔诺：《美学理论》，第361页。

## 十、美学的优越感与阶级实践的低落

不论谁只要考察一下法兰克福学派渡过他们创作生涯时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就必得承认前面的引文应得到某种谅解：这段话毕竟是在本世纪60年代初写的，而当时在工人阶级中不存在群众的革命觉醒。同样，论《协约》的文章写于1962年，那正是冷战的高峰时期，面对苏联的极权主义官僚体制的衰退，对纳粹分子野蛮行径所造成的创伤记忆犹新（特别是对犹太人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迫害）。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被击败了，然而孳生它的资本主义温床却在兴旺发达，并且，在人民群众中还没有出现严肃认真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迹象。

不管怎样，在阿多尔诺的《美学理论》中得到提炼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理论，远不只是对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客观上低落的一种反应。正相反，这一理论已跨越几十年，而且在这期间显示出值得注意的前后一致性。在确定了这一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之后，现在就有可能对它的起源进行分析，这一分析表明这种理论在实践上的失误在魏玛共和国没落时的革命时期就已经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当时，批判的美学实践已不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具体的群众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积极的组成部分。

在他发表于1932年的《社会研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关于音乐的社会地位》中，阿多尔诺坚持认为，流行的意识，以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由于它不可避免地负荷着异化的伤痕而变形。这一点就决定了阿多尔诺的美学：“正如作为整



体的理论超出民众的流行意识一样。音乐也必须超出它。”<sup>①</sup>但是，象整个“社会批判理论”一样，这一美学理论及其所称颂的实践，远远超出普通意识到这样的程度，用布莱希特的话来说，就是工人中最先进的阶层都已经“看不见它了”。这应归之于阿多尔诺的形式主义的标准：

“此时此地，音乐就其自己的结构来说，所能做的只是描述社会的自相矛盾，在所有事物之中，这种矛盾应对音乐的孤立负责。它将取得更好的成功，更深刻地驾驭自身的形式、内部的对立力量以及使它们在社会中得到解决的必要性，并将在自己的语言和形式的矛盾中，通过密码形式记述着苦难的语言，更准确地表达出现状的悲惨。从而强有力地去呼唤变革。”<sup>②</sup>

可以作为这样的例子的就是阿尔诺德·森伯格，他在音乐方面的各种技术性解释，尽管是“孤立的”，仍然具有“社会性的后果”。<sup>③</sup>至于这种深奥的音乐对社会实践有什么具体“后果”，阿多尔诺则默不作声。因此，他的关于音乐的孤立“不能在音乐内部的斗争中，而只能社会地、即通过社会变革才能解决”这一正确的唯物主义的认识终于使他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对此，他的辩证的思想也只能表现为一种悲观主义的逆来顺受。

在这篇文章中，阿多尔诺实际地讨论了埃斯勒的鼓动性音乐，而对它的评价则与布莱希特的评价大相径庭。对布莱希特来说，埃斯勒是魏玛共和国革命艺术家中最幸运的一

---

①、②、③阿多尔诺：《音乐的现状》，见《社会研究杂志》，1932年第1期，第105页，106页，111页。

个：拥有高度发展的技巧，作为森伯格的学生学到了不少东西，埃斯勒使这种技巧摆脱了它的优越感，并使它为已动员起来成为积极生产者的群众服务。这种积极性在美学上似乎符合法兰克福学派的箴言：“在为实现无产阶级社会而进行的斗争中，群众首先必须把自己组织起来，并使自己从仅是一种客体的地位转变成为历史的能动的主体，从而彻底摆脱他们作为自在的群众的特性”。（参看第三章）然而，实际上阿多尔诺却指责埃斯勒的美学实践，认为它纯化了已经变形的流行意识：

“音乐创作所必须遵从的简明、适于演唱、集体效果这些特殊的标准本身，必定是受制于某种意识状态的，这种意识状态也是受阶级统治的影响和束缚的——对这种阶级统治的系统阐述，没有任何人能比马克思更彻底——这种意识，只要它成为创作的片面的标准，它就会成为束缚音乐创造力的桎梏。”<sup>①</sup>

阿多尔诺令人高兴地承认无产阶级音乐的鼓动意义是无可置疑的，而且，要用某种“虽然内在地更适宜于无产阶级的基本职能，但却不为这个阶级所理解的东西”来代替这种音乐，那将会是一种“乌托邦”和“唯心主义”。然而，阿多尔诺的概念（可以胜任的美学实践）“超越”无产阶级音乐，不是朝着一种更高的群众意识形态斗争的方向，而是向着资产阶级先锋派的方向。比如，阿多尔诺关于无产阶级音乐曾说过：“这种音乐只要一脱离直接战斗的前线，作为一种

---

<sup>①</sup>阿多尔诺：《音乐的现状》，见《社会研究杂志》，1932年，第1期，第123页。

艺术形式来反思并确定自己的地位，就会一清二楚地明白它的作品并不能保证自己胜过先进的资产阶级创作……”<sup>①</sup>这样一来，对先锋派的分析就以一个否定而告终，而有关阶级斗争的美学实践对阿多尔诺的理论来说，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从此，在阿多尔诺的著作中就连对魏玛德国时期无产阶级艺术形式的“回忆”也遭到了灭绝的厄运。与此不同，可以说布莱希特和埃斯勒的全部作品以及整个宣传鼓动活动都不能不加批判地移植到一种不断变化着的阶级群体中去，对布莱希特这样一些人物的理论和实践所进行的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将会保证批判的美学实践的对象和范畴避免象阿多尔诺那样倒向唯心主义和文化优越论。

### 十一、布莱希特对法兰克福学派“吸蜜鸟”<sup>\*</sup>的抨击

在《社会研究杂志》的最后一期中，霍克海默尔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个美学观点（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总括为：艺术已经最终地确认了“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比商品生产还“不同”；这个不同的世界已经忍受了垄断资本主义和“文化生产”的腐蚀，而到今天幸存下的就只有毕加索的绘画和乔伊斯的散文这样一些作品：

“这些作品所传达的不幸和恐怖，并不是和那些以理性的名义而脱离现实或起而反对现实的人们的感受一致的。那

---

• 吸蜜鸟一词，原文是“Tui”，字典中说是“新西兰所产的吸蜜鸟”；在原著中打上了引号，有转借、比喻之意。在本节第四段开始的一段话对此有具体的解释。——译者注。

①阿多尔诺：《音乐的现状》，见《社会研究杂志》，1932年第1期，第123页。



隐藏在它们后面的意识，既然完全与社会的本来面目隔绝，它也就不得不采取奇怪的不协调的形式。”<sup>①</sup>

这样，在艺术中从“整体否定”进到阶级实践的社会政治否定的道路就被堵死了。在布莱希特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与此正相对立的思想，它被表达为“号召被压迫者起来反对压迫者，而且以人类的名义这样做”。如布莱希特所强调指出的，这是因为“只要这样压迫还没有被全部消灭，在这整个时期，人类就免不了成为好战的”。这就是布莱希特关于否定人类遗产的看法。如果法兰克福学派对这一观点要进行批判，那布莱希特反过来也不向法兰克福学派示弱，他给他们打上了“吸蜜鸟”的标记。

“吸蜜鸟”是一个知识分子，然而属于一种特殊的类型：政治上软弱无力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空想主义的。布莱希特写道：“不干涉主义思想的主要根源就是虚伪的不干涉主义的民主。”也就是“以经济奴役为基础的政治上的自由”。当然，这是不符合法兰克福学派的，因为他们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批判也正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参看第三章），并且，如社会研究所所长所表明的，他们也赞同布莱希特的如下说法：“到了现在，文学上对极权主义社会的反抗，颂扬那曾经孕育了它的社会状态，并否认那种当这一状态还处于平静时就已经揭露了它的真正本质的理论。”<sup>②</sup>然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无论是在魏玛共和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艺术与大众文化》，见《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杂志，1941年第9期，第294页。

<sup>②</sup>霍克海默尔：《犹太人和欧洲》，见《社会研究杂志》1939年第8期，第115页。

隐藏在它们后面的意识，既然完全与社会的本来面目隔绝，它也就不得不采取奇怪的不协调的形式。”<sup>①</sup>

这样，在艺术中从“整体否定”进到阶级实践的社会政治否定的道路就被堵死了。在布莱希特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与此正相对立的思想，它被表达为“号召被压迫者起来反对压迫者，而且以人类的名义这样做”。如布莱希特所强调指出的，这是因为“只要这样压迫还没有被全部消灭，在这整个时期，人类就免不了成为好战的”。这就是布莱希特关于否定人类遗产的看法。如果法兰克福学派对这一观点要进行批判，那布莱希特反过来也不向法兰克福学派示弱，他给他们打上了“吸蜜鸟”的标记。

“吸蜜鸟”是一个知识分子，然而属于一种特殊的类型：政治上软弱无力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空想主义的。布莱希特写道：“不干涉主义思想的主要根源就是虚伪的不干涉主义的民主。”也就是“以经济奴役为基础的政治上的自由”。当然，这是不合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因为他们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批判也正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参看第三章），并且，如社会研究所所长所表明的，他们也赞同布莱希特的如下说法：“到了现在，文学上对极权主义社会的反抗，颂扬那曾经孕育了它的社会状态，并否认那种当这一状态还处于平静时就已经揭露了它的真正本质的理论。”<sup>②</sup>然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无论是在魏玛共和

<sup>①</sup>霍克海默尔：《艺术与大众文化》，见《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杂志，1941年第9期，第294页。

<sup>②</sup>霍克海默尔：《犹太人和欧洲》，见《社会研究杂志》1939年第8期，第115页。

“吸蜜鸟主义”的错误。的确，阿多尔诺本人也承认本杰明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布莱希特的“反吸蜜鸟主义”。然而，关于近年来的马尔库塞又能说些什么呢？马尔库塞在本世纪60年代末的激进化是否促使他对艺术的作用从根本上加以重新考虑呢？回答是：没有！看似荒谬，实则如此：法兰克福学派正是在产生了他们对意识形态和控制的出色的辩证分析的地方，却最清楚地表现出“社会批判理论”的根本弱点，也恰是马尔库塞顽固地保持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地方。

《单面的人》重申在肯定与否定的辩证法中否定一方的决定性优势：“艺术的异化就是对异化的存在的一种有意识的超越。”马尔库塞谈到艺术“对权利等级的否定”，但是，尽管他强调这种“超越”可以在某种唯物主义的意义上理解，并且谈到“关于某种将使压抑着它的社会感化的喜悦的象征”，马尔库塞的美学理论却象阿多尔诺一样追求同样的“整体否定”：

：“真正的先锋派文学作品所传达的就是与交往的决裂。不论是对于雷姆巴德，还是对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来说，文学抛弃特殊的论述结构，因为这种论述结构贯穿于整个文化史而与艺术的和通常的语言相联系。”

《论解放》则更加清楚地表明了马尔库塞对学生反权威主义运动的欢迎态度，又重新肯定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观点，它声明“一种再好不过的形式就是凭借这种形式的作用使艺术能够超越已有的现实，并在既定的现实中为反对既定

① 马尔库塞：《单面的人》，伦敦，环球出版社1968年版，第60页。



的现实而活动”。至于《反革命与造反》，则坚持认为“美学的领域与现实的矛盾是一个‘方法论的’意向的矛盾”。这一“否定”不能被扬弃为具有一贯散漫性的群众意识形态斗争，因为那会使艺术成为“工具”。

根据整个“社会批判理论”，艺术通过暴露和摧毁舆论的控制方面，起着一种非意识形态力量的批判作用。但是，现实的这种非意识形态化不能自行组织成阶级行为的实践的一批判的力量。现实，不能象布莱希特那样，根据阶级的群体来观察它，而应该向阿多尔诺一样，根据到目前为止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异化和具体化来观察它。于是，艺术的斗争就变成一种“整体否定”。这样一来，“风格，美学形式的具体化，在使现实从属于另一种秩序的过程中使现实受‘美的法则’的支配。”<sup>①</sup>

贯穿于马尔库塞的论文的一个思想是，真正的艺术“所蕴含的是超越任何特殊条件的与整个人类历史（在马克思那儿是史前史）相关的合乎人性的条件”，因而，这样的艺术也能“得以流传下来并超越其阶级特性”。<sup>②</sup>但是，马尔库塞并没有使“扬弃”这一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具体化，实际上，他舍弃了革命艺术的自觉的阶级内容，而以“整体的”超越来代替它。这样，马尔库塞所声称的“艺术确实能够通过促进普通意识的变化而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sup>③</sup>也就失去了它的唯物主义的意义。

在意识中“促进变化”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因素，这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有效的传播和这种传播达到某一革命

①、②、③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伦敦，艾伦莱恩出版社，1972年版，第98—99页、87—88页、125页。

的阶级。其中的第一个条件，由于马尔库塞的批判的艺术之反通俗化的性质，最终也成了牺牲品。第二个造成革命意识的先决条件也同样丧失掉了，不过是以更为复杂的方式丧失的。自相矛盾的是，马尔库塞理论的这一方面是以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一个争论为基础的，这一争论大大地有助于补救法兰克福学派在对经济控制提出一个清楚有力的分析上所遭到的失败。在对马克思的“集体劳动者”这一概念作了详细说明后，马尔库塞就谈到了索恩·雷瑟尔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理论，《反革命与造反》的最后结论是，权力转移到无产阶级，这只是生产劳动力的一个成分，并不能保证过渡到一个不同质的社会。在讨论艺术时又整个地重复了这一论据，在这里，马尔库塞拒绝某种受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的鼓动性艺术的见解；

“如果‘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一术语指的是流行于劳动阶级之间的世界观，那么，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也就是其他阶级、尤其是中等阶级的绝大部分人所共有的世界观……如果这一术语是称呼革命的意识（潜在的或现实的），则它在今天无疑地不是独特的甚或基本上属于‘无产阶级’的，这不但是因为反对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革命并非只有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而且还因为这种革命的条件、前途和目标已经不能充分地公式化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措词……”<sup>①</sup>

而且尽管强调剥削的新式联系以及无产阶级的激进化并不是革命的绝对必要的条件，马尔库塞并没有提出关于一种

---

<sup>①</sup> 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伦敦，艾伦莱恩出版社，1972年版，第123—124页。

艺术如何适应于调解阶级斗争内部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这一正确战略的问题（那怕是有这种意图也好）。这样，艺术的“超越”以及在革命实践中对资本主义的具体否定，在马尔库塞的理论中所告诉我们的东西，也仅仅是在阿多尔诺的理论中已有的东西。

一个还算可以的例外是马尔库塞关于“加强团结”的黑人语言的反叛力量的讨论。但是，即使在这里，重点实质上是内含于这一发展中、特别是在其艺术中的“总体”反叛；所关心的是“个体的真实存在以及作为人类集团的真实存在”。<sup>①</sup>这种艺术的划界力量是不为人们所重视的。类似的，马尔库塞关于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批判的美学实践（针对布莱希特和埃斯勒）的讨论，也没有明确涉及到他可能认为的这种艺术的“工具主义”的职能；亦即增强作为自觉的阶级而活动的工人阶级的意志和团结的职能。

这样一来，马尔库塞的美学就和阿多尔诺的美学一样，以同样的矛盾而告终；这就是：艺术的“超越”是对异化和具体化的一种“否定”。而其主要的任务却一直是为意识的解放而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没有这一解放，则一切观念的解放，一切激进的能动性都会是盲目的、不战自败的。政治的实践依然是依赖于理论……依赖于教育、信仰——即依赖于理性。”<sup>②</sup>结果，甚至对马尔库塞来说，艺术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适应这一任务，从而失去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

---

① 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伦敦，艾伦莱恩出版社，1972年版，第128页。

② 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伦敦，艾伦莱恩出版社，1972年版，第132页。



系。最后，这一点也可说明，鉴于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尔正如他们脱离批判的实践一样，始终背离艺术中的革命传统。对比之下，马尔库塞在他试图克服原初的“社会批判理论”（即由霍克海默尔所阐述并由他的伙伴们在《社会研究杂志》时期所贯彻的）的根本缺陷时，能够而且必须使自己摆脱实体化、唯心主义和优越感这些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的主要倾向。而在其他方面，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马尔库塞的激进的理论活动，在其关键的地方，仍将紧紧地被从一开始就使法兰克福学派一片混乱的各种矛盾所困扰。

## 附录:

# 主要人物中外文译名对照表

## 第一章

Paul Kluge	保罗·克卢克
Henryk Grossmann	亨利克·格罗斯曼
Friedrich Pollock	弗里德里希·波洛克
Carl Grünberg	卡尔·格律恩堡
Karl Korsch	卡尔·柯尔施
Felix Weil	弗利克斯·威尔
Max Horkheimer	马克斯·霍克海默尔
Kurt Albert Gerlach	库尔特·艾伯特·格洛克
Gustav Mayer	古斯塔夫·迈耶
Marcuse	马尔库塞
Marx	马克思
Karl August Wittfogel	卡尔·奥古斯特·威特福格尔
Emil Hammacher	埃米尔·哈马赫尔
Engels	恩格斯
Hegel	黑格尔
Kant	康德

Fichte	费希特
Grün	格伦
Georg Lukács	乔治·卢卡奇
Moses Hess	摩西·赫斯
Freud	弗洛伊德
Franz Borkenau	弗兰兹·博克诺
Weimer	魏玛
Adorno	阿多尔诺
Dawes	道斯
Brüning	布留林
Neumann	诺伊曼
Rudolf Hilferding	鲁道夫·希尔弗丁
Hitler	希特勒
Fromm	弗洛姆
Siegfried Kracauer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Wilhelm Reich	威廉·赖希
Stalin	斯大林

## 第二章

Feuerbach	费尔巴哈
Heidegger	海德格尔
Lenin	列宁
Mao	马赫
Zinoviev	季诺维也夫
Albrecht Wellmer	阿尔布雷希特·韦尔默尔
Ernst Bloch	恩斯特·布洛赫



Nietzsche	尼采
Bergson	柏格森
Mortimer Adler	莫蒂默·艾德勒
Hume	休谟
Berkeley	贝克莱

### 第三章

Walter Benjamin	沃尔特·本杰明
Alfred sohn—Rethel	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瑟尔
Trotsky	托洛茨基
Ernst Mohl	恩斯特·莫尔
Rosa Luxemburg	罗莎·卢森堡
Heinrich Brandler	海因里·布兰德勒
Cuno	古诺
Mattick	马蒂克
Valtin	瓦尔丁
Paul Frolich	保罗·弗罗里克
Anton Pannekoek	安东·潘尼凯克
Bernstein	伯恩斯坦
Max Adler	马克斯·阿德勒
Vico	维科
Descartes	笛卡尔
Gassendi	伽桑狄
Galilei	伽利略
Max Seydewitz	马克斯·塞德维茨
Hans—Jürgen Krahl	汉斯—于尔根·克拉尔

Manfred Clemenz	曼弗里德·克莱门茨
Taylor	泰勒
Odysseus	奥德修斯
Sirens	赛壬
Mandelbaum	曼德尔鲍姆
Meyer	迈耶
Pavlov	巴甫洛夫

#### 第四章

Jung	荣格
Walter Jopke	沃尔特·乔普克
Robert Steigerwald	罗伯特·施泰格尔沃尔德
Gert Meixner	格特·迈克斯勒
Leo Lowenthal	利奥·洛温撒尔
Wagner	瓦格纳
Adam Smith	亚当·斯密
Martin Jay	马丁·杰伊

#### 第五章

Balzac	巴尔扎克
Tolstoy	托尔斯泰
Harkness	哈克尼斯
Bertolt Brecht	伯特尔特·布莱希特
Dos passos	道斯·帕索斯
Georg	乔治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

Kafka	卡夫卡
Berl	伯尔
poiret	鲍埃特
Anglo—Saxon	盎格鲁撒克逊
Arnold Schönberg	阿尔诺德·森伯格
Eisler	埃斯勒
Robert Walser	罗伯特·沃尔泽